

目 录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辽吉各城市实况辑录

-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赵镇藩 (1)
- 沈阳、锦州沦陷纪略……………熊正平 (9)
- 日军侵占长春、吉林经过……………冯占海 (15)
- 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洪 钊 (23)
- 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谢 珂 (28)
- 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的沦陷……………赵 毅 (61)
- 马占山反正经过……………李铭新 (74)
- 东北爱国人士向国联调查团揭露
- 日寇侵略罪行经过……………刘仲明 张韻冷 (78)
- 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 (87)
- 东北军讨伐石友三战争……………于学忠 (119)
- 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王家桢 (125)
- 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
- 结局……………宁 武 (134)

附注

对《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一文的补充和

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五七页

对《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的

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二四页
对《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
局》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
辑二二四页、第三十一辑二九四页

九一八事变日軍侵占辽吉各城市实况輯录

日軍进攻北大营亲历記

趙 鎮 藩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任东北軍第七旅的參謀长，事变的当天晚上旅长王以哲不在軍中，我正在北大营旅部住宿，亲身遭受了日寇的突然袭击，率第七旅退出北大营，现将当时情况追忆如下：

事变前的敌我形势

日寇图謀东北，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庸腐敗，允許日本在南滿駐軍，日軍早已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鎮和主要交通干綫。迨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駐在辽、吉的軍隊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一为鉄路守备队，司令部設在公主岭，下轄四个大队，分駐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連山关，是永久駐屯性質，由国内各正規师团抽調兵力編成。一为駐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駐辽阳，下轄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騎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旅团司令部駐柳树屯，所屬两个联队，分駐柳树屯、旅順；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駐鉄岭，所屬两个联队，分駐辽阳、公主岭；騎兵联队駐公主岭，炮兵联队駐海城。这一部分駐在东北的

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輪換一次。此外还在旅順設有要塞司令部,轄旅順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軍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所有以上部队統归关东軍司令部指揮。关东軍司令部原設在旅順,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在日軍的編制上,关东軍司令部的职权很大,司令官直隶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并可当机立断,也就是說,只要日本軍閥认为条件成熟,随时就可以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为了力謀实现其大陆政策,即多方制造借口,向我寻衅。是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繼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准备軍事,企图发动进攻。八月下旬,日本鐵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駐在朝鮮境內的十九、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們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龙多島和图們江領水;南滿鐵路沿綫日軍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九月初,新任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滿路沿綫巡視并检閱部队。九月八日,日軍越境在沈阳北边門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随后并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日本在东北的在乡軍人,亦于九月八日奉到密令,分別集中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日軍当局并于九月十日左右分別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題發揮,煽动日侨仇华情緒,并发給枪枝,摩拳擦掌,跃跃欲試。这时适有駐沈阳的日軍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队要“瓜代”归国,我們照例为村田联队长餞行,他在酒兴正浓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情說:中国好,不愿意归国;又說:归国后不能升級,又不能进入陸軍大学,只有退伍,表示留恋东北。随后他又在酬謝我們时向我透露:他的联队奉到新的命令,归国的部队必須等到新兵到齐后同时返国,他感觉奇

怪。同时我们还获得情报說：沈阳南满站附屬地縫紉厂正大量赶制中国軍服，用途不明。所有以上征候，都說明东北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滿楼之势，当时东北有識之士都預感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連年进行軍閥混战，陸續抽調东北軍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虛。一九三〇年蔣、閻、馮中原大战，相持数月，勝負不决，九月間，张学良为了帮助蔣介石战胜閻、馮，将东北軍主力大部分开进了关內，随后为了巩固蔣介石的政权，张学良也长期住在北平。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由于国民党內部爭权夺利，以蔣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內战。中原大战后投降张学良、駐在河北順德一帶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會議收买，就任第五集团軍总司令，并勾結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七月間通电反张，进犯平津。此时日本侵犯东北阴谋日益显露，形势日益危急，但张学良不但沒有将东北軍調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把尽可能抽調的部队，抽調入关，参加討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調进了关內），致使东北防軍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軍將領对于这样抽調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說：“东北軍为了討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連笤帚紇絛都拿出来了。”这样，东北在軍事上陷于非常空虛的状态。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編制的省防旅。而处在日軍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騎兵第三旅分駐沈阳、錦州和通辽，常經武第二十旅駐洮南一帶；連同火力很弱、

平日缺乏訓練而又被腐朽昏庸的张海鵬和于芷山所掌握的逃辽和东边两个鎮守使署所轄的两个省防旅在內，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五、六个旅。特别是当时东北軍隊的高級軍官們缺乏抗日意志，充滿恐日心理，平素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日軍一旦发动进攻，就不战而潰了。

第七旅的应变措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八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报人員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請求将关內东北軍調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們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訴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軍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針。”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轉来蔣介石的銑（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轉飭遵照执行”等語。

王以哲对于执行蔣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时是比較“忠实”的。他由北平回来后，有一次召集团以上軍官研究我軍如遭受日軍攻击时如何对付的方案。我和团长王鉄汉、张士賢、王志軍以及丁、朱两參謀都說：“遭受日軍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針怎么能成呢？那样，全軍势必遭受歼灭。”王以哲笑着說：“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們要絕對服从。”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見，朱參

謀說：“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是也不能坐着等死。”有人說：“根据上峯的指示，敵軍不來我們不能走，但是敵軍若來了我們想走也不成，只有起來應戰，不抵抗怎么能成呢？”最后王以哲作了个見机行事的決定。所謂“見机行事”，就是敵來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則也逃跑不了。經過反复研究，我旅決定对于日軍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却”的对策：如果敵軍进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敵軍进到距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敵軍越过鐵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軍退到东山咀子附近結集，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了下列各項措施：1. 官兵一律不准归宿；2. 加強营垣工事；3. 繼續加強偵察；4. 为了防止敵軍伪装我軍官兵进行偷襲，特将我軍官长改变姓名，更換符号顏色，放在兜內，以易于識別。

日軍进攻北大营情形

九月十八日上午，日軍第二师团第三十三联队长村田来到北大营要求見王以哲，我答以王旅长出席水災會議未回。村田对我說：“赵參謀长，这些天咱們之間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不信任的問題。咱們相处得很好，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我回答說：“你的意見很好，但是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当日白天平靜无事，至晚間十点二十分左右，突聞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事后方知是日軍在南滿路柳条沟附近炸毀鐵路，誣为我軍所为，以作发动事变的借口）。不到五分鐘，日軍設在南滿站大和旅館的炮兵陣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員报称，日軍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开始进逼。我得报后，向三經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說，他去找柴參謀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

旅长不在軍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軍进入預定陣地外，一面并用電話直接向东北边防軍总參謀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說：“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庫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說：“把枪放到庫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給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說：“这个指示已經同各团长說过了，他們都認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作不到，官兵現在都在火綫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說：“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問題，由你負責！”我問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說：曾来过，已經回旅部去了（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計劃准备迎击敵軍。

到了十一点鐘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鍋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問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說，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庫內办不到，并向他建議是否可将駐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調来。他仍說不准抵抗，并且說，調常旅已經来不及了，指示我們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二时許，敵軍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鉄絲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敵軍迟滞前进的間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計劃向东山咀子撤退，結集待命。我軍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鐘，伤亡頗多（事后調查，計伤亡中校以下官兵二百九十余），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連，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軍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

免于被日寇俘擄。

北大营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終未回軍中，也未來電話指示部隊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及至我率部隊脫出重圍抵達東陵附近時，始遇我旅軍械官方貴傳達他的命令說：“旅長託我告訴參謀長，將槍搜集到一起放在東山咀子庫房內。”我說：“敵人還在後邊追着，那怎么能成呢？”我沒有執行王以哲的收槍命令。

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七旅的大多數軍官和廣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們奮不顧身地抗击着裝備優良、人數眾多的日軍的进攻，他們還不知道國民黨政府已經給他們的長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義的命令，因此，他們一面反击敌人一面問：“兄弟部隊為什麼不前來增援呢？”“我們的飛機為什麼不起飛參戰呢？”及至撤出北大營，他們還很關心地問：“我們幾時反攻回來呢？”這說明了廣大的東北軍的軍官和士兵是愛國的。但是有一部分團以上軍官由於接受了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戰鬥意志却是消沉的。雖然事前已規定官兵不准歸宿，但旅長王以哲經常不在軍中，日軍进攻北大營了還不回旅指揮；團長張士賢當晚也回家未歸；另一個團長王鈇漢炮響起來了才臨時趕回軍中，因而指揮不靈，使部隊的戰鬥威力不能很好的展開，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狽撤退。

同時，駐在北大營的軍事單位很多，而事前又缺乏聯系和統一應變的措施，戰事發作後又沒有統一的指揮，大家都爭着及早脫出危險，以至由於有些單位撤退過早，反而暴露了部隊突圍的企圖，使敌人的攻勢愈益猛烈。及至營垣內發生巷戰，還有很多部隊被敵人牽制着不能脫離戰場，最後陷于狼狽逃命狀態，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

我軍撤退經過

十九日清晨五点多鐘，我軍撤退到东山咀子，稍加整頓。六点多鐘，发现敵軍騎兵來襲，当即決定向山城鎮轉移，因山城鎮地形复杂，且駐有于芷山部，同时也便于解决補給和冬服問題。出发后，約十点多鐘，因有敵机三架空襲，決定就地隱蔽休息，俟天黑后行动。我軍在敵軍空、騎、步联合部队的追击下，三日后方始到达山城鎮。

当我見到于芷山，把敵軍攻击北大营的經過和我軍轉移到山城鎮的原因告訴他时，想不到他竟然要求我們离开山城鎮。他說：“你們的給养和冬服問題我可以幫助解决，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們得离开此地，免得我們遭到日机襲炸。”我見他心地如此卑劣（此人以后投降日寇，作了伪滿大汉奸），感到非常气愤，对他說：“日本人还能分于芷山、王以哲两旅不同嗎？”双方爭執不下，最后他見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要求王以哲來面談。恰巧这时听說王以哲已到草市車站，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我随即派人把他請來。王以哲來后，我向他說明情况，認為不能接受于芷山的条件。他說，这里不能久呆，能得到給养就算了。

我随即同王以哲研究此后的行动問題，決定第一步先到錦州候命。王以哲說，为了解决補給問題和請示机宜，他要換上便服先走，部队交給我負責率領。当时我不贊成去錦州，因为我認為短期內可能反攻，走了容易回來难，主張留下打游击，以策应反攻，但王以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械彈給养无法补充。

部队到达錦州后，王以哲已先到。他見到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對我說：“当时如果听我的話（指把枪放在庫里）就坏了，

我这个旅长是你給我的，謝謝你。”

不久我們部队即离开了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驻清河鎮大楼休整。

沈阳、錦州淪陷紀略

熊 正 平

九一八事变的前夕

九一八事变时，我(当时名熊飞)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公安局长由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將軍兼任。当时沈阳市武装力量除正規军队外，全市警察和公安队共約两千人；其他各县也都有警察和公安队，人数按县的大小不同。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沈阳形势即日漸紧张。我接到情报后，都随时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曾在一次省政府會議上向省主席臧式毅提出报告，并亲見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的荣臻參謀长作了报告。臧、荣二人都指示黄逕报张学良，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他回来向我說：“副司令派王維宙(王树翰)代表他到南京請示中央了，蔣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約及国联，日本不能強占我領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說，‘你們地方武装可加紧訓練，严加戒备’。”黄显声回来后即将辽宁公安队改編为十二个总队(三县至五县編为一个总队)，并拟請更換武器，以备必要时使用。

是年八月中旬情况更加紧张：中国人到南滿、安奉路綫工作漸

形困难,日本关东軍大量向沈阳集中,并在沈阳南满站日本忠魂碑附近架設大炮數十門,炮口指向城內。日本侨民紛紛傳說,日軍將占領沈阳,解决中村事件問題。我向黃显声报告后,黃又据情向榮臻、臧式毅請示,万一日軍进攻,如何处理。榮、臧指示說,“中央一再指示,避免冲突,不可扩大事件。”九月十七日早十时,榮臻与日本关东軍代表会談中村事件的解决办法,承認懲办凶手,賠償損失。榮臻、臧式毅等認為这一事件既已如此解决,即可望不致扩大了,因而未作任何应变措施。

日軍进占沈阳实况

九月十八日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賢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与本庄繁見面,聞其携有密謀,将采取爆发行动。我得此情报,遂向黃显声报告,黃当晚到市公安局办公。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南满站忠魂碑附近的炮兵突然开炮向我北大营射击。十时五十分,王以哲也赶到市公安局,与黃显声会商如何应付。王以哲表示如被攻击,即服从命令,退出北大营,向东山咀子东北耕武堂撤退。黃显声則表示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駐地。

九月十九日晨,日軍占領了北大营,复向我軍追击。第七旅撤退到东山咀子后,会同耕武堂官兵学生向海龙方向撤退。同日,日軍攻占我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与日軍接触后,頗有伤亡,余部集中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

九月二十日,日軍繼續攻占我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軍飞机多架,不时在空中偵察,有时扫射,居民有些伤亡,并有坦克車多

輛，在街上縱橫馳騁，商民憤恨異常。時市公安局尙能與臧式毅通電話。二十日下午日軍占領了沈陽兵工廠及東塔飛機場，並開始於其占領區派持槍上刺刀的士兵在較重要的街巷路口站崗，並有日本憲兵向民戶搜查武器及抗日分子。淪陷區的警察及公安隊除向總局及總隊部集中外，尙有一部分分散潛匿於各人家中。當時大漢奸趙欣伯開始作建立偽政權的活動。

九月二十一日夜間，沈陽磚城各城門及東關公安總局、公安總隊部大門，先後被日軍坦克車攻開，守門公安隊頗有傷亡。在總局及公安總隊部集中的員警及公安隊官兵受黃顯聲的指示，盡量攜帶武器彈藥，以分局分隊為單位由後門退出，連夜經新民向錦州集中待命。

二十二日，偽自治警察局成立，偽警左臂帶白臂章，以維持秩序為名，實際是偽政權的開始；同時地方維持會也在醞釀成立。榮臻、黃顯聲看到形勢日非，遂化裝去北京，請示以後行動。臧式毅未及走脫，在家被日軍包圍。我督率警務處人員及沈陽市警察及公安隊分散潛匿市內的人員，向錦州集中。當時其他各機關公務員及各人民團體負責人不甘心為敵人利用者，紛紛由皇姑屯上火車轉赴錦州或北京。當時皇姑屯至北京的鐵路尙能通車，但皇姑屯車站有日軍放哨，檢查甚嚴。

我率大部警察及公安隊到錦州後，受黃顯聲指示，整編警務處及公安騎兵三個總隊。九月底，米春霖奉張學良命令由北京到錦州，代理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的職務，其他各省府委員及廳處長也多到達錦州。遼寧省政府在錦州正式成立，榮臻也率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大部分職員到錦州辦公。當時據我方遺留在沈陽市的人員向錦州的遼寧省政府報告說：日軍逼迫臧式毅仍以省主席名

义办事,但称新政权(即伪政权)。至此,沈阳遂全为日軍占領。

东北当局平时对日軍既毫无作战准备,事变起来又不抵抗,致使大批作战物资均被日軍擄去。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损失步枪九万五千余支,各式机关枪二千五百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六百五十余門;迫击炮厂损失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余門;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二百六十架。此外,还损失了大批的弹药、器械、被服、粮秣等。而在沈阳的駐軍如东北步兵第七旅、长官公署卫队、东北讲武堂、辽宁省警务处、省会公安局等亦损失武器甚多。至于东三省官銀号、边业銀行、中国銀行以及其他各机关、企业、学校等损失的物资更是不計其数。

扑灭两起伪軍的胜利

九月底,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在錦州开始办公后,調駐通辽的騎兵第三旅、駐洮南的步兵第二十旅集中錦州附近,連同原駐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在錦州东三十五里)布防,維持辽西一带的秩序;辽宁省警务处新編的公安騎兵三个总队,駐錦州北二十里的三屯附近整訓。十月二日,日軍飞机九架来錦州轰炸交通大学(辽宁省政府办公地址),有俄籍教授一人炸伤了右腿,附近居民伤七十七人,省府人員无伤亡,次日即分散办公,警务处移住东关一个皮鋪院内。

日軍进占辽、吉后,即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和組織伪軍的活动。十月初,日本关东軍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軍总司令,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国旗。司令部駐盘山沙岭鎮。日軍派浪人仓崗繁等十五人为凌的顧問。当时日本报纸对这股伪軍大肆宣传,声称編了十八个师,实质上凌印清是个光杆。自己

并没有武力，只是给辽西一带的几股胡匪发了些委任状，企图收买胡匪，扰乱锦州。代长官荣臻命令黄显声扑灭这股伪军，黄即派我带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去剿办。

我到盘山后找到了当时任伪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的我的学生单庭秀，说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单庭秀向伪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等传达后，项青山等遂即将凌印清及日本顾问等擒获，只留仓岗繁一人，其余均就地枪毙。随即将搜获的敌伪证据如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以及伪司令的大印、伪军编制表等，持赴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赏出力人员现洋五万元，但不许将反正部队编成正式部队，只准成立地方部队或义勇军。遂由黄显声委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驻盘山；张海天（即老北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司令，驻辽中；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驻台安。

十一月初，日本关东军又派张学成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在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张作霖的地窝棚设司令部，乱发委任状，收编辽西一带的胡匪，号称为军队，编成十八个旅，并有四个日本浪人做他的顾问，用红蓝白黑（旗右上角）满地红的旗帜（这也就是以后伪满州国用的国旗）。这支伪军的声势不如凌印清之大，但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熟悉东北内部的情况，荣臻、米春霖感觉难以处理。黄显声说：“谁投降日本作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并且张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他的堂弟作汉奸的。”他并亲赴北京见张学良建议进剿。后经张学良电荣、米派我率公安骑兵两总队往剿。因我当时往盘山给项青山等发赏金，编制他们的部队，并处理战俘仓岗繁，乃派第二总队长庄景福带公安骑兵二、三总队，乘火车到高山子下车，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等击毙，并生擒伪旅长荣庭

等多人。我将所获证据如伪总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带到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又赏出力人员现洋五万元，并命令将俘获人员一概遣散，不得留用。日本人在辽西一带搞起来的第二批伪军又被我们消灭了。

日本侵占锦州实况

十二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顾维钧与日本大使交涉，双方决定划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留我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并防守大凌河岸；并约定日军不过大凌河，听候国联派调查团前来调查解决东北问题。因此，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陆续撤退至山海关内，留在锦州的武力只有我率领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高级人员只有省府秘书长黄剑秋、警务处长黄显声及其秘书刘澜波等。十二月下旬，我派公安骑兵第三总队防守大凌河南岸，以第一、第二两总队驻锦州附近。旋接情报，知日军以第八师团集中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准备了二十列火车，拟向锦州、山海关进攻。黄显声即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日军第八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我军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炮火掩护步兵实行强渡。我守河岸的第三总队开枪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敌军最先渡河的七人被我军擒获。时已天黑，我军又无重武器，难以固守，遂向城内撤退，至城内时，已经夜半。黄显声率省府人员退至城西二十里的杨官屯，我仍驻城内。后半夜二时，日军开始攻城。四时，我命令炸毁女儿河铁桥，保护省府人员向虹螺岬、锦西撤退。一月

三日早十时,日軍飞机九架至虹螺岬上空偵察,我全部人馬在山坡森林中隱蔽,未受損失。一月四日,日軍派古賀騎兵联队向錦西方向來追,我全部人馬退至錦西的西南大山中,因車輛不能行走,遂將所俘敵軍七名槍斃。

一月十日,我率公安騎兵三个总队退至撫寧,日軍進至山海關外前所車站后即不再前進(当时山海關駐有何柱國的步兵第九旅,山海關外二十里是河北、辽宁两省界限)。日軍侵占錦州战事,至此告一段落。

日軍侵占长春、吉林經過

馮 占 海

日軍攻占长春

九一八事变时,吉林副司令长官兼省主席張作相,因父歿回錦州治喪,由參謀長熙洽代理軍政大权。当日軍在沈阳开始炮击北大營后不久,臧式毅用长途電話將日軍进攻沈阳的情况告知熙洽,最后臧式毅和熙洽兩人曾用日語講了一段話,說的什么內容不得而知。后又接到吉省駐沈阳办事处李樹蓀電話,也同样报告了沈阳被日軍侵占的情况,未說完電話即中断。警耗传来,吉林市人心震动,这时因情况还不甚明了,熙洽似乎还抱着观望态度,并未作何举动,市面也未发生騷乱情况。

事变当时,长春駐軍有吉、长警备司令兼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所部。沈阳事变发生后不久,李桂林即奉到熙洽命令,令該旅除

傅冠軍一个营留駐二道沟外，其余全部避往双阳县境内。时长春南岭尙駐有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团长任玉山、炮兵第十团团长穆純昌等部。

九月十九日拂晓五时许，日軍駐长春的多門师团的一部分部队即向我长春市鉄北二道沟駐軍第二十三旅傅营袭击。該营立即自发应战，营长傅冠軍身受重伤（后因伤重牺牲），因敌众我寡，部分官兵被繳械，部分官兵撤出防地。

同时（十九日拂晓）又有一部日軍向长春南岭駐軍穆純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第五十团的营房偷袭围攻，我哨兵发现后，部分官兵起而应战，激战数小时，敌我互有伤亡。后来該两团接受熙洽命令撤退，炮兵团三十六門大炮及庫存械弹等全被敌掠去，炮团官兵仅携带步枪退往市郊外四十余里的新立城一带，以后由穆純昌率全团官兵投敌。任玉山团有两个营（李輔臣营、张乐山营）撤至麦子沟一带，后来在榆树县作战后参加抗日軍。日軍得手后又分头向长春市各机关进袭，长春遂于十九日陷于敌手。

另外，日軍于十九日上午又向长春車站进袭。吉长鉄路警务段原有武装警察百余人，事先日軍授意該警务总段长，假說点名，將全体官兵集合，以待日軍。日軍开到后首先开枪袭击，我警务段官兵奋起还击，因敌我距离甚近，战斗頗为剧烈，敌我均伤亡不少。

长春被日軍占领后，日軍又以步、騎、炮各队在市内作軍事示威行动，有时飞机在上空盘旋飞行，企图鎮懾人心。同时日軍又由公主岭調来軍隊数列車到长春郊外米沙子車站，以防我軍哈尔滨方面部队南进向长春进攻。

长春市政处处长张书翰、公安局长脩长余，原是两个亲日分

子,长春淪陷后两人即积极为日寇效劳,到处奔走,同时熙洽也用电
話囑告他們和日寇取得密切联系,二人也不时向熙洽报告情况。日
軍占領长春后,对通往吉林市的电报、电话路綫不但不加以破坏,
反而进行保护,以便于利用熙洽向我南岭駐軍下达不抵抗的命令。

熙洽出卖吉林

长春既陷,吉林省垣由于熙洽叛国降日,被日軍不战而得。

熙洽是清朝皇族的近支(爱新觉罗氏),又曾留学日本士官学
校,与日軍师团长多門二郎有师生关系(多門曾任士官学校教官),
素有亲日倾向,更暗藏恢复清朝統治思想,妄想借日寇力量,恢复
清朝政权。所以在日寇侵占长春后的翌日(九月二十日),熙洽即
派张燕卿(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携密函赴长春面見多門,表示甘
心卖国投降。他得到多門的暗許后,即着手布置出卖吉林的叛国
阴谋。

在熙洽未迎接日軍到吉以前,省城原有駐軍为第二十五旅旅
长张作舟所轄步兵二十二团(团长刘宝麟)、三十三团(团长夏鴻
謀),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馮占海所轄步兵三个营,騎兵一
营,炮兵一营,迫击炮、重机枪、通信等各一連。九月二十日下午,
熙洽以副司令长官名义发出命令,略謂为了避免冲突,保存实力,
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各部队长应严約所部不得擅自抗击,致使事
件扩大,着駐省城各部队即时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当时各
部队因不明真相,二十五旅全部遵令向烏拉街方面,卫队团全部遵
令向永吉县官馬山地区,分別退走待命。

先是,九月十九日,熙洽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名义轉下电文,略
謂:“奉諭:日軍侵占东北,我軍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

件由外交解决”等語，但此一电报并未写明来历。当日下午，熙洽来电话約我面談，見面时熙洽說：“日軍因中村大尉事件和柳条沟事件，已占領沈阳市，同时于十九日晨日軍又因长春万宝山事件，已占領长春。你应率部队整裝待命。”

我当时即向熙洽建議說：“应当命令駐长春、吉林各部队向日寇反击。”熙說：“我奉电令避免冲突，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我問熙：“此系奉到何人电令？”熙說：“此电发电人不准传达姓名，此时不便告知，日后你会知道。你不需派兵出去迎击。”

二十日下午，熙又来电话約我見面，見面时，熙問我：“你接到退出城外命令了嗎？”我答：“接到了。”熙又問：“駐省城部队应迅速撤出城外待命。”我問熙：“日軍未到，因何将部队撤出省城？”熙說：“我准备跟日本軍交涉，和平解决吉林事件。”我又問：“如要和平交涉，为何不到长春去交涉？”熙答：“派不出合适的人去。”熙又說：“我拟約多門师团长帶少数軍队到吉林来談判。”我問熙：“如果日軍到吉林談判后不撤兵，怎么办？”熙說：“日本人不会不守信用。”我激憤地說：“日寇侵占我国土，我們可以命令部队抵抗、打他。”熙急忙說：“年青人光凭血气，太不量力，不用說东北軍队，就是全国軍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沒有談判亡国的。少数軍队妄自发生冲突，是以卵击石，徒使事件扩大。現所有軍队应即本着命令撤出城外数十里待命。”熙当时又說：“你給我留下二个連暂时負保卫两署警卫之責，并将徐文田营长留下（因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即同意将徐文田营长帶領第三連連长刘济寰、第四連連长林甲春留于省城。熙又說：“你这就將徐营长找来，当面命令他暂时在省城直接听我指揮。”当时我就將徐文田营长找来，囑他听熙的直接指揮，而

后我就率全队撤出省城。临走时,我问熙:“万一谈判不成,应怎么办?”我问到此处,熙装着十分痛心样子说:“万一谈判不成,我单人找你,领你们一起抗日。我个人为了国家,生死存亡已置之度外。”

我当时受了熙逆蒙蔽,即率队退出城外。

当日寇进占吉林以前,我省一些工人、学生和爱国群众,激于义愤,张贴标语,高呼口号,宣传反对日寇侵略我东北,要求军队起来抵抗日本,保卫国土,并表示愿作后盾。因当时熙逆投敌真象未露,所以群众尚未能提出打倒熙逆等卖国贼的口号。

九月二十一日,熙洽召集省城各厅、处、科主要负责人开会,声称不日约多门师团长到吉林市,和平交涉吉省的中日事件。当时省府委员诚允说:“约日军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险。”熙洽坚不同意,诚允即时退出会场,前往哈尔滨。省府秘书长潘鶚年也不同意约日军到吉林,熙洽亦置之不理。潘是当时的抗日派人物,吉林伪组织成立后,他曾送熙菊花两盆,并写诗两首,劝其不要变节,熙颇为不满。潘后不辞而别,离吉去哈。此外尚有实业厅长马德恩等亦不同意日军到吉市,劝熙洽多加思考。此时只有建设厅长孙其昌、吉海铁路总办李铭书、前第十五师参谋长郭恩林等十余名亲日派附和熙洽“日军打不得,和平交涉为上策”的谬论。

九月二十二日晨,熙洽找徐文田营长面谈。熙说:“你带的这二连兵,即时撤出城外,归回原团建制”,并说:“你见到冯团长时,告诉他省城安静,经过与日领事交涉,可望找到和平解决吉林事件的途径。”

徐文田于九月二十三日晨,率兵二连返回官马山防地。徐与我见面时告诉我说:“熙洽这两天与日领事会见频繁,会后面带喜色。他在最后二次会晤日领事时,不用翻译,用日语密谈,态度很

不正常。他每逢会见日領事时，告诉我在客厅周围派兵警卫，严禁外人往来行走。九月二十一日熙洽会见日領事时，我在客厅門外窃听，听到日領事問熙洽：‘省城内怎么还留有武装部队和警察？’熙回答說：‘省城只有二連，暂时警卫两署，武装警察也只是少数，大部分已撤出城外。’并說：‘这些部队我准备在多門师团长到吉市前夕，命令他們撤出城外。’日領事問：‘吉省所有部队能听从你的命令嗎？’熙答：‘多数还能听我的命令。現有兩署机构必須撤銷改組，重立新机构。’日領事回答說：‘象这样事情，等候多門师团长会面时再行商談确定。’后徐对我說：“看熙洽的举动行为，很可疑。”我当即打电话到省府訊問情况，得悉日軍在二小时内就要来到吉林市。

吉林伪組織的出現

到了九月二十三日午，熙洽竟派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軍官教練处总办齐知政等，陪同日寇多門师团长所帶天野旅团部队进入吉林，接着就分別占据省垣重要机关，并掠夺官銀号大批庫銀和軍械厂原存大批枪彈。

当晚，熙与多門会面后，即接受多門指示，将旧省政府、司令长官公署一律撤銷，成立伪組織。第二天熙洽即又召集省議會、商务会和各厅負責人开会，當場宣称已經与日軍交涉妥協，为了免去战禍，将原有軍政两署撤銷，合并成立一个“吉林长官公署”，胡說这是权宜之計，将来中日事件和平解决后，仍請“帅座”（指张作相）回任，請大家推举长官入选。到会人員中，亲日派孙其昌等十余人高声拥熙任长官。当时虽然有些人心中不滿，因恐遭不測，亦不得不表示贊成。至此，熙洽就出任了伪吉林省长官，并将原省府改为一厅

制,即民政厅,任李銘书为伪厅长;原有司令长官公署各处取銷,改为軍令厅,任郭恩霖为伪軍令厅厅长。

熙洽于九月二十五日又召集各法团及厅长以上人員开会,宣布就伪长官职,并宣布旧有法令不合新政府要求,以后一切听从新政府命令。会后熙洽即发出通电,大意謂:为了吉省安宁,免遭战祸,經各界推为吉省长官,即将旧有軍政两署撤銷,所有各部队长、各县长、各公安局长、保安总队长,应繼續維持治安,不得擅离职守,电到之日,应各自权衡,共济时艰,何去何从,应表明态度,等語。

此电发出后,凡迟迟未表示态度者,均被撤职。如駐哈市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被撤后,任宋宇之为伪旅长。二十八旅旅长丁超被撤后,任白文清为伪旅长。吉林省警务处长王之佑被撤后,任赵汝梅为伪警务处长。直到李杜率各部抗日軍到哈市后,邢、王、丁三人始行复职,邢参加抗日,丁、王二人,一度参加抗日自卫軍,后亦投敌。

熙洽成立伪政府后,吉市中学大部分自动停課,表示反抗,一部分学生参加抗日軍,一部分到外县躲避或赴北京,其余部分学生,直至翌年春始行复課。日寇宪兵昼夜搜查枪枝,并迫害抗日爱国人士。日軍天野旅团长帶領步、騎、炮和坦克部队,在城内主要路綫行軍示威,并有多数飞机在城上空盘旋飞行。省城商民极为惶恐不安,商店多数关闭,羣众对熙洽叛国,极为痛恨。外县爱国羣众和学生紛紛起来自动組織了救国軍、抗日軍、討逆軍,有的数十名,有的数百名,有的千余人。有的农民放弃收割,以作消极抵抗,直至年底,地里尚有高粱、谷子等作物,无人收割。

熙洽的誘降活动

熙洽甘心降敌以后,一面派員对我团威胁利誘,一面令日軍騎

兵进占口前車站,与我团官馬山的騎兵对峙。双方不时发生接触,但因敌人妄想誘降,故尙无大冲突。熙逆在九月二十四日前后曾三次派人到官馬山对我团駐軍威胁利誘:第一次派永吉县长关蔭軒持熙逆亲笔函劝降,大意謂:“識时务者为俊杰,应忍辱負痛,勿与日軍发生冲突,免将事件扩大。茲任你为吉海护路司令职务,应听从新政府命令”等語。第二次又派伪司令长官公署参議楊沛然持函前来威胁,大意謂:“日軍屢次准备向你进攻,均被我劝阻,你应祸福相权,当机立断,率部返回省城。今改任你为省城警备司令职务,并保护你生命財產绝对安全。余与你有师生关系,决不食言”等語。第三次派艾迺芳携熙函前来劝降,略謂“傳聞你有意准备向日反击,日軍已得到情报。日軍囑我轉告你,如果你向日軍抗击,則將吉林市人民洗光。倘若如此,則应由你个人負責。希望你念及省城百姓災难,速即解除兵柄。如不愿就官职,可送往日本留学,先发给数万元留学費用,以后一切費用由政府負責”等語。

我对熙逆先后派員威胁利誘劝我投降,均严詞加以拒絕。我部全体官兵对熙逆甘心投敌卖国的行为,深为憤慨,人人切齿,一致表示要抗日討逆,誓死不屈。至是我軍即将原有部队正式改編为抗日軍。

九月二十四日,熙逆曾派前第十五师参謀长郭恩林、参謀处长佟衡携熙逆劝降书到烏拉街二十五旅防地誘降。三十二团团团长刘宝麟、三十三团团团长夏鴻謀各率所部的一部投降,其余部分官兵不听伪命,撤至榆树县。軍官教練处总队和原有省城公安武装保安队等部队,經熙逆派齐知政前往劝降后,这些部队也都附逆。此后在吉林即展开了抗日討逆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

洪 鈞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正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办公，现将我当时所知关于张学良在事变当时的情况，追记于下。

先是，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彼时日本图谋东北的阴谋，已很为显露，其见之于积极行动的有增兵朝鲜，满洲改置常驻师团，更换南满铁路公司正副总裁与朝鲜总督等等。同时，石友三在华北叛变和閻錫山突然由大连返晋，也都是与日本有勾结的。九月十二日，张学良曾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璣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九月十八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九月十八日夜間，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妮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

臻的電話，据荣报告，“駐沈阳南滿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許，袭击我北大营，謠称我方炸毀其柳河沟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蔣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一“銑电”致张学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憤，置国家民族于不顧”。张学良曾将这个“銑电”轉知东北各軍事負責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將續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電話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許，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電話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鮑文樾等重要將領开会。张学良首先說明，“日人图謀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們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責，本应和他們一拼，不过日軍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絕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現在我們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問題，我們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們是主张抗战的，但須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軍在最前綫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軍隊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軌事件，謠称系我方的軍隊所为，我們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証明我軍对他們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軌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連祸結，波及全国。”当时各將領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連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顧維鈞、湯尔和、章士釗、汪荣宝、罗文干、王蔭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會議（张学良在沈阳时設有东北外交委員會，以上顧維鈞等人，均系該委員會的委員），

諮詢對於東北外交問題的意見。當時發言較多的，為顧維鈞、湯爾和二人。顧維鈞主張，東北外交須先請由國聯迫使日本撤兵，再談其他問題，國聯絕不愿日本的勢力坐大，有碍機會均等的原則；國聯如對東北問題無法解決，將來世界各國將如何對待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和華盛頓九國公約，因此無論如何，國聯絕不能坐視這些條約成為廢紙。湯爾和說（湯系新由日本返回沈陽，於九月十一日由沈來平的），根據他在日本的觀察，日本內閣現正抑制日本軍部勢力，不愿使東北的事態擴大。湯又說，幣原外相曾經親自和他談過，日本如吞并滿蒙，實不啻吞了一顆炸彈，我們如用國聯的力量來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內閣便于對付軍部。

逾二日，張學良又邀請當時平津的所謂名流李石曾、胡適、吳達詮、周作民、朱啟鈐、潘復、張志潭、胡惟德、陳錄、曹汝霖、陸宗輿、王克敏、王揖唐、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汪榮寶、羅文干、王蔭泰，以及東北高級官員王樹翰、劉哲、莫德惠、于學忠、萬福麟、王樹常、戢翼翹、鮑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東北問題。出席諸人也均以依靠國聯、听命“中央”為是。由於這二次的會議，張學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賴國聯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的會議後，即推章士釗、汪榮寶二人起草電報，向南京政府申述關於東北外交問題的意見。二十三日，張學良復派萬福麟、鮑文樾飛南京見蔣介石，蔣囑萬、鮑二人說：“你們回去告訴漢卿，現在他一切要听我的決定，萬不可自作主張，千萬要忍辱負重，顧及全局。”萬、鮑二人回平將此意轉達後，張學良又召集戢翼翹、于學忠、王樹常、王樹翰等研商大計。于學忠曾經建議，“日本軍人現仍繼續侵占東北各地，橫行不已，我們雖避免全面的衝突，但也應集中幾個旅的兵力，犧牲他三團人，給敵人以打擊，以挫其侵略氣焰，并取諒于國人”。于學忠還建議，吉、黑

兩省的軍事負責長官，都應各返防地掌握部隊。張學良當時說，“這些主張都甚好，我現正命榮翁生（榮臻的字）新編一軍，可即令他擔任這項任務。”翌日晚，張學良單獨邀于學忠談話，推托說，“因為榮翁生已率領部隊撤下，你的意見已經趕不及照辦。我已數次勸告吉、黑兩省的軍事負責長官返回原防，看他們的舉動，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說。”

在這個時候，平市各界人民、東北籍旅平學生以及東北軍的中下級官兵，都要求與敵人作戰，羣情激昂。張學良接見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國會的代​​表們說，“我姓張的如有賣國的事情，請你們將我打死，我都無怨。大家愛國，要從整個做去，總要使之平均發展。欲抵抗日本，必須中國統一；如果中國在統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說，此事不會發生。我如有賣國的行為，你們就是將我的頭顱割下，也是愿意的。”他又招見東北籍旅平學生會的代​​表們說，“我的聽從中央，忍辱負重，不求見諒于人，只求無愧于心。我敢斷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賣國；第二，不貪生，不怕死。我現以二事與同學們約：（一）請你們盡力研究中日間的條約關係和妥善解決途徑，有何意見，可隨時函告；（二）有愿投筆從戎的，請先行報名，以便將來我和你們一同抗日。”他又向主張立即與敵人作戰的中下級官佐們分別講話說，“我愛中國，我更愛東北，因為我的祖宗廬墓均在東北，如由余手失去東北，余心永遠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財產，作余個人的犧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隨、屢共患難的部屬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銜。日本這次來犯，其勢甚大，我們必須以全國之力赴之，始能與之周旋。如我不服從中央命令，只逞一時之憤，因東北問題而禍及全國，余之罪過，當更為嚴重。諸君愛國的熱忱，可暫蓄以待時，將來必有大可發揮的一日。”在這

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战乎？和乎？矛盾丛生，而在军事上的布置，外须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内又无东北军作战的整个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只有把一切的幻想寄托于国际联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对事变的措置情况。

江桥抗战和馬占山降日經過

謝 珂

一、日寇侵占辽吉后的黑龙江局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蔣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数日之間,沈阳、长春、吉林相繼淪陷。日寇于辽、吉得手之后,即积极进图黑龙江省,但因黑省远处在日寇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以外,且与苏联接壤,日寇进犯亦有所顧忌。当时洮辽鎮守使张海鵬叛变投敌,日寇乃謀利用张逆为前驅,使先攻占黑省,以便兵不血刃地再由张逆手中夺取过来。日寇遂大量接济张逆械弹,并派遣特务帮同张逆策划进犯黑省。

黑省自接到北平不抵抗主义电令后,又陸續听到辽、吉两省淪陷的慘状,并聞张海鵬在洮南有投敌攻黑的阴谋,人心頓呈不稳現象。当时,我任东北边防軍駐江副司令公署参謀长,遂即訪問龙江日領清水八百一,問:“日軍对黑省有何企图?”清水未具体答复,仅說:“日軍在东北是地方事件,决无領土野心”云云,此后清水有时也來訪問,意在探听消息。

黑省軍政两界自辽、吉陷落以后,頗为恐慌,并因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羣龙无首,如何应变,亦莫衷一是。日寇睹此情形,更大事制造日軍行将至黑的空气,意在恫吓,增加紛扰。省会龙江自

九月二十日起，市面交易几陷于断絕，迁往东荒（即黑龙江东部各县）及泰安鎮的人民絡繹于途。九月二十四日，各校奉教育厅令休假二十日，学生各返还原籍，羣众心理更加混乱。万福麟电令黑省，略謂：“黑省軍事暫由警务处处长竇联芳負責照料，參謀长謝珂副之”，但竇氏接电后并不关心也不負責，軍事上一切仍由我处理。

洮辽鎮守使张逆海鵬，于九月底有日軍几人到其私宅居住，允許供給大批械彈，张当即宣布独立，企图进犯黑省。消息传到龙江，全城大为震惊，重要人員的家屬有移居哈埠的，也有远走平津的。万国宾为了試探张逆的意图，派省府委員馬景桂前往洮南，伪称黑省有欢迎张氏之意。张逆当謂：“本人年近古稀，毫无野心，惟日人压迫太甚，部下主张分歧，暫赴黑省躲避亦无不可。”馬聞之急回黑省报告。九月二十八日，黑省警务处处长竇联芳、民政厅长刘廷选携北平张学良及万福麟电赴洮南，劝张坐鎮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人利用，致貽后世之譏。张初不悅，嗣經他人苦口力劝，张意稍悔。十月初，北平副司令行营委张海鵬为蒙边督办，万国宾亦派員至洮南訪张，表示好感。张于十月十一日派其长子张冠軍到黑省答礼，并接洽軍餉及給养問題，黑省当即委张冠軍为上校參事，并极力与张海鵬周旋，一般人士以为自此张海鵬与黑省可能走上和平的道路。但自十月初张逆得到日寇供給大盖枪两万枝，并允許随时接济彈药以后，即秘密召集所屬，討論进袭黑省的阴谋。张逆經其部下推为保安边防总司令，同时編八大处，积极扩充軍隊。消息传到了黑省后，洮昂路局长万国宾令将全路車輛陸續調到昂昂溪，以防张逆使用。

黑省自辽、吉淪陷以后，九月下旬即开始布置軍事，由軍署分

电海拉尔、满洲里、黑河和东荒各地的駐軍积极准备补充，听候随时調遣。当时黑省軍隊除王永盛第二十九旅、于兆麟第三十旅等两个国防旅調赴关內討伐石友三以外，在黑省的部队多半为省防部队，共約三万余人，其番号如下：

队	号	兵力	主官姓名	駐地	备考
步兵	第一旅	两团	张殿九	扎兰屯、昂 昂溪	护路任务
步兵	第二旅	两团	苏炳文	海拉尔	呼伦贝尔警 备司令、哈 满护路司令
步兵	第三旅	两团(騎 步各一)	馬占山	黑河	黑河警备司 令
騎兵	第一旅	三团	吳松林	克山、拜泉	
騎兵	第二旅	三团	程志远	滿洲里、扎 兰諾尔、小 蒿子等地	哈满护路副 司令，后改 騎八旅番号
卫队	团	三营	徐宝珍	龙江	
炮兵	团	三营	朴炳珊	泰安鎮	
工兵	营		刘潤川	龙江	
輜重兵	营		孟宪德	龙江	
保安	第一大隊		王克鎮	綏化	
保安	第二大隊		陈海胜	大賚	

十月初，我認为黑省环境复杂，日寇在所必图，遂向万国宾(身兼十余要职，黑省的政治、財經、交通、报纸、学校以及軍事中的人事問題等均与万有关系)建議，应电請北平副司令行营选派帶兵大員来省坐鎮，应付危局。万初尚犹疑，繼經我詳細解釋，說明洮南距省不远，一旦日寇援助张逆进犯，非常危险，为了鎮定人心、統一指揮，此举极有必要。万始認为可行，当即決議由我們两人分电北

平請示，請由馬占山、蘇炳文兩人中選派一人担負黑省責任。十月中旬得到回電，特任馬占山代理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黑省軍事派馬占山為總指揮，謝珂為副指揮兼參謀長。

軍署於九月下旬調中東路駐小蒿子站的程旅朱鳳陽團進駐秦來，對洮南方面警戒，派工兵一連駐守嫩江橋并筑構北岸陣地的據點工事。十月初，調駐拜泉的吳松林旅開到龍江附近待命。此時日領清水帶日軍步兵少佐林又秀向我提出要求，謂日軍擬派一中隊經洮昂路開到昂昂溪駐扎。我當即答复說，現在我軍由秦來至昂昂溪沿途軍隊甚多，如日軍來昂，途中恐有誤會。林請通知沿途軍隊，我答，現在軍事時期，為了保卫黑省安全，不能令任何外方軍隊通過；如日軍來昂，途中危險，本人不能負責。此後日軍亦未敢前來嘗試。

十月中旬，張逆海鵬聞黑省已派馬占山為主席，圖黑的空氣日益緊張。我即電北平副司令行營報告日寇援助張逆圖黑的情形并請示方略。復電大意謂：“如張逆海鵬進軍圖黑，應予以討伐，但對於日軍務須避免直接衝突”云云。

十月十五日上午，省政府召集各廳長、委員、國民黨省黨部負責人員和地方士紳等約五十餘人開會，軍署由我參加，討論应付當前局勢問題。北平來電內容，由我報告。會上大部人員認為張海鵬圖黑難以抗拒，其中以黑龍江劣紳李維周、趙仲仁為代表。寶聯芳認為日軍支援張海鵬，黑省兵單，抵抗非常不利。國民黨省黨部委員吳煥章認為可以抵抗，但响应的太少。開會結果，未能作出決定而散。軍署在省府開會以後，由我召集各處處長唐鳳甲、王治瀾、李冠三、金希均、蔡亞民、李鴻達等，及部隊方面衛隊團團長徐寶珍、炮兵團長朴炳珊等二十餘人，開會討論對張海鵬進犯黑省的對

策。各人均以北平既有电令指示，应遵照电令施行，最后決議准备即时迎击。我以奋勇杀敌并应严守纪律鼓励出发部队，并飭軍需处发餉一个月，借支一个月，安置家眷。我随即下令即日夜間卫队团全部出发，工兵营两連、輜重兵一連、炮兵一营归徐宝珍团长指揮，开赴嫩江桥北岸构筑陣地，并令軍务、軍医两处迅速筹設运输、救护机构，并将庫存的九十九挺捷克式輕机枪（原有百挺，有一挺拿去作模型仿造）发到卫队团使用。当时万国宾反对发枪，对我說：“这是督办（万福麟）购置的，不請示督办不能动用。”我向万解釋，“辽宁、吉林陷落时，成箱的枪械交与日寇，今天迎敌非常需要，如黑省不亡，枪仍存在士兵的手中，假如淪陷，在士兵手中比成箱損失好的多。”万理屈詞穷，終于不得不同意发給卫队团使用。当軍队决定出发时，竇联芳向我要求說：“千万不可打。”我說：“北平有电令，如何不打？”竇說：“只要不打，将来責任由我負。”我說：“这是大家决定的，你負不了这个責任。”至是，省府以万国宾为首的厅长、委員等均連夜逃到哈尔滨，公安局长梁橫也逃往哈埠。万国宾逃哈时携有大小皮箱十数件，到哈后即搶购金票，哈埠金票价格一时为之暴涨。日領清水請求保护，于十七日夜車率領館員退往哈尔滨，行前有致我保护侨民的謝函一件。我为了維持市面秩序，暫派朴炳珊为龙江警备司令，将炮兵两营开进省城备用。派公安局督察长刘允升代理局长，并令教导队学生暫時維持地方治安，同时由軍署电令馬、苏两旅各抽調步兵一团开到昂昂溪，电滿洲里旅积极准备补充待命。另电哈滿护路軍司令将护路部队急速从新布置，保护交通安全。

张逆海鵬于十月十三日派少将徐景隆带三个团为前鋒进犯黑省，十五日开到秦来，同时有日軍飞机两架到龙江附近上空示威。

我方令駐泰来的朱凤阳騎兵团撤到泰康以西，掩护江桥我軍左翼的安全。十六日拂晓，张逆前鋒进抵江桥南端，我軍开炮迎击，伪司令徐景隆誤触我駐守江桥工兵埋在南岸的地雷陣亡。我軍当即齐出陣地进行袭击，把张逆三个团一齐击潰，四散逃走。同时我軍把江桥破坏三孔，阻止敌軍再犯。日寇以张逆軍隊質量太弱，且无斗志，必須增派日軍进攻黑省，才能成功。

二、馬占山到龙江就职

馬占山在黑河接到代职电令后，即率步兵李青山团乘大兴輪西上，同时并电促在哈的寶联芳、赵仲仁等返省。馬于十月十九日午后二时半抵哈，即搭东鉄三时的車赴龙江，当夜到达。是时黑省重要机关接到万福麟电令，凡擅离省者以弃职潛逃論罪，因此，寶联芳、万国宾等亦回龙江。二十日上午，馬占山正式就任代理主席的职务，当发表朴炳珊为黑龙江省城警备司令，并向各省市、各党部、各报館发出就职通电，同时万福麟对黑龙江省城及各县父老兄弟发出說明辞职原因的通电。馬占山就职后，即致电前方激励将士，并发出悬赏购买张海鵬首級的布告，張貼各处。当馬占山就任代理主席后，我就把軍署一切情形詳細汇报，关于物資款項、軍用物品等令負責部門即時开列清單詳細呈报馬占山存查。一日，万国宾向我說：“馬占山到此是指揮軍事的，关于軍署一切物品应由參謀长負責支配，馬应另組指揮部，要啥可向參謀长負責商請。”我說：“現在大敌当前，黑省大局如此危險，还能分家么？馬主席既然負軍政的責任，一切事务应向馬請示，各項物資更該由馬支配。我今后一切应服从馬主席，否則黑省前途不堪設想。”万国宾的計策未得施行，即派其表兄弟张中校副官印刷传单对我造謠攻击，进行

商問。我見傳單後，把情形向馬說明，因此在江橋抗戰期間，普通事務均順利無間。

十月中旬，有駐洮索鐵路沿綫的東北屯壘軍少將統帶苑崇谷帶領步兵三團、騎兵一團、炮兵一營，由景星繞道來省（軍隊由中東路運到昂昂溪），馬占山命令苑部改編為暫編步兵第一旅，並電告北平備案，隨即下令該旅開駐大興以西布防，騎兵暫在富拉爾基以西對景星方面警戒。

三、日寇進攻黑省的準備

馬占山就職後，日領清水亦於十月二十日由哈回任，同時到哈的有日本上院議員七人，均為窺探黑省情形而來。

十月二十六日，日軍第二十九聯隊借口匪患，進占四洮全綫，此是日寇以軍隊援張逆海鵬犯黑的第一步。馬占山為了刺探張逆動靜，派國防處參謀長王靜修前往洮南。王於二十八日回省，據其報告，張有再犯黑省的準備。

十月二十七日，有日軍步兵少佐林又秀以關東軍司令代表名義向馬提出要求書：“限黑省政府於十一月三日以前將洮昂路嫩江橋修竣，否則，日方以實力掩護自行修理”，同時，日方極力宣傳，以為採取積極行動的前奏。二十九日，日方不俟我方動工修理，又由清水領事向省政府送致代修江橋的通牒，略謂：“洮昂系滿鐵借款鐵路，且於交通運輸經濟上有重大關係，如長此放任，華方的自行修理橋梁認為絕對不可能。故與有密切關係的滿鐵決即派人着手修理，希望黑省軍隊斷勿妨礙，並予以適當的保護。倘妨礙修理，則日本方面將予以適當的措施”等語。此是日寇援張犯黑的第二步。

张逆海鹏于十月三十日午前在洮南召集軍事會議，到有各团长，并有日軍官等十一名列席，討論再犯黑省的軍事計劃。日方以张在泰来的軍隊有向洮南撤退情形，深表不滿，日酋山本等当面斥张，并派日軍官須本、加藤、大矢、吉村四名与张同到泰来，監視张軍的行动。山本并由洮南派少佐林义秀再至龙江見馬占山，接洽修复江桥問題。日軍以監視张軍的軍官業經与张赴泰来，遂由四洮路派鉄甲車三列，內載重炮兩門、日軍一小队，进出洮昂路向嫩江桥进发。日軍少佐林义秀于十一月二日午前十时至黑省，偕日領清水謁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軍司令官的訓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滿鉄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語。当由馬氏答复：“南滿鉄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債权者不能代債務者修理，且洮昂路并非黑省所屬，亦不能代为承認由滿鉄兴修，可由黑省代为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林义秀悻悻而去。另有致馬占山通牒一件，內容如下：1.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2.至十一月三日正午止，南北两軍各由桥梁撤退至十公里以外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侵入其地域以內，修竣的日期，俟預計后，随时通知两軍；3.不承当上述要求或妨碍修理者，认为对日軍有敌意，即行使用武力。此无异是向黑軍进攻的通牒。

当日馬占山与我等討論研究对付日軍的策略，我說：“江桥陣地非常坚固（利用道木、鉄軌、鉄板构筑），如后撤，无异于詎防，尔后更难以抵御。我陣地距江桥桥头正面約四五里左右，是很好的桥头堡，日寇对此陣地感觉头痛，妄想欺騙我們舍去这个良好陣地。”当时黑省大汉奸赵仲仁在座，在当时形势之下，也未敢有所表示（有些會議馬邀赵参加）。因北平电令有避免向日軍直接冲突的

指示,各人均有所顧忌,不敢主张下令进攻日軍,但采取自卫措施是必要的,最后决定江桥陣地不能向后撤离,目前对日方采取应付的态度,如日方問及,即說已經向后方撤退十公里了;对修桥的事暫取放任态度。三日午后,日飞机两架飞到昂昂溪站上空偵察甚久始南去。十一月四日晨六时許,日領清水与我軍政当局会商,同乘齐克专車九零三次車赴大兴站,勘測已破坏的江桥(此桥是木制,距洮南站一百八十七公里),八时乘九零四次車归省,当时并未抵江桥附近,显系借辞偵察我方軍情。同时上午八时許,复有日机飞来散布传单于昂昂溪等站,大事恐吓;十一时許,日軍炮兵由桥南向我陣地轰击。我軍不得已乃采取自卫行动,也还击了几炮。

四、嫩江桥的激战

十一月三日上午十一时,日軍鉄甲車二列,士兵三十余名,开到江桥,并有飞机五架飞翔天空,实行以武力掩护修桥。我軍为避免与日軍冲突,即将少数防守江桥的部队撤退到本陣地。日軍飞机向我陣地投擲炸弹,伤我士兵九名。午后天黑时,日軍百余名渡过江桥(破坏处用木材垫好),对我陣地施行射击,并用飞机投弹,伤我士兵七名。至夜深时,因我方力求避免冲突,未与抵抗,日軍始行退去。

四日早五时,日軍少佐林义秀、日領書記早崎、我方秘书韓树业,为了避免两軍冲突,乘汽車到昂昂溪,会同石兰斌(石駐昂站,負中間指揮部責任)到前方哈尔葛江桥視察。石向我駐軍講話,林少佐亦向渡过江桥的日軍講話,彼此訓誡士兵严守紀律,避免冲突。当石正在訓話之际,林竟迫石签字承認將駐軍撤退,并迫石立

即下令。石謂本人是步三旅參謀長，無權下令。正交涉中，日軍突進入我防地，捕去我哨兵三名，雖經石再三交涉，終未放回。日軍此舉，顯系挑釁。是日午間，日軍百餘名在我左翼渡江，向我軍猛攻，並來飛機五架擲彈，我軍死傷數十名，大興車站亦被炸毀。至是，我軍忍無可忍，不得已實行正當自衛，給以還擊，日軍乃退。下午六時，日軍復以炮火掩護步兵一大隊渡江，並攜帶山炮多門，另有飛機七架、鐵甲車四列配合向我猛攻。我軍正面是徐寶珍衛隊團陣地，官兵皆激於義憤，奮勇殺敵。左翼是騎兵連防守，該連少校張連長陣亡。在炮戰中，我炮兵也陣亡連長一名。是日我方官兵計傷亡數十名。日軍連日苦戰，迄未得逞，乃於五日變更陣容，驅使張逆海鵬的軍隊在前，由日軍督飭向我軍猛攻，張部不支敗退。是役我軍傷亡百餘名；敵軍死傷數目，據日方發表，死者一百六十七人，傷六百餘名，張逆部死傷七百餘名。日寇素藐視黑軍，認為黑軍裝備較差，但我衛隊團自補充捷克式輕機槍以後，發揮了極大的戰鬥力量，出於日寇意料之外。自此，日寇廣播中說，黑軍也有新式武器云云。六日拂曉，日軍向我陣地大舉進攻，據聞是役有步兵兩聯隊、野炮四十餘門、重炮八門、飛機八架、鐵甲車四列，自早至晚，終日激戰。我軍傷亡太重，又遭敵機連續轟炸，運輸斷絕，為了保持余力，於六日下令江橋部隊乘夜撤到大興站以北整頓補充。

自十一月四日以來，日軍開始向我進攻，以六日最為激烈，上而飛機，下而大炮，晚間有探照燈指示炮兵射擊。是役敵軍傷亡亦重，聞有濱本步兵聯隊幾乎完全歼滅，高波騎兵隊亦死傷殆盡。這是日寇到東北以來空前損失的一次。我軍傷亡約六百餘名。自與日軍衝突以來，我方隨時將戰況向北平報告，新聞記者也發表消

息，从此各地賀电有如雪片飞来。我軍虽放弃江桥陣地，而全軍士氣仍極振奮。馬占山十一月七日將連日战况和退保三間房陣地的苦衷，以及誓与敌周旋到底、絕不屈証的決心，通电各方。

五、三間房的激战

三間房距江桥約五十华里，距龙江約七十华里。十月下旬，馬占山下令暫編步兵第一旅开駐三間房大小新庄一帶布防。十一月初，我率領參謀同苑崇谷旅长視察該綫地形，作为我軍第二道防綫。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間房大小新庄一帶的村落，构筑据点工事，并指派苑崇谷为該綫指揮官。

自十一月六日江桥守軍奉令撤到大兴以北整頓补充后，当派步三旅李青山团、步二旅吳德林团接大兴吳松林騎兵旅防地，并将該旅东調，掩护我軍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軍側攻。

馬占山于十一月七日早，率參謀处长金奎璧等乘汽車到前方視察，对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等加以嘉奖鼓励，并在昂昂溪中間指揮部指示收容补充等事宜。馬于八日下午回省，派我赴前方主持。北平副司令行营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因馬捍卫省土有功，来电奖譽，并令全权主持軍政，各將領对馬亦愿听命一切。惟省府委員赵仲仁別有阴謀，极力阻撓馬的軍事計劃。他謬称黑省代表，暗中曾与駐黑日領清水、駐哈日領大桥秘密接洽，欲使馬証出省垣，由张海鵬主政。乃日領已允，而战事忽剧，赵自此被日領拒絕往見。

十一月八日起，战事較緩，一由于日軍不敢輕視我軍，一由于国联对日有严重的劝告。但同时日軍少佐林义秀又向馬占山送致本庄繁強迫馬氏下野的通告，限时答复，林并以个人名义用书面表明日方真意，茲譯录于次：

本庄繁通告(十一月八日)

馬主席如欲避免日軍之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瀝試意，希速于八日夜十二时以前提出回答。此致黑龙江主席馬占山。

林义秀短札

考察現在之时局，避免战祸，維持地方治安为唯一之方法，即馬主席于此时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鵬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无他良策。

馬閱后均置之不理。

日軍在江桥一战損失頗重，竭力补充实力。第二师团长多門二郎九日晨自长春轉往洮南规划一切，旅順駐屯軍的重炮队于十日上午开抵公主岭，即晚由四洮路赴洮南。洮南近郊辟有飞机场。当时洮南方面发现救国軍，为蒙边四旗七县所組織，集众三千余人，在东平、鎮东起义，张逆部队进攻失利，日軍遂拨炮助战，因此进攻黑省暂时停止。日寇侵黑的損失，实出于意料以外，深恐消息传出，对其軍事不利，因此宣传黑軍得到苏联軍火接济。日軍經過这次失敗，对于黑省的侵略，除調重兵以外，并采取用少数飞机更番投弹的手段，以疲劳我軍，另以騎兵迂迴我軍側后，进行扰乱。景星、朱家坎方面曾发现过少数日軍，我方派程旅騎兵一部开駐景星，右翼已无所顧慮。

关于江桥战斗經過和撤守情形，馬占山于十日与我合銜的通电抄录于后：

(銜略)慨自辽吉事变，日軍对于黑省，必欲取而甘心，百計千方，思遂其所謂計劃。初則鼓惑张海鵬北犯，充其傀儡，我軍奉令阻止变軍，不得已將洮昂路江桥拆断数处，所謀因未得逞。繼則派其少佐林义秀来黑，以洮昂路江桥日本有債权关系为理由，引日領向我交涉，拟由滿鉄代为修复，并要求我軍退出江桥十五华里，张軍亦然。查我軍原駐距江桥十八华里之大兴車站，与所要求并不冲突，該少佐同时并声明日軍

除掩护工人修桥外，决不作军事行动。我军为尊重国联决议，避免日军口实计，隐忍曲全，无可如何。该军于三日夜突向我大兴驻兵投掷炸弹。我为和平计，曾与清水领事求双方避免冲突，遂于四日上午八时派石上校兰斌偕同该少佐赴江桥察勘，及促双方撤退，以免误会，俾便动工。当令我军开始向后方移动，而林义秀等甫离江桥，不意日军竟乘隙将我警戒哨兵掳去三兵，并发现挑战行为。经交涉至下午三时，该少佐偕领馆书记官早崎，由我方韩秘书树业、那副官连宿陪同乘专车再赴江桥视察。乃专车甫过大兴车站，即被日军飞机数架迎头纷投炸弹，那副官当被炸伤，专车不能前进，林等遂回省城，盖前方日军，方在向我猛烈攻击中也。我军将士悲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不施以正当自卫，稍抑敌锋，以保祖国疆土，以存华族人格，誓抛热血头颅，弗顾敌我强弱。占山等于无可如何之余，犹竭力保持和平之旨，严令将士只准防御，不得攻击。该少佐目睹日军此等行为，不仅不加制止，反更要胁我军退让，黑省一切由其宰割。呜乎耻矣！此次攻击大兴，日军四千余人，黄衣铜帽，大炮四十余门，飞机七八架，铁甲车三列。其过江攻击之兵，并无张海鹏军，是知张氏屡经劝告觉悟，声言系受日军愚弄压迫之情，于此殆亦有征也。日军自四日午以来，开始向我攻击，下而炮炸，上而飞机，陆空交施，凶暴至极。我将士拼死抵抗，不为所屈，碧血横流，再接再厉。占山等以大兴地势难守，未忍将士孤注一掷，因于六日下令左右互助掩护，再撤退至距江桥五十华里之三间房车站一带，以资固守。八日，该林少佐持本庄司令通告，令占山速将黑省政权授予张海鹏，否则日本军即进占黑龙江省城，现尚在交涉中。是役也，我军因无防空武器，致官兵伤亡五六百名之多。虽然，士气仍未稍减，依然振奋异常。现在雪地冰天，防御横暴，不惟当地各界共见共闻，即各友邦人士亦所目睹。诚恐日方颠倒责任，欺人自欺，并以举国同胞，殷殷企注，此次日军侵入北满之事实，与其宣言大相反背，爰将经过本末情形宣告中外，以明真相，而定是非。占山等守土有责，爱国心同，早知沙塞孤军，难抗强日，愿以存亡所系，公理攸关，岂能不与周旋，坐以待毙？援田横五百之义，本少康一旅之诚，谨先我同胞而赴国难焉。特电奉达，敬盼垂察。马占山、谢珂叩灰(十日)印

日寇在江桥受挫后，宣传苏联接济我方军火，以掩饰其薄弱真

象，馬占山于十一日通电駁斥。是日午日机两架飞昂昂溪上空偵察，經我射击，向南方飞去。本日晨，哈尔滨各界組織慰劳团約六七十人，携带物品到龙江慰問，当由馬占山代表全体将士致謝，并向各代表表示抗敌决心，誓不屈服。各代表分头到各医院慰問受伤战士，午后返哈。是日有英伦《每日邮报》及上海《密勒氏評論报》記者亦訪問了馬氏，对馬氏英勇奋战称贊不已。自茲以后，中国各地紛紛汇款劳軍，甚至外国青年来信請求馬占山签字的大有人在。中外报纸均爭先登載黑省抗日消息，这足以說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为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深恶痛絕。

黑省战事消沉了四日，至十二日战事又重新沸热。十一月十二日午时，林义秀又送来本庄繁的通告，提出三点要求：1. 馬占山下野；2. 黑軍由省垣撤退；3. 日軍部为保証洮昂路的安全，將向洮昂路昂昂溪行动，并限十二日夜十二时以前回答。馬占山当电北平請示张学良將軍，得复电“飭死守，勿退却”。十二日晚馬答复日方，略謂：“1. 下野本无不可，但須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代，如张海鵬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2. 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領土，我自有权，非日本所能干涉；3. 昂昂溪車站为中国与苏联合营的鉄路站，貴軍要求进兵，殊与芳泽代表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領土野心一語自相矛盾。且余奉令保守疆土，在未奉到明令让渡与日本前，碍难照办，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貴国所应要求”云云。其实日寇未等答复，早已在前綫采取行动。

我軍自江桥撤退以后，馬占山和我曾經召集參謀、軍务、軍械等处秘密討論，認為日寇虽然暂时受挫，决不甘心，三間房陣地薄弱，很难持久，应速筹备下一部署；万不得已，軍政两署移駐海伦，

与哈埠抗日军队成为犄角之势，主要阵地放在克山、拜泉、泰安镇一带。此种计划虽已决定，但严守秘密。库存步枪三千余枝、子弹数百万粒，应利用晚间向泰安镇运走，尔后分存东荒各县，连同其他军用物品为将来补充编队之用，并决定自十二日起，由军务、军械两处负责运输。

十二日午后一时许，日军先以骑兵五六百名向我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附近）等处吴旅防地进攻，激战历四十分钟敌始退却。午后三时，日军大部来攻，有长谷旅团在我左翼，森连满铁守备队在我右翼，并飞机数架投弹助攻。经我苑旅竭力抵抗，至午后六时，敌军改为炮战，我军亦以炮还击，八时停战。是夜程旅骑兵两团奉令由满洲里、扎兰诺尔开到昂昂溪待命。十三日拂晓，日军攻我新立屯阵地，飞机数架投弹助战，几次进扑，经我抵抗，均未得逞。十四日拂晓，日军骑兵扰我汤池、蘑菇溪间的骑兵防线，并用重炮向我射击，大兴方面战斗亦烈，并有坦克数辆助战。我程旅骑兵涂全胜团向前增加，士气一振。萨力布骑兵团亦继续开到增援，蘑菇溪方面调卫队团两营增援，三间房阵地派步一旅孙鸿裕团两营增援，我全线阵地与敌激战一日，敌军均未得逞。

十五日早三时，马占山乘载重车带参谋、卫兵赴前线督战，先到昂昂溪指挥部。适驻黑日领清水于十四日夜由省到昂候车，谓将赴哈，临行马曾挽留，并谓：“领事离黑，应按外交惯例签字再去”。清水谓：“此行是本人私事，其他一概不知，故未照办”，其余馆员亦均撤退。这是日军大举进攻省垣的信号。当日晨，洮昂线战事稍停，但日军后方大部援军开到。我方令綏化一带的保安大队王克镇部二千名编为一个独立团，加入大兴正面。是日午日军坦克袭我前进阵地，我军稍退。十六日上午十一时，日飞机一架在

富拉尔基上空投弹，有数枚落在东铁工房附近，东铁当局大为恐慌，急电哈总站请示。同时日军以步、骑、炮、空、坦克约四千余名向我全线猛攻，我军奋勇抵抗，双方鏖战，极为猛烈。我军以装备太差，死伤甚重。日机数十架飞我上空，适天气骤变，大风突起，尘土蔽天，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敌飞机失效。午后三时许，日军攻势渐缓。十七日，日军利用飞机轰炸和重炮射击，以疲劳我军。当时参加的张逆海鹏的部队，除被击毙者外，多数潜逃，战场上完全由日军作战。十八日晨，日骑、步、炮约三个联队对我三间房主阵地施行猛攻，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激战至午，多门师团前来增援。我军伤亡过重，不得已乘夜向昂昂溪方向撤退，大兴方面同时亦向后撤，沿途被飞机轰炸，死伤的极多，步二旅团长吴德林在乌呼马站身受重伤。当十八日激战中，马占山由昂昂溪站用军用电话调省垣某团，限一小时乘车开到前方，该团迟到了三小时，马愤极，当将该团长枪决。连日以来，部队伤亡过重，马下令全军退保省垣，当夜电告北平，并向各方面发出撤兵通电。

十九日四时，马率军、政两署人员退出省垣，由商务会组织商团维持地方秩序。日军前锋于是日午越过东铁乌黑站，见我军业已撤走，午后二时骑兵一部入城；晚间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大部进入省垣，分驻城内外各地，我方军用物资，一无所得。多门驻于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城内街上满布日军，张贴各种标语，路绝行人，凄惨万状，惟见日旗满街飘扬。二十日下午，日骑兵五百余名沿齐克路追我到宁年站，经我骑兵迎击，退归黑垣。至是，日人委张景惠兼任伪省长，成立黑省伪政权，并迫龙江各界筹备欢迎。自此，龙江入于傀儡政治的局面。

六、黑軍撤抵海倫

二十一日馬占山等抵达克山，所部尚有二万余人，即在該地收容軍隊，并配备防务。二十二日召开軍事會議，討論布防問題，到有謝珂、程志远、吳松林、苑崇谷、朴炳珊、徐宝珍、金奎璧等，决定以程志远为騎兵总指揮，吳松林为副指揮，駐克山；程旅朱凤阳团与吳旅王克鎮团（綏化保安队改編）駐泰安鎮；苑崇谷为步兵总指揮，徐宝珍为副指揮，駐拜泉；其他各部由各指揮妥为布置；炮工輜駐于海倫；警备司令仍由朴炳珊担任，負海倫治安責任；前方各部布置，对敌采取守勢。

二十三日，馬占山和我到达海倫，駐于广信涌油坊。是日，馬占山电报北平及各地，略謂：“占山率同軍、政两署人員移駐海倫，部队分駐克山、拜泉等地，敬待后命”云云。至此，虽有少数日机到齐克路上空偵察，殊少軍事行动。日寇既占龙江，据有政治中心，对于海倫乃改用政治手腕进行阴谋活动。

黑軍集中克山、拜泉以后，前方軍隊亦陸續收容到了各防地，从事补充整頓。軍、政两署均設在海倫广信涌油坊內，各机关分設在各商号。省府委員如民政厅长刘廷选、建設厅长馬景桂、教育厅长郑林皋、省委潘景武等，先后达海倫。党部委員到此者有吳煥章、王宾卿、王化南等，其他各机关重要職員百余人亦先后到此。

馬占山积极整頓軍事，編制新軍。有許多东北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紛紛到海倫从戎。关內各地学生有“援馬团”、“义勇軍”等組織，愿赴黑援馬。馬对东北学生到海倫要求入伍的，令苑崇谷組織“学生团”，担負各地宣传工作；对关內学生則有“齐

电”請各报館轉各省市劝阻东来,并婉謝其爱国热忱。这足証明当时全国人民对黑省抗日的热烈支援。肇东一带蒙古王公对馬孤軍奋战,极表欽佩,亦要求收編蒙旗精壯,自成一軍,先在肇州一带訓練,有事再供指揮。海外国内各地慰劳捐款接济紛来。馬占山派专人张瑞三担任保管,因此张瑞三常往来海、哈两地,报告捐款汇存的情况。

此时日軍因即将有事于辽西,而且也知道海伦地近山林,人亦强悍,亦不愿急作軍事行动。日軍作战部队多由南滿調来,御寒装备甚差,进入黑垣时,冻伤过半,黑垣市上的烏拉(防寒鞋)毡靴強购一光,因而对于东荒各地的严寒亦有所畏惧。

七、日寇与汉奸合謀誘馬

十一月三十日,日駐黑师团长多門忽致函海伦馬占山,提出下列四項:1. 馬占山对于克山、泰安鎮的中国軍隊如能劝說使之投降时,可通知新井顧問;2. 馬占山如确定回省,日期亦可通知新井顧問,林少佐亲往迎接至泰安鎮亦可;3. 馬占山生命由林少佐担保,絕无意外情事;4. 馬占山准带卫队八十名入城。馬接到此函后,置之不理。

当馬占山到海伦后,汉奸赵仲仁亦到海伦。赵的汉奸行为久已暴露,但馬对赵始終接近,且有时参与机密事項。赵常到哈見张景惠和日寇,并时常劝馬亲日。另有哈尔滨义祥火磨經理韓云阶(后为黑伪省长,精通日語)常見馬密談,并与赵仲仁内外結合,往来于海、哈之間作汉奸活动。虽歷經我等向馬建議远离此輩,馬总以赵仲仁胆小怕事,韓是买卖人,无关輕重来答复。实际上此两汉奸已成为馬的入幕之宾,正在密謀將馬出賣。

馬占山對多門來函既未置理，因此日寇又派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一行到海倫來作說客。此事與趙、韓兩漢奸關係甚大。十二月六日，本庄繁派板垣偕囑托福島、主計染宮及駐沈英法記者一行五人于當日到哈，下榻于北滿旅館，午時與張景惠及黑省劣紳趙仲仁會見，相談極密。午後一時，板垣乘飛機赴黑垣與日寇第八混成旅團長鈴木美通會見，午後三時仍回哈埠，即令張景惠、趙仲仁當面向海倫通電話與馬占山接談，謂渠將往海倫相晤。馬即于電話中拒絕，謂黑東民氣甚盛，日軍官切勿前來，否則發生意外不負責任；并說本人自離黑垣，已與日人無有直接交涉的必要，故無須彼此會談。當時板垣即接听筒向馬說話，謂日軍欲請馬主席仍回黑龍江，馬置不答，挂上听筒而去。此是六日晚間的情形。

七日晨八時，板垣不待馬占山的許可，徑率一行日人及哈日領館員彬山岡野、大坂《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各報記者，由趙仲仁與前充黑龍江省府秘書韓述彭等乘車過江，到呼海路馬家船口站，先由趙仲仁以電話向海倫通話，代日人要求准許會見。馬初不允，嗣經趙一再說項，并謂板垣前去決不至有惡意，于是馬乃允許在呼海路綏化站相晤。呼海路即挂專車一列，于上午十時五十分，自馬家船口開行。其時哈埠各報記者聞訊，多趕往要求同行，板垣不能拒絕，遂同乘一車前往。專車沿站未停，于午後一時五十分抵綏化站。停車後復由趙仲仁致海倫一電話，得復以綏化既無方便地點，改在海倫相見。專車繼續向海倫進發，趙仲仁、韓述彭及中國新聞記者先搭普通客車前往，于午後三時半開車，晚七時至海倫。板垣與英、日、法記者于四時半開車，晚八時抵海倫。

當板垣一行與漢奸趙仲仁等到海倫後，馬派副官導往廣信當休息，各報記者住于益泰永商店。馬與我商議，擬先由我會見，看

来意如何再决定应付之策。我說：“板垣此来，当然是赵仲仁等与日人商妥的奸計，只要主席不答应具体条件就好，有什么困难可向下推；日人来到我們范围之內，量也不敢有何強迫行动。”馬說：“你可先会会他，然后再研究办法。”我即帶翻譯乘汽車到广信当与板垣談話，板垣現出不安情緒，要求拜見馬占山。我說：“馬主席現在很忙，貴官可将来意說明，我向馬主席报告后，再决定会見時間。”板垣說：“本人欽佩馬主席英勇，此次专为亲善拜見而来，別无他意。”我說：“如有书面要求，可以轉呈。”板垣說：“无有。”我即回見馬占山說：“板垣表示无何书面要求，为亲善拜見而来。”馬說：“我先分头会見中外記者，以后再会見板垣。”十时許馬先邀中国記者談他本人的宗旨，謂：“無論日人如何前来利誘威胁，我絕不能为降將軍，或与日方妥協”，并囑发表消息須一致，以免因日人来此而使外間发生誤会。十一时半馬接見随板垣同来之外报記者，当表示云：“此次中日事件，实属不幸，不过本人守土有責，不能不謀自卫，今后希望中、日、英、法等輿論界，不分界限，共同努力，使此类不幸事件永不发生，則世界真正和平，方能实现。”各記者詢問約二十分钟退出。

夜十二时，赵仲仁偕板垣来訪，馬即于居所广信涌內接見。日方为随板垣前来的囑托福島、主計染宮等四人，馬則偕我及翻譯二人与板垣見面，双方首致寒暄。板垣并取出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名刺，起立致詞，謂：“余等此来系代表帝国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訓令，向貴方提出兩項要求：（一）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东亚和平；（二）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兩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敝国关东軍司令官尊重貴主席意旨，希望貴主席变更抗日举动，对关东軍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倘能立

刻双方停止軍事行动，則敵国司令官为本以前救济东北民众之意，决仍将黑省軍权交由貴主席担任，以共維东亚之和平。本人又有声明者：敵国关东軍已下最大之决心，决不許东北任何处有抗日举动之繼續存在，即敵国政府亦有整个之計劃使其实现，为将来彻底改造东三省之步驟。至敵国关东軍对于呼海、齐克路所以无所表示者，因欽佩貴主席之英勇，故不即实行軍事計劃”，云云。馬占山当即答謂：“关于貴代表所提第一項，本主席极端贊成。前次冲突，本主席为保全守土，实为环境促成，此后尚望双方遵照貴代表意見施行。关于第二項，亦极同意，但必須尊重中国主权，为誠意的亲善。黑龙江省此次所采取的行動，純屬自卫，本主席受命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对于中日間的一切糾紛亦望貴国政府与敵国政府早日获得正当的解决。”板垣复向馬詢問：（一）此次冲突系一时誤会，能否即此諒解？（二）对此次战事觀感如何？（三）現在究作何态度？对日軍是否仍持反抗行动？請作明确答复。馬所答复大致与前相同，对于所詢今后态度問題，則謂：“个人态度早为貴方所明了，貴軍如不相迫，即可保持和平”，云云。至是，赵仲仁向板垣詢問：“貴參謀长所提不再繼續抗日行动，是否請馬主席签字？”板垣点首称：“是”。我当即起立說：“今天是中、日两方亲善的会談，也可說是彼此交換意見的会談。关于和平是我方的愿望，馬主席业已明确答复；所謂对日态度問題，如日方不来攻我，我們决不反攻。签字一节，必須召集各团长以上的开会同意才行；否則馬主席一人签字，也不能生效。”至是会談已近尾声。稍停，齐到另一客室休息。此时板垣、福島等令随来的人急电沈、哈，状至喜悅，若有莫大收获者。尔后板垣在日本陸軍中扶搖直上，亦足以說明是“說馬”有功。移时，中外記者紛紛来室拍照。日人請馬占山坐于沙发当

中，板垣等圍馬而座。漢奸趙仲仁興奮地向馬說：“這是鎂光照象，請不要害怕。”各記者連續拍攝數次，拍完后各回宿處。不久之后，中外報紙把攝影紛紛登出。翌晨板垣復訪馬一次，早九時，一行十餘由海倫出發，午后四時抵哈，即轉沈陽報告。這是日寇誘馬重要的一幕。

八日晚，我在廣信涌嚴厲質問趙仲仁，“昨晚會上你為什麼要求馬主席簽字？”并斥責趙的賣國行為。趙笑臉應付說：“不要誤會。”馬占山恐有衝突，出面解勸，因而我亦未便深究。

自從板垣在海倫晤馬以後，外間對馬頗多懷疑。馬于九日通電表示態度，略謂：“占山一介武夫，忝主省權，上維國家依畀之殷，下凜同胞責望之切，守土系屬天職，自衛斯為神聖。敵軍入寇，不拒奚為？前以不忍省垣慘遭兵燹，未能與城偕亡，方覺慚愧不勝，乃重荷海內外同胞錯愛，既承諄諄訓勉鼓勵，復蒙紛紛助款接濟，大義如此，雖死難報。惟有謹率我黑省民眾從事自救，此身存在，誓不屈服。夫人孰不死，與其奴顏婢膝以苟生，曷若救國衛民而早死，此中去從，已具決心”，云云。

十二月十一日，馬占山乘車到呼蘭，八時二十分過江與張景惠相會，座中黑省代表有劣紳趙仲仁、吉祥、李維周等，哈埠有劣紳于鏡濤、魏紹周、梁禹襄、英順等，會議內容極密。外間紛傳馬、張會晤是馬對日屈服的象征。

馬自到哈會張后，某日深夜對我說：“你知道近來日軍為什麼不向我們進攻么？”我說：“東荒地勢複雜，我們還有實力，用兵費力。”馬說：“不對，這裡有溥儀的一段關係。十餘年前，我在天津，因為好奇，想看看小皇上是怎樣的一個人，經人介紹見了溥儀。我叩了一個頭，談了些話，最后溥儀給了我一張古畫、一個古瓶。從

此以后，他記着了我是馬旅长占山。这件过去的事我早已不在意了。这次抗日失利，听說溥仪向日方要求說，‘馬占山是我的人，不要再打了，’所以日本不向我們繼續进攻。”我說：“这不象一个什么理由。”馬繼續說：“另外还听日本人說，如我愿回省垣，全省軍事还交給我，并給我們軍隊換新枪十万枝，到那时，我們有了力量，愿抗日也不晚。現在錦州也不能保了，张学良永远回不到东北了。我們也應該想自存之道，保全实力。不向日軍冲突，就有办法。”我說：“这个想法是永远办不到的，日人知道你有抗日的心理，他那能給你換这些新枪呢？千万不可听赵仲仁的謊話，他是为了自己，甘作日本的走狗。主席的名誉是全体将士拥护出来的，中外皆知，如对日屈服，使援助我們的大失所望。現在我們遇有何种困难，或走到任何地方，也有人帮助接济，大家全不愿对日投降，請好好地考虑考虑。”馬点首示意說：“我对日本决不屈服。”

在馬、张会晤后不久，一天晚上苑崇谷、朴炳珊、金奎璧等訪我密談。苑說：“現在外間对馬非常不滿，我們打日本牺牲了不少人，馬的态度令人不解。汉奸韓云阶常經過我的防地，这个汉奸我想秘密杀掉他，如何？”我說：“汉奸自然可恨，尤以赵仲仁更坏，我曾向馬談过几次，不要与赵、韓这类人接近，馬总說他对日本絕不屈服，赵、韓沒有关系。杀一个韓云阶并不費事，恐怕我們内部引起了內訌，也可能弄到自相殘杀起来（軍隊中有学生、行伍两派）。况馬的情形中央和远方多不清楚，一旦内部发生冲突，恰是日人所希望的，我們的是非也难使外人明了。目下主要關鍵是使馬本人明白是非，才有希望。”朴、金认为也对，苑崇谷也不坚持主张。但不久苑即辞职入关，旅长由朴炳珊接充，炮兵团长由金奎璧接充。

八、龙江傀儡政府的丑剧

张景惠为人昏庸，是颇适合日寇要求的一个标准傀儡，辽吉失陷，日寇利用他来应付哈局，龙江失陷，又利用他来应付黑局。板垣由海伦返哈以后，极力诱导马占山与张景惠联络。张、马固然有旧，其中又有一个典型汉奸赵仲仁与马接近，因此日寇利用他对马进行软化，极为相宜。马自到海伦以来，见于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形，内心矛盾很多，主要是想名利双保。他虽然加强扩军，只是为了挟此以自重，而抗日情绪则逐渐消沉下去。

龙江是黑省政治的中心，日寇想利用张景惠主持，但张不愿舍去哈尔滨地盘，也很愿意拉马占山下水。龙江汉奸内部有赵仲仁、李维周两派，互争雄长，并不合日人的口味，张景惠也处理不了这个丑剧。黑省的太上主人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林也对两派汉奸的明争暗斗感觉头痛。因此，张推荐马，林也认为马对黑省有相当的威望，表示同意。

张景惠十一月二十七日派于镜寰率特区警备队五百名由哈赴黑，翌晨特警处副处长英顺亦偕同顾问数人赴黑，准备接收黑政。

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与张景惠接洽后，张即于当日下午三时偕特区长官公署日本顾问新田等二十余人乘车赴黑垣，夜二时半到站，赴官银号休息，并定七日上午十时接印视事。是日欢迎者除华方职员外，有日领事清水、外务主事早崎、满铁总办河野正直、旅团长铃木、特务机关长林义秀等及苏领事博念格。七日晨军省两署满布岗位，省政府大礼堂交叉党国旗，中置中山遗象，中、日、苏各机关职员参与典礼者达数百名之多。行礼时首向党国旗行三鞠躬礼，继请张氏启印。迨欢迎者向张氏行礼时，

鈴木遼尔登台，立于張氏右側接受禮式。繼請張氏宣言，張默无一語，囑外交辦事處主任王春將預先撰就的宣言稿用日語朗誦后，復譯華語。其中全屬日人口吻，听之令人齒冷。次由代理駐黑領事早崎致詞。一幕醜劇既畢，張景惠即于当日下午七時偕英順、宋文林等返哈。

張景惠就任省長，事先既得馬占山同意，关于代理主持黑政的人选，也得与馬占山商量，馬、張兩方遂于一月十日商洽妥協，派黑省富紳吉祥为伪代理省長（時吉充兩署顧問），馬占山派国防籌備處參謀長王靜修、民政廳長劉廷選、警務處長寶聯芳來省輔佐吉祥。哄傳多日的龍江傀儡政權就如此登場了。

代理伪省長吉祥視事后，一月十三日日特務機關長林义秀到省署声称洮昂路不抵債，胁迫其承認以齊克路作价抵債。吉以本人系屬暫代，拒不敢承。林大怒，急電張景惠速飭訂約，遂于十五日簽字。繼又要求割黑垣烟酒公賣局、省黨部、子藥庫、中學、農業學校、中國銀行、農礦廳、南大營等處，为日軍永久公用地；划興隆街为界，南为日軍駐屯區，北为華界，出入駐屯區不准佩帶武器。吉祥一一承認。日憲兵隊迁入省黨部，中學、農校为鈴木旅團駐所，于是勾結流氓，收買土地，包攬詞訟，几乎无惡不作。

一月十六日馬占山派程旅涂全勝、朱鳳陽兩團，各編一營開駐黑垣，二十二日安全抵省。張景惠即飭吉祥、商務會長楊香秋、韓雨三、李維周等赴海倫，迎請馬占山返黑坐鎮，并召劉鈞衡赴哈磋商包圍馬氏办法。但此時馬占山采取暫与周旋、待时而动的态度。二月一日有馬占山为首的十五將領聯銜表明心迹的通电，內有：“占山等謹率部曲，效死杀敌，念茲在茲，义无反顾。惟由我海內外同胞，共凜匹夫有責之义，羣起动员，毋任各个击破而保我子孙，还

我河山，在此一舉。彼有良械，我有熱血，精神終勝物質，勝算貴在決心。禍燃眉急，切共圖之，并盼各友邦人士一致主持公道”，云云。列名次序為馬占山、謝珂、蘇炳文、程志遠、張殿九、苑崇谷、吳松林、王爾瞻、崔伯山、徐景德、朴炳珊、徐寶珍、石蘭斌、周興岐、陳海勝。

吉祥只有三、二秘書，不分科室，到職月余，除訂約簽押、傳達日人意見外，別無他事。二月十一日為慶祝日本建國紀念日，并預祝所謂“滿蒙新國家”。是日（陰曆正月初六日）日軍當局指定龍江飯店為宴會地址。該處滿貼標語，懸掛各國旗幟（無青天白日旗），五彩繽紛，狀至華麗，并以龍江公園為慶祝場所。日方參加的有旅團長鈴木美通、特務機關長林義秀、憲兵隊長河野、滿鐵公所所長太田、日領清水等，及步炮兵千余名，惟蘇領未到。華方到者代省長吉祥、參謀長王靜修、前省議會議長李維周、團長涂全勝、朱鳳陽、公安局長劉允升、警備大隊長王丕承等百余人。園內觸目皆是“慶祝新政”、“勿惑謠言”、“慶祝新國家成立”、“日本建國紀念日”、“東北同胞與東北民族聯絡一致”、“采列國新政，協和萬邦”等等不倫不類的標語。會場設望江樓下，中置巨案，交叉旭日旗，于日本軍樂隊奏樂聲中，一些叛逆丑類行禮如儀。更有飛機一架于空中遍散各種傳單，日炮兵隊發射實彈一百零一发，聲震天地，居民失色。禮畢已午後一時，乃列隊游行，由日軍樂隊率領，出公園向北繞行各街，最后到龍江飯店而散。日、華官員入議，首由鈴木美通致詞，略謂：“本日為我大日本帝國之最堪慶祝的紀念日，更為滿蒙新國家建設將成的時節，斯乃我大日本帝國本諸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以建國而無變者。此次滿蒙新國家建設目的，亦為東亞永久和平并發展在滿各民族之幸福。故今后彼此兩國家，其主張既相同，

自能相依相扶，共負使命，迈进前程，斯乃相信而无疑者也。本諸此意，故吾人希望新国家之早日建成为盼。遙于北滿敬祝紀念佳节，預祝滿蒙新国家之成立。”旋由伪代省长吉祥答詞，略謂：“若斯清和佳日，适为大日本帝国之紀元佳节，又为我滿蒙新国家将行成立之时，实堪大庆。故吾深盼邻邦厚助，使我东北善政早施，以苏民困为盼。謹以此意敬祝鈴木司令官以下各中外諸人之幸福”，云云。鈴木高呼万岁，众叛徒皆唱和之，始散。丑态百出，亦可見日寇視傀儡直如玩物。

九、馬占山投降日寇

馬占山自与張景惠接洽以来，外間对馬的謠言頗多，迨二月十六日馬飞沈陽参加所謂四巨头（即張景惠、臧式毅、熙洽、馬占山）會議以后，馬占山出賣黑龍江抗战的面貌已經公开。九一八以来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日寇兵不血刃，几天之內即侵占辽吉两省重要城市，黑龍江將士在人民援助下，江桥一战稍示抵抗，即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贊揚，紛电馳援，并捐助大量金錢和物資，而馬竟辜負人民的期望，投降日寇，因此，全国人民和黑龍江將士非常憤慨，甚至当时上海新出的馬占山牌香烟也停止出售。据聞馬占山在海倫未赴沈陽之前，曾于二月十二日致国民党中央政府一电“表明心迹”。

东北自蔣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以来，助长了日寇侵略的凶焰，挫折了人民抗敌的信心；而龍江一战，虽屬局部，但对于人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有很大的鼓舞作用。馬占山想委曲自全于气焰方張的日帝国主义之下，純是一种妄想。馬自退守海倫以后，始終有未解决的矛盾存在，在一切措施上反映极多，最显著的是一面說

对日絕不屈服，一面与汉奸保持联系，最后终于重返龙江，把全国共同賜与的民族英雄荣誉竟抛弃于不顾，使黑省昔日共同抗敌结成的团体陷于分化与瓦解，实为可惜。

馬占山二月十六日到沈，据說是接受臧式毅所謂“联省自治”的主张，到后受到日寇的威胁，变为接受“建国會議”。当时日寇将預定的建設伪国計劃分交汉奸于冲汉、赵欣伯等当面迫令四人接受，并限七日以内将“新国家”成立，且指定荣孟枚、宋文林为建国宣言起草者，所謂“联省自治”，至是竟成泡影。建国計劃宣言內容，主要是要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令各人签字承認。当时馬占山未允签字，于二月十八日回哈轉赴海伦。二月二十一日馬致各方通电中有“現在惟有一面应付事机，一面另謀瓜代，于最短期間接替有人，应即負咎引退，以謝国人”云云，暗示回省之意。

二月二十三日，馬帶卫队二百名和各厅处职员等乘中东路車轉道龙江，于当日十一时抵黑垣。日人对馬欢迎，別有用心，除在各处張貼标語外，十二时騎、炮兵紛紛出动，在龙沙公园演习，并向西江沿一带放实弹炮一百发，飞机迴翔天空散发传单，在示威之中以表示庆祝。日酋鈴木美通率領欢迎者至軍署，向馬表示欢迎，并請致詞。馬竟丧失民族立場地說：“余病尚未痊愈，謹以一二語告諸君。現在国家已經如此，故余应民众之力請，不得已而归来，想余的初心諸位概已明了。現在新国家已将实现，惟希大众今后对于地方、对于己身，皆应彻底努力为是。至于以前与日軍誤会，扰民实深，今日思之，甚为慚愧”云云。隨馬返龙江的重要职员計有教育厅长郑林皋、民政厅长刘廷选、軍署参謀长謝珂、国防处参謀长王靜修、軍署副官长唐凤甲等。各机关均添設日人为顧問。二十四日午，馬在省政府大礼堂行就职典礼。事先布置在礼堂大門

外的国民党的党旗和国旗，被鈴木旅团长勒令撤去。軍乐声中，行礼如仪。参加典礼的日酋为鈴木、林义秀、土肥原、清水及軍政各机关首領、日人顧問百余人。馬略致数語毕，即由參議韓云阶朗讀馬占山出賣黑龙江抗战、就任伪职的宣言如下：

此次东北事变，我黑龙江省亦因一时誤解，不幸引起战争，演成混乱局势，以至人民受此涂炭，遭此战祸，土匪横行，金融梗塞，商民极感痛苦。目下时届春耕，若不注意民食，恐秋收无望。占山猥以輕材，不明政治，自知原非胜任，惟对于我黑省人民之困苦，难以坐視。最近因黑省民众之敦促，迫于公义，实不得不勉膺艰巨，故本救民之热誠，以負地方之重任。年来东北苦于軍事耗費，政治失常，而租稅負担累年递增，失业者日漸其多，老弱者死于沟壑，强梁者挺而走险，遂至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官府不察致乱之源，极思补救，乃更濫发紙币，錢法日坏，物价高昂，商店因之倒閉。占山服官黑省有年，深知此弊，早具改善之决心，此番更賴日本友邦表示无領土之企图，互作經濟之提携，从此有善邻好意之援助，真誠之亲善，定当銳意革新，增進民生福利。目下当务之急，即先举办全省清乡，肃清匪患，裁汰冗兵，整理財政，減輕民众負担，注意金融調剂。至于整頓交通，开放富源，均为当务之急。且今后对于官吏确定登用之途，明示黜陟之道，毅然改进，則黑省前途，实利賴焉。占山不敏，素知我省地大物博，人情朴厚，果能上下一心，定能造成天下之乐土。今当就任长官伊始，謹此披瀝至誠，聊申志愿，尙祈中外監察。

馬回龙江以后，伪国成立的消息更为盛传，当二月十一日日寇在祝賀日本建国念紀日時，同时預祝所謂“滿蒙新国家”即将成立，街談巷議，消息更真，日期更近。一日，馬对我說：“不日新国家就要成立，我必須亲到长春参加建国典禮，到时你負責代表欢迎新国家成立，現在应积极筹备，轉知各处遵照办理。”我說：“我尙須抽暇到哈尔滨去一次，把家眷接回来，关于筹备事項，当即告知各处积极办理。”

我自随馬回省以后，暗中商同秘书刘伯岑准备出走，一齐出

国,并从外交办事处主任王春处要了两张出国护照。三月二日,我与刘搭中东晚車赴哈,翌日交涉出国之事,拟由哈經滿州里走,因护照已添写真名,恐日人检查扣留,乃改由綏芬河站出国(綏芬有某电灯厂长允代办出国手續)。伪国成立的日期已近,馬发觉我未回省,改派国防处参謀长王靜修代表欢迎伪国成立典礼。

三月八日馬占山赴长春迎接溥仪,九日参加伪国成立典礼,同时发表兼任軍政部长之职。

十、馬占山出走黑河再度打起抗日旗帜

馬占山自长春返回龙江以后,感于日寇遇事迫胁,非法要求极多,且微聞有調他离开黑龙江去长春的传说,因此心滋不悅。三月末,馬密聞国联調查团已到中国,不日可来东北,遂决心秘密布置出走計劃。他事先曾向日方宣称,东荒軍隊近来軍紀不好,不久要到东荒一带視察,整飭軍紀。

四月一日下午五时許,馬以預备好的載重汽車与轎車多輛,偕第三旅職員約二百余人(馬的亲信),并携带两署关防印信、重要文件、軍餉、办公費及重要物品等,潛行出走,向拜泉方面駛去。翌日午,日方发觉,初尚以为馬是視察防务,一二日后始知馬是有意出走。日寇当电軍部报告,得复:“馬氏名义仍予暫留,俾期可以回省”云云。同时又电請軍部拟以財政厅长赵仲仁兼黑龙江伪省长,程志远为黑龙江伪警备司令官。

我于三月九日偕秘书刘伯岑到海參威中国領事館,中旬搭丹麦加注輪赴青島,途經大連被日水上警察署小尾通扣留,旋送沈拘押。四月初,我尚在押中,日軍部派伪軍政部次长王靜修到沈阳会同日宪兵队长增岡賢七来訪,拟誘我赴黑省担任要职,我拒絕未

允。

四月七日，关东軍司令部以赵仲仁力保馬占山决不反复，不料今竟出走，电将赵仲仁調长春看管，旋又轉到沈阳看押，并任命程志远为黑龙江伪警备司令官。四月底，伪国发表程志远暂代黑龙江伪省长兼財政厅长，以日人春田为参事顧問，馬景桂为总务厅长，刘廷选为民政厅长，韓云阶为实业厅长，寶联芳为警务厅长；各厅均派日人充参事顧問。龙江至是完全为敌伪所控制了。

四月七日馬占山到黑河，除于九日电告北平东北当局外，十二日致电日內瓦国联，略云：“日本假借民众自决之名义，用綁匪手段強劫逊帝溥仪自天津挾赴旅順，又威迫利誘东三省之官吏，演成一幕滑稽剧。溥仪尝于途中屢次自杀，均被監視之日人所发觉而阻止，欲死不得，足見其所处之境遇亦云苦矣”；并云：“占山借以窺得暴日之肺腑、伪国之真相，以貢獻于吾維持世界和平、主张国际公道当世唯一机关之貴会，以資参考”，云云。

馬回黑河以后，积极組織整頓，改警备司令部为省政府行署，調羅北县长韓树业为民政厅长，調瑷琿县长邹邦杰为教育厅长，任命黑河丰源金矿經理周宝基为实业厅长，調黑河市政筹备处长郎官普为財政厅长，任命第三旅副官长李俊卿为黑龙江全省警务处长；并令行全省軍政各机关，嗣后一切文件径呈黑河省政府，以一事权。

另外，馬并向各方面积极联系，并派員分赴各旧部聯絡起义，所派前往聯絡程志远、张文鑄的王廷兰，被程、张报告日方枪杀。

馬占山自投降日寇以后，对旧日部属威信已丧失殆尽，而国内外支援款項，估計約在二三百万元以上，又始終未予发表，且分文未发給部队。平时軍隊用款，系由万福麟移交的数百万元和地方的

各項收入开支。馬氏既不抗日，而財政又不清楚，命令部隊打仗又不接濟，因此，馬此次出走，再揭抗日旗幟，許多人均認為馬是為了個人恢復名譽，所以許多舊部如朴炳珊旅、徐寶珍旅及炮兵團等均未響應。而程志遠、王靜修、張文鑄等更公開投降了日寇，以後成了偽滿的大漢奸。

馬占山於五月十五日率自己的第三旅徐景德部騎兵向東荒一帶進發，並招收胡匪和地方部隊等改編為義勇軍，任才鴻猷、鄧文（二人均為吳松林部連長）等為軍長，但實力甚差，又缺乏訓練。而日寇松本直亮第四師團與西義一第八師團各派兵一部由齊齊哈爾和哈爾濱開進東荒，每日出動飛機偵察轟炸。本莊繁又親自到哈爾濱動員大部日軍分頭向各地的義勇軍進行襲擊。七月底，馬占山在海倫、東安、古鎮、羅圈店等處被日寇重重包圍，激戰三晝夜，所有輜重馱子損失殆盡。在混戰中，日軍傳聞獲得馬占山屍體（實際上據聞是馬的參議韓述彭的屍體，韓與馬貌似），因此松本師團長冒報獻功。當時報紙多有登載馬占山戰歿消息，實則馬在此役僅面部受傷，早已走出重圍，但因電台損失，以致對外消息斷絕。八、九月間，馬占山曾到龍門、訥河一帶收集舊部，有義勇軍徐子鶴攻打訥河拉哈站一次。外間對馬氏未死的消息，自是又有了傳說。

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的淪陷

趙毅

一、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的混乱局面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間，日寇在沈阳发动事变后，隨即于十九日晨五时向长春进攻。我駐在长春南岭的东北炮兵第十团、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輜重营、弹药庫和駐在长春头道沟的第廿三旅六六三团傅冠軍营，都遭到日寇的袭击；长春市內的吉林被服厂、陆军医院以及所有軍事机关，也全被日寇占領。各部队事先都分別得到吉林軍署參謀长熙洽或陆军整理处及前第十五师參謀长郭恩霖要求各部对日軍退让、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的指示，因此，除各級官兵曾被迫自动开枪抵抗外，均在熙、郭“退让”命令下，撤离原駐防地点，炮兵团撤至距长春四十余里的新立城，歩兵团撤至长春东麦子沟。在突围的短促战斗中，我軍歩兵营长傅冠軍受重伤，旋即隕命，并陣亡炮兵連附一人，伤亡士兵数十人；大炮三十六門及庫存弹药粮秣全被日寇掠获。长春市就在这一天的几小时內被日寇武装占領。

当时統治吉林多年的軍政长官张作相正在錦州料理父丧，參謀长熙洽以代理长官名义乘机假借职权，打着“奉命不抵抗”的幌子，进行其投敌卖国的活动。九月十九日，他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名义电令全省駐軍，略謂：“奉諭：日軍入侵东北，我軍应万分容忍，切

勿衅自我开,中日事件应由外交解决”等語。九月二十日,他又以代理长官名义命令駐省城部队即日开出省城数十里外待命,并严格約束所部不得与日軍冲突駐省城的第二十五旅张作舟部(两个团)和卫队团馮占海部遵令撤出省城,分別开往烏拉街和永吉县官馬山地区。同日,熙洽派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携其密函赴长春面見日寇第二师团长多門二郎,表示投降。

在省城部队調出以后,日寇尚未来到以前,熙洽即召集地方文武官員开会,宣布奉令不准抵抗日軍,为了“顧全大局”,拟邀多門师团长来吉林“和談”。当时省府委員誠允表示反对,认为迎接日酋到吉談判无异是引狼入室,有亡国危險。熙未予接受,誠允乃憤然立即退出会場(旋即离吉去哈尔滨)。随后又有实业厅长馬德恩、教育厅长王世选、民政厅长章启槐、省府委員王可耕、省府秘书长潘鄂年、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长王宝善和官銀号总办刘鈞等人,都支持誠允的意見,反对迎日酋和談。但反对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大部分人則唯熙的馬首是瞻。尤其是权势較大的实力派,如前第十五师參謀长郭恩霖、吉长道尹孙其昌、軍官教練处总办齐知政、省議会議长林鶴皋、外交特派員鍾輯五和吉海路总办李銘书、帮办艾迺芳等等高唱“和談”謬論,附和熙洽的投降主张。結果,反对“和談”的人相繼退出会場(后来多数离开省城分赴哈埠和北京),而以熙洽为首的亲日派占了上风。

九月二十三日,日軍师团长多門亲率天野旅团部队向吉林进发,熙洽等亲到吉长铁路中間的土門岭站迎接。日寇进吉林省城后,即分別控制了各重要軍政机关。吉林省城就这样在熙洽等的出賣下,被日寇兵不血刃地侵占了。

熙洽与日酋多門經過一昼夜的阴谋策划后,于廿四日召集地

方軍政首腦和各法團代表，宣布成立偽吉林省長官公署。熙自任長官，郭恩霖為軍事廳長，齊知政為省城警備司令，李書銘為民政廳長，張燕卿為實業廳長（孫其昌仍以原職助熙謀劃）。這一羣丑類粉墨登場後，吉林省的漢奸傀儡組織便正式出現了。

接着，吉長鎮守使兼第二十三旅旅長李桂林、延吉鎮守使兼第二十七旅旅長吉興（與熙洽同宗、同學）和團長劉寶林、馬錫麟、王澍堂、曲寶珩、夏鴻謨等，也都相率附逆。

二、抗日派與投降派的鬥爭

吉林省的軍政人員，在吉林淪陷以後隨着形勢的發展，逐漸分化成兩派——抗日派與投降派。一方面，以熙洽、孫其昌等為首的投降派，早在日寇卵翼下組織了傀儡政權；另一方面，以若干愛國軍政人員為中心的抗日派，也適應形勢的需要，在賓縣建立起抗日救國政權。

在投降派方面：吉林偽組織成立以後，熙洽、郭恩霖、孫其昌、于琛激等分別向各地駐軍將領進行拉攏，威逼利誘，冀使與之同流合污。熙洽首先派吉海路總辦李書銘偕同少校副官劉寶元到哈長路綫和哈爾濱一帶向各旅團長“慰問”，並聲言只要服從熙的命令，關於個人地位和軍隊餉糈等都不成問題。郭則派其參謀處長佟衡及其胞弟郭雨霖，孫則派袁慶濂（袁金鎧之侄），分頭以私人名義向有關係的將領進行拉攏活動。于則派阿城電燈廠長張星橋等持其親筆信深入部隊策動合作。他們都是一方面宣傳日本已動員幾個師團，兵力強大，難以抵抗；另一方面就鼓吹團結，充實自己力量，消滅異己，然後待機“抗日”。當時墜入他們的圈套起了動搖的，大有人在（如駐哈的第二十八旅團長白文清、廿六旅團長宋文俊等）。

我也是汉奸們拉攏的对象之一。我原是駐双城的第二十二旅六六二团团長，因旅長苏德臣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去吉林投靠熙洽，張作相命我接任旅長職務。那时候，張作舟的第廿五旅、馮占海的卫队团以及在長春遭到日寇袭击的炮兵团、輜重营等都先后集結于松花江以南地区。我指揮的廿二旅，除六六一团駐在敦化外，六六二团和六六三团都駐在双城及哈長鐵路沿綫。哈長路因有国际关系，在事变后始終暢通无阻。在吉林、哈尔滨兩方对立的情况下，双城便成为哈尔滨的門戶，我旅便居于举足輕重的地位。

在賓县抗日政权成立后，吉林伪組織要想統一全省，就必须經過双城夺取哈尔滨。因我和他們都有悠久历史关系，所以他們竭力对我威胁利誘，企图使我軟化，跟他們同流合污。熙洽、于琛激先后派車玉堂（双城商会会长）、張星桥、李书銘、刘宝元等人到双城找我会談，并送到“委任狀”任命我为“剿匪副司令兼參謀長”，附送大洋三万五千元。我当时把錢收下作为軍餉，伪委任狀和命令原封退回，并分別函复熙、于，責以大义。后来，孙其昌、郭恩霖兩人又以和我师生、同学的关系，分派袁庆濂、郭雨霖、佟衡等分头向我进行游說，均被我严詞拒絕。

吉林羣奸在向各方面拉攏活动的同时，并抓紧时机利用省軍械厂儲存的武器（步槍兩万多支、子彈約五千万发），以附逆的各部为基干，在日寇直接扶持下，很快就編成了五个旅。熙洽为了統一軍事、“扫蕩”未附逆的軍隊起見，于十月底委派前被張作相撤职的騎兵師長于琛激为“吉林省剿匪司令”（“匪”是指未附逆的軍隊），委派李文炳、刘宝林、馬錫麟、王澍堂、李競玖等为旅長。当时附逆的各部队下級官兵，都为那些大小汉奸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一时認不清他們的卖国伎倆，故而蜂拥蚁附地作了他們的爪牙，成为汉

奸組織的有力工具。

与此同时,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态度,已由暧昧而明朗化。哈埠系哈滿、哈綏兩綫的国际交通中枢,更为南、北滿的政治、經濟中心。张景惠的职权虽只限东鉄特別区,与地方軍政素无关系,但因他是张作霖当年的伙伴,資格最老,地位高而且重要,所以他的动向,影响很大。在事变以前他早已成为日酋心目中的宠儿。板垣退之助不断与有联系,汉奸謝介石(早已入日本籍)和张的干儿子日人义田經常包围他并为之奔走。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已由日寇的宠儿变成了日寇的代理人。

原来日寇在扶植吉林羣奸的同时,就着手在暗中扶植张景惠的工作了。他經日寇由沈阳兵工厂拨給步枪三千支和一部分重武器,以扩充警察队維持地方秩序为名,大事招兵买馬,扩充实力,企图等待时机,实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哈埠原駐有丁超和邢占清两个旅,张景惠名头虽高,武装力量甚小,所以他虽然亲日,暂时还不敢公开反对抗日。但到日寇侵占了哈尔滨的时候,他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无遺了。

在抗日派方面:初时,人們对熙洽等的認識还很模糊,因熙标榜着“忍辱負重”等等謊言以淆惑視听,欺騙羣众;及至十月初清朝遺孽罗振玉、金壁东等潛入吉林后,熙洽的汉奸面目始完全暴露,张作相也对他絕了望。但张始終遙領吉林軍政长官名义,对熙的投敌卖国,并未下令撤职,亦从未通电声討。迟至十一月間,张作相才电令吉林部分軍政人員不要听从熙洽的伪命,委派臧允到宾县組織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的汉奸組織相对抗;同时委派原吉林省陸軍整理处副监李振声(后来附逆了)到哈尔滨代行边防副司令长官的职权,希望他在軍事上有所作为。結果,因臧允与李振声

兩人意見不合，互相傾軋，以致數月之間，一事未辦。

最明显的是哈尔滨竟成了“三不管”的地区。张景惠虽尚未打起投降的旗帜，却公开进行卖国活动，无人过问。鎮守使丁超負有地方綏靖責任，但一則对同时駐哈的邢占清旅无权直接指揮，軍事行动不免有所掣肘；二則丁并无抗日决心，虽宣称决不与熙洽同流合污，暗中却派參謀長孙武忱等去給日酋本庄繁送礼物，妄想与日方合作，在哈独树一帜。李振声虽为张作相所委派的全省軍政大員，但系只身到哈，又不孚众望，因之一筹莫展。这三个势力各自为謀，互相猜忌，形成誰也不管誰的局面。这种情况，使投降派势力日漸扩大。

約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間(旧历腊月中旬)，于琛激的“剿匪部队”五个旅，已編制装备齐全，为了消灭不肯附逆的抗日力量，在日寇的主使下开始了軍事行动。于亲率李毓玖、馬錫麟、刘宝林等旅由舒兰經榆树大举向北推进，一月十六日在榆树先把张作舟部(二十五旅)击潰，并俘虏了张作舟本人和团长任玉山等。同时，于为了进軍哈尔滨，要假道双城，一再派人到双城跟我商談，并直接跟我通几次電話，都被我拒絕。他們看到我的部队是以逸待劳，而且严陣以待，乃繞道拉林，于一月廿三日在拉林把馮占海部击潰。这是抗日派和投降派武装冲突的开始。

于逆占拉林，曾約我去面談，我劝他早日悬崖勒馬，一致对外。于很不入耳，但因我系哈长护路部队，他既顧慮国际关系，又怕糜烂其双城家乡，故不敢扣留我。最后表示要我相信他，同他合作，将来他另有主张，并頻囑我于日軍經過双城时，切勿冲突，我漫应之。

熙洽等汉奸准备就緒后，即下令撤免丁超、邢占清等的职务，并調动伪軍节节向哈埠进逼。但不愿做亡国奴的軍人們在这种形

势下,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哈埠人心惶惶、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依兰镇守使兼廿四旅旅长李杜亲率步兵一团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廿五日星夜赶到哈尔滨(道外),混乱局面,开始澄清。他首先会同丁超、王之佑在江北呼海铁路车站约马占山会面,痛陈抗日和保卫哈尔滨的利害。马表示赞成在哈成立统一军事机构,允予派队过江增援,并补助枪弹五十万发(实际上他正在作降日的活动)。丁超为了保持地盘,也极力表示合作。遂即由丁、李等召集所有抗日派军政人员在哈开会,决定保卫哈尔滨,并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战军事,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同时由李、丁和王之佑、赵毅、冯占海等会衔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军民一体奋起抗战。地方团体和银行界拨哈洋五十万元支援粮餉,哈埠人心为之大振。至此,哈尔滨便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心,同时也更成为敌伪所要“扫荡”的主要目标。

遗憾的是,李、丁等并未能以斩钉截铁的手段把张景惠消灭,对其卖国活动,竟仍听之任之,不加制止;而张作相对李、丁等在哈的抗日组织,始终未予以正式名义和鼓励,对其成败也是不加闻问。自卫军抗战所以失败,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双城阻击战

吉林于琛澂部先后在榆树、拉林击溃张作舟旅和冯占海部以后,接着就把矛头指向哈尔滨,而双城位处要冲,他们为了配合长春日寇的北进,就非控制这个地方不可。

当时汉奸熙洽、孙其昌和郭恩霖等都妄想把我拉过去,但我和部队内的基干却有一个共同信念——不当汉奸,打日本。不过,我

們在当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可能跟他們硬碰。因此,我不能不对他們虛与委蛇,以期能在有利时机發揮更大的力量。同时,我也曾对那些汉奸們存着一定程度的幻想,就是希望他們“猛醒”和“回头”。但是,幻想毕竟是幻想,形势逼着我們非同他們决裂不可。

于琛激一面率領他的主力北上,向哈尔滨进逼,一面派刘宝林旅开到双城东十里鋪附近,对我部进行監視和威胁,其目的仍在逼我跟他們合作。我因与刘是熟人,为使其对我不怀疑,不戒备,也曾虛与周旋。同时在吉林省城的孙其昌、郭恩霖也都和我通电话,告我以日軍天野旅团兵車即将北开,路过双城,要我表示合作,不可冲突。

我是早已有了作战准备的,除已把所屬部队作了适当的部署以外,还控制了三列装甲車。当得到日寇将由长春出发的情报时,我看到形势已急,不容再事迁延,遂下了打的决心。二月一日拂晓我亲率約五个营的兵力,輕装急进,把尚在睡梦中的刘宝林旅包围起来,一举击潰,伪軍官兵紛紛繳械投降。除刘宝林率領一部脱逃外,被我虏获大小枪五、六百枝,官兵七百多人。这一胜利給官兵以很大鼓舞。

我本来只想打日本侵略軍,并不想打伪軍,但在当时情况下,如不先解除刘宝林旅对我們的威胁,則不但无从实现消灭日寇的愿望,反而还有被他們所消灭的危險,更談不上保卫哈尔滨了。因此,我們决心先給伪軍一个“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之后,馬不停蹄地馳返双城,再作第二个“出敌不意”的部署,等待日寇的到来。

我們解决了刘宝林旅以后,在赶返双城途中,于兰旗屯地方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我首先发問:“我們已經把卖国的汉奸部队刘旅

打垮,今后还应当打什么人?”官兵們异口同声地高喊:“打日本”,真有声动天地、气吞河岳之概。我被士兵們这种爱国热情感动得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激动地说:“你們真是爱祖国的好男儿呀,我代表东北老百姓欢迎你們抗日救国,感謝你們抗日救国!”这时候,全体官兵們沸騰起来了,弟兄們个个摩拳擦掌,高呼“打日本”、“打汉奸”,情緒激昂,士气旺盛。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痛击日寇天野旅团的計劃,已經胜算在握了。

然而,事实上双城战役形成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取得了胜利;后一阶段則遭到惨重的損失。

(一) 第一阶段:痛击日寇天野旅团

我們原来的計劃是:一面令六六三团陈德才部在兰陵河岸老少沟隘路內布置埋伏,把鉄道拆毀,以顛复日寇兵車,然后相机予以阻击;一面在双城車站布置埋伏,等待日寇兵車开到后,相机予以歼灭。同时把这种計劃报告給甫經在哈成立的自卫軍总司令部,并要求他們派兵增援。

不料陈德才团(后来他投降伪組織,当了旅长)并未执行命令,不但未能給日寇以袭击,連鉄道也并未破坏,因之未能达到迟滯敌人前进的目的。二月一日(旧历腊月廿三日)午后,偵悉敌人的兵車已經安然經過老少沟,并且渡过了松花江桥,恰巧这时候我們在双城車站的伏击部署已經完毕。約在晚八时左右,北上的天野旅团两列兵車先后开进双城車站,拟在双城集合,然后展开部署向哈尔滨进攻。因事先熙洽、郭恩霖等都认为我們一定默許日軍由双城通过,甚至还认为我們也决不敢触犯“皇軍”,所以預向日方提出双城駐軍已撤离鉄道綫的保証。日寇也竟信以为真,未作任何战斗准备。那时正在零下廿多度的严冬,日寇兵車两列相繼进站以后,立

即整队下車,架枪、給养、大小便,同时攏火取暖。当此稍纵即逝的时机,我們官兵在一声号令之下,以猛虎搏兔之势,三面发起突击,先用猛烈而集中的炮火和机枪火力把敌人压倒在站台上,繼以刺刀、手榴弹发起白刃战。日寇措手不及,真象热鍋上的蚂蚁一般,有的拥作一团,有的钻在車下,有的跳墙爬入附近院落内希图逃命。我們这次奇袭,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天野旅团的主力遭受严重打击。

我們在老少沟的阻敌計劃虽未实现,在双城車站的战斗,却完全实现了預期的計劃,并且获得相当的战果(据当时估計,打死打伤的日寇約計數百名)。这在当时的确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一場激战。这是正規軍隊抗战繼江桥战役之后的又一次胜利,对北犯的日本侵略軍,确是一个迎头痛击,对熙、郭、于等汉奸更是一个当头棒喝——警告他們:絕大多数官兵是爱国的,是抗战的。

双城老百姓的帮助,也是令人感激难忘的。他們不仅在战斗前在人力物力上給了我們很多方便和援助;在战斗开始后,还給我們运弹药、抬担架;甚至还有一些青年人竟投身到队伍中参加杀敌;至于烧水送飯,更属余事。

(二) 第二阶段:部队遭受惨重牺牲

双城战役,前一阶段是胜利了,可是接着就遭到日寇陆空增援部队的突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当我們在双城車站給天野旅团以奇袭时,日寇聞訊,立即由长春派出陆空部队馳赴双城应援,除装甲車、坦克以外,还有飞机二十多架配合作战。而我們在奇袭得手以后,未能机动灵活地及时撤出战场保持有生力量。同时,由哈派来增援的王孝芝团赶到双城近郊,看到战事仍在繼續,日寇飞机已来增援,因而畏縮不前,望

风逃去,致使我旅陷于孤立。而且双城地形开阔,目标暴露,我旅在日寇飞机、大炮、坦克猛烈轰炸之下,遭到惨重的损失。壮烈牺牲的,计有六六一团团长吴永和、六六二团营长苏成勋和连长金永山、张金城、李振海、张宝库、排长刘金胜、何万厚等校尉官二十余人,士兵伤亡约六、七百人(多在车站左右和韩光第坟附近)。

我旅脱离战场向哈尔滨方向撤退后,哈尔滨的门户双城即于二月二日被日寇占领。

日寇天野旅团由于遭受我旅的严重打击,引为奇耻大辱,当我军撤退后,立即施行残酷的报复,以图泄忿。他们不但将我遗留在战场上的受伤官兵用刺刀刺死,就连已经阵亡的官兵尸体,亦多被剖腹,有的甚至挖心挖眼,并严令地方百姓不准收埋,暴尸达六、七日之久,狼噬狗噬,惨绝人寰,直到过旧历年关后(正月初一)才许可地方收尸埋葬。双城人民钦敬这些烈士们为国捐躯,自动捐献棺木,将此数百忠骸排葬于双城西门外十里铺,并树立忠勇墓的标志,以资永垂不朽。

四、哈尔滨的沦陷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于琛澂部伪军经榆树向哈埠挺进后,在榆树的张作舟旅和在拉林的冯占海部,先后战斗失利,于逆遂得北上至阿城,逼进哈埠近郊。此时哈埠无人负责主持,而形势又日趋紧张,一月下旬李杜由依兰来到后,才扭转了混乱的局面。经过大家集议,决定保卫哈尔滨,并积极准备作战。

一月廿七日,于琛澂伪军向哈市的上号、南岗、三棵树进攻,但因伪军人心涣散,并无斗志,在李杜、丁超和冯占海等部队猛烈反击下,纷纷溃退。从此,我军军心大振,哈尔滨局势也趋稳定。

哈埠在击退于逆伪军的进攻后，即于一月卅一日正式组成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丁超任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馮占海、邢占清、王瑞华（后来附逆）、赵毅，都分别率领所属部队担任作战指挥。

双城失守，哈尔滨的门户已经洞开。日寇掌握了哈长铁路线，利用火车增调大批军队，配合飞机、坦克、装甲车，节节北进，于二月二日逼近哈埠南郊地区。哈尔滨外围保卫战遂于二月三日在吉林自卫军总部的指挥下展开。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有邢占清第二十六旅的两个团、王瑞华第二十八旅的一部、李杜第廿四旅的一个团和馮占海的部队。我部廿二旅由双城退出后，也立即重加整顿，参加了战斗。当时我方的部署是：王之佑率部队布防于顾乡屯方面，指挥邢占清、王瑞华两部分别防守三棵树、南岗等地；我率二十二旅（不足两团）防守上号地区，馮占海则率部向敌后迂迴。日寇于四日开始总攻，展开了激烈战斗。我军官兵都奋不顾身，争先杀敌，确曾给日寇以很大打击。

但是，驻哈埠的丁超、邢占清等由于在事变后的四个月间，一贯存着“依靠国联调停”的幻想，观望徘徊，事先对军事毫无措施。及至于琛激伪军和日寇向哈埠进逼，他们才于惊惶失措中策划抵抗；李杜由依兰到哈，才仓卒组成自卫军指挥机构。所以战事发生时，连极简单的防御工事都未构成，只好利用民房、围墙与敌人作战。在敌机轮番轰炸、坦克横冲直撞的强大攻势下，这些素无训练的军队自然不易支撑，然而竟能苦战两日之久，亦不能不算难能可贵了。李杜曾亲临前线指挥，曾把嗓子急哑，说不出话，要以身殉国，但已不能挽救战局。北满重镇哈尔滨遂于二月五日陷于敌手。

哈尔滨保卫战的失败，使当时吉、黑两省的抗战局势发生急剧

的变化。馬占山不但未履行其諾言派一兵、援一彈，而且哈埠淪陷不久就公開投降了日寇；李杜、丁超、邢占清率部退往江北巴彥，然后又轉进到依蘭、密山一帶；馮占海部曾活動于困山子，然后轉进到方正一帶；我率廿二旅退到延壽一帶。至此，以東北軍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東北各地义勇軍代之而起，展开了以义勇軍为主体的抗日斗争。

馬占山反正經過*

李 銘 新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江橋之役，馬占山率部抗击日寇，虽負盛名，但本系迫于形势，并无抗战决心；敗退海倫以后，思想愈益动摇，在汉奸引誘之下，終于变节降敌。但馬自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回到龙江就任黑龙江省长伪职以后，为时仅一个月，又于四月一日突然率队反正，出走黑河，重揭抗日旗帜，其間經過，仅就我所知，述之如下。

馬占山投敌以后，首先遭到部下的反对：黑省軍政两署人員中，有識之士多借故辞职；軍隊中的爱国軍官也紛紛不辭而去。他留在黑河老家的卫队聞訊后立即譁变，竟将黑河街上和馬占山家中的金銀財宝一搶而光。

馬占山就任伪省长之次日，日本顧問村田諮磨送来公函一件，要求馬对黑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作主，必須先取得日本顧問同意始能执行，并詳細开列必須取得日本顧問同意之事項，举凡重要法令規章之制定、重要政务、用人、預決算、与邻省和外国交涉事宜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村田和关东軍駐黑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复每日到

* 本文是作者所撰“馬占山抗战、降日、反正經過情形”一稿中的最后一部分，所述内容可以补謝珂所作“江桥抗战和馬占山降日經過”一文有关部分之不足，特为摘录发表，文字上也作了一些删节和修改。

省署見馬，要求執行顧問職權。駐在龍江的關東軍鈴木旅團，非但不如約撤兵，且每日在重要路口派出崗哨，檢查行人。

馬占山既內遭部下反對，眾叛親離；外又受日人壓迫，視同傀儡，而日軍在省不撤，亦感受威脅。至此，馬始悟受騙，因而漸有悔意。

三月七月，土肥原來龍江約馬同去長春參加偽滿建國大典，馬并被任為偽軍政部總長。但此事事先並未征得馬本人的同意，馬唯恐一旦調赴長春，將失去軍權和黑省地盤，長此下去，必無好結果。因此，馬自長春回龍江後，遂生反正之心。

馬占山降日以後，國內外函電紛至，嚴詞譴責，甚至有向馬索還前在江橋抗戰時期所匯來的捐款者。馬自覺此舉鑄成大錯，干犯眾怒，因而冀圖借反正來洗刷自己，恢復名譽。當時國聯調查團即將來到東北，馬占山聞悉後，思趁機向調查團揭露偽滿內幕，以有所表白于中外。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馬占山始決心反正，並暗作出走準備。他先以視察部隊為名，派少將參議韓述彭赴拜泉、海倫一帶，並密囑其到後即捏報部隊不穩消息。韓遵囑報來後，馬占山即據以通知日本顧問，並表示不久將親往鎮懾。

四月一日午前零時，馬密令步騎衛隊各一營先開出龍江，步兵乘汽車，騎兵則由營長張凱文攜帶馬占山乘馬多匹，聲稱赴馬場牧放。午前二時，馬偕隨從副官二十餘人乘汽車出城，直奔拜泉。當時日軍在龍江駐有汽車百輛、飛機十餘架，馬恐日人發覺來追，故以電話通知漢奸趙仲仁，說拜泉、克山駐軍不穩，現親去鎮懾，事畢將由海倫經哈爾濱回省，托其轉告日本顧問。次日馬到海倫後，又以電話通知趙仲仁說，聞訥河部隊亦不穩，將由海倫前往處理，公畢

將直接回省，實則馬由海倫取道訥河北上，于四月七日到達黑河。

馬占山到黑河後，即分別向北平東北當局、南京國民黨政府、日內瓦國際聯盟等方面發出電報多通，揭發日本製造偽滿的陰謀，表示決心繼續抗戰，而對於他自己的投降行為，則曲加文飾，居然說成是為了保存東北的“一線生機而不得不‘虛與委蛇’”。日寇得知馬抵黑河後，本庄繁、鈴木、板垣等均電促其回省，並派漢奸韓云階前往勸誘，均被馬嚴詞拒絕。日寇知馬已不能就范，即派兵四出堵擊。

馬占山在黑河稍作部署後，即率部出發，擬經拜泉、海倫、綏化折向東南，到佳木斯與李杜會合，共同對日作戰。當時國聯調查團已到哈爾濱，馬乃派王子馨、姜松年二人携函赴哈面見調查團揭發日寇製造偽滿陰謀。王子馨于路過龍江，代馬占山遞送致黑省偽省長程志遠函件時，為程密報于日寇，以致遇害。姜松年到哈面見國聯調查團後，調查團團長李頓欲與馬占山會見，為日方所阻，乃密派美國新聞記者米海斯和另一瑞士記者經呼海路繞道至義勇軍鄧文防地，由鄧護送到海倫西鄉三門謝家與馬占山會晤。馬將日寇一手製造偽滿的詳細情形以及他自己反正的經過和繼續抗戰的決心對記者談了三天，希望他們轉達國聯和全世界。

國聯調查團所派記者走后，馬占山即按原定計劃東進。不意馬之行動方向早被日軍偵知，七月二十八日馬率騎兵二千餘人行至慶城縣東山里張河白石拉子山口時，遭到預伏在山口的日軍步炮兵千餘人襲擊，猝不及防，竟全部被敵擊潰。少校連長于俊海率領官兵百餘人和馬馱子五十多匹向北突圍而出，馬占山于混亂中僅率衛隊四五十人向東奔入大山。日軍見向北突圍的人數較多，誤以為馬必在內，于是跟在于俊海所率的一路後面緊緊尾追。二十九日黎明，于俊海等正在羅圈甸子以南七八道林子地方民房內酣

匪之际，日軍赶到，将于俊海、少校副官刘景芳、少将参議韓述彭等全体官兵悉数杀害。当时日軍搜得馬占山名章一方，同时又发现韓述彭尸身瘦小，与馬相似，且面目血肉模糊，就誤以必是馬占山无疑，于是拍摄照片，大肆宣传。当时敌伪各报均登載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而不知馬占山此时已进入深山。

馬占山率軍长邵斌山、参謀处长容聿羣、副官杜海山、张凤岐、孙永浩、刘芷兰及随从卫队等共四十二人，在深山密林中向东北方向前进，十余日后始遇一吳姓索伦族人，在其家住宿一夜。第二日复由其带同二索伦族人引路，行六日至樟树河，又三十里始到太平山金厂。馬等一行入山以来，沿途风餐露宿，以馬肉充飢，且天雨連綿，衣服尽湿，各人皆面无人色，腿脚紅肿，疲困达于极点。金厂有米有面，馬等方得飽食。在金厂休息三天后，即向龙門县城进发，行前并将米面炒熟，計口分带。又經過半个月的跋山涉水，于九月九日到达龙門县城，至此始完全脱离山林生活。自七月二十八日入山，迄九月九日出山到达龙門，共达四十余日。

馬占山到达龙門后，即将脱險消息电告黑河，駐黑河的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郎官普接电后，即派队伍送来弹药、粮餉、被服、电台等，至此，馬占山始得重与国内各地取得联系。

日軍聞知馬占山未死，即派兵到处堵击。馬由龙門到訥河聯絡旧部，曾与日軍遭遇数次，均不利。馬自觉兵力单薄，不足以抵抗日軍，遂率騎兵五六百人繞道德都、訥河、甘南等地，往海拉尔投奔苏炳文。后来苏炳文对日作战失利，与馬占山一同退入苏联。

东北爱国人士向国联調查团 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經過

刘仲明 張韻冷

一、搜集材料的經過

九一八事变以前，沈阳青年会一些朋友們，常常因事接近，来往碰头，久而久之，逐漸形成了一个友誼小組，以刘仲明为召集人。九一八以后，骨干联络人閻宝航离开东北，由巩天民、刘仲宜协助联系。

九一八事变以后，河山破碎，小組同人对于东北命运，时切殷忧，每次聚会，必各飲苦水一杯，以示臥薪嚐胆之意。其时各地抗日救国团体派来沈阳作地下活动的人員，往往为經濟所困，时需当地加以援助。为此，小組同人每人按月捐出月薪百分之二十，作为援助經費，并立有分戶賬，由巩天民經管。同时，各小組同人对于各团体所进行的地下工作，也代为設法掩护，給以各种方便。某次巩天民因事入关，小組决定上书张学良，催促他痛下决心，联合真正抗日的各方面力量，早日打回老家。信写好后，由小組全体签名，託巩天民面交請愿。据巩回沈报称：张学良閱书后，极为感动，立时郑重表示，决意联合各方面抗日力量，收复失地。

当报纸发表了国联将派遣調查团到东北进行調查的消息以

后,小组立即在刘仲明家召集紧急聚会,参加的有巩天民、刘仲宜、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张韵洽和刘仲明,商量如何利用这时机有所行动。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集中火力,针对日本在国联所捏造的用来掩饰其侵略东北、制造伪满罪行的谎言,以不可辩驳的事实以有力的揭露。

任务和目标既定,我们就拟定了工作方向、搜集材料原则以及分工办法,并决定必须趁着日本特务对于我们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的时候,迅速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拟定的工作方向,是针对日本以下三个欺騙謬論进行揭穿:

1. 日本军队进兵沈阳,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純属自卫行为;
2. 日本军队占据东北各城市,是由于中国政府不能維持各地秩序,日本駐軍为了維持秩序,保护权益,不得不加以占领;
3. 滿洲国之建立,完全是出于东北居民自决自愿,日本无权干涉。

关于搜集材料的原則,我們决定以下两点:

1. 针对日本上述三点謬論,注重事实証据(人証或物証),貴精不貴多,虽有事实、但証据未拿到手的,都不在搜集之列;
2. 特別注意寻找日本发行的报纸或敌伪的官方文件所发表的有关材料,用日本之矛来攻日本之盾,使无反駁的余地。

为了避免日本特务注意,我們决定由大家分头搜集有关材料,不再聚会。所有从各方面收到的材料,統交由巩天民轉交給刘仲明。材料的整理編写工作,由张查理、毕天民、刘仲明三人担任,并由刘仲明总其成,最后并請于光元作总的审校;編好后,請曲凌汉

打印。

我們进行工作的目标和具体办法确定以后，大家就馬上行动起来，分头搜集材料，并联系当时各方面的一些爱国人士协助进行。当时联系的，有伪省政府教育厅长金毓黻、教育会长兼女师校长林宜軒，由女师教員薛兰石与小组接头；农会会长閻模楷，銀行界、工商界由巩天民負責；医药界由刘仲明負責。

有些材料的搜集，不是沒有危险的。如日軍直接給伪省政府的命令，是通过伪省府管卷的爱国分子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当夜拍照、次晨携回的办法取得的。又如伪沈阳市政府函謝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賞金千元的原函，是由巩天民冒险夜入商会取出，赶晒成蓝图的。又如日軍張貼的告示，我們是白天在僻靜街道处寻到一张完整的，記明地点后，于深夜怀藏水瓶子前往潤了下来的。再如日軍把持中国財政的布告，貼在財厅門前，有日軍站崗，我們选择阳光最好的一天下午，利用太阳西照、阳光刺眼、崗兵不易向西瞭望的机会，携带照相机由僻处爬上財厅对面一家商号的房頂（財厅在路东，商号在路西），蛇行到这家商号的高門脸后南端，鏡頭对准布告，等有来往車輛經過，即利用車声掩护，拨动机紐拍摄。以上这些行动，如果稍不小心，一被发觉，即有性命危险。

各方面所搜集得来的材料，均交刘仲明加以归納整理，斟酌去取，进行編写。全部整理和編写工作，約用了四十天，打印用了八天，都是在夜間进行的，因为一則白天各人都有工作；再則为了保密，也不能在白天搞这个工作。刘仲明和毕天民、张查理都同住在一院，合力进行，也甚为方便。

編者注：本文原来是刘仲明、张韻冷两先生分別所写的两篇稿件，經編者征得他們同意，加以删节，合成一篇，特此注明。

二、材料的主要內容

我們編就的材料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証据汇编，把全部証据都貼在一个大相片簿上，每項証据都編有順序號碼，中文証据都譯有外文，并由张查理夫人做了一个黑緞子外皮，上面繡有英文“真理”字样。第二部分是說明书，分作三篇，說明各种証据要点，并依証据来揭穿日本欺騙世人的謊言，駁斥它們的种种荒謬論据。材料容內簡述如下：

（一）第一篇主題為：日軍在九月十八日進軍沈陽，是早有計劃的侵略行為，所謂由于自衛，完全是欺世謊言，所列举的証据如下：

1.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所办的英文报《滿州日日新聞》（簡稱 M.D.N.）所发表的各项有关报道，最主要有以下三件：

（1）关于日本軍部对中村事件决定采取“断然处置”的报道；

（2）关于日本軍部特召日本关东軍參謀长喜多回国就中村事件磋商“断然处置”的具体办法的报道；

（3）关于关东軍參謀长銜軍部命于沈陽事变前五日回返滿洲的报道。

2. 英国人陶牧师（J. Dorward）关于他的友人于九月十八日晚九点十分乘滿洲里直达快車准时到达沈陽南站，途中并未遇到任何阻碍的簽字証明。

3. 《滿洲日日新聞》九月二十日关于日軍占領沈陽、營口、公主嶺、長春的报道。

4. 日人所办的《盛京时报》所刊載的日軍占領沈陽辽宁省財政厅及东三省官銀号的照片（該兩机关門上均懸有日本旗，且有日本

兵看守)。

5. 日本关东軍司令本庄繁于九一八事变后公布的安民大告示(系木刻印制的,高三尺,寬二尺半,于九月十九日上午六点即出現在沈阳西关)。

(二) 第二篇主題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軍在东北三省到处侵犯中国行政主权、殘杀中国人民的事实,所列举的事实如下:

1. 辽宁省教育厅厅长金毓黻关于日軍于九月十九日侵入沈阳城后将辽宁省长拘禁,使其无法行使职权的証明书。

2. 日本关东軍特务头子土肥原于事变后四日就任沈阳市长的布告。

3. 《盛京时报》刊载的日軍司令部委派充任东北各項公共事业机关如鉄路、邮政、电报、稅局、銀行以及学校副首长职务的日本人員名单。

4. 由大汉奸袁金鎧署名的东北治安維持会告示(内有“奉日本軍命令組織本会”字样)。

5. 沈阳城内各街道行人惨遭日兵枪击的伤員名单。

(三) 第三篇主題为:滿洲伪国的建立是日本关东軍一手包办所制造出来的,所列举的証据如下:

1. 《日本新聞画报》所刊登的“四巨头”建国座談照片(所謂四巨头者,即日本关东軍司令本庄繁和张景惠、臧式毅、馬占山、熙洽等四人,本庄繁踞座談会中央)。

2. 《盛京时报》所載“东北地方自治会”人員名单(据《盛京时报》报道,“东北地方自治会”是請愿建立“滿洲国”的主要团体)。

3. 日本关东軍司令部办事手册(該手册內規定司令部各科的

工作職責，內載第三科專管“建國”事宜）。

4. 《盛京時報》所載土肥原由天津將溥儀接來作“滿洲國”的皇帝的照片及報道。

5. 《盛京時報》所載各地慶祝“建國”遊行的照片（有錦州、綏中、營口、公主嶺等地，遊行羣衆兩旁都有很多荷槍的日兵隨行）。

6. 遼寧省立女師林宜軒校長申訴日籍副校長威逼學生簽字請願“建國”的聲明書。

7. 偽沈陽市政府函謝沈陽市商會派人參加慶祝“建國”遊行大會并送千元賞金的謝函藍印圖。

三、遞交密件的过程

我們把材料整理編寫完了之後，對於如何把這份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險所搜集來的證據交到國聯調查團的手里，頗費一番躊躇。因為我們料到調查團到沈陽的時候，日本一定要布滿警特，若由我們親自交遞，人身危險姑且不論，日特見我們帶着一大包材料去見國聯調查團，他們一定千方百計把它搶奪了去，那豈不是日本侵略罪行不得揭穿，正義永不得申，而我們大家的辛苦將盡付東流。經過多日的考慮，我們最後決定利用那時的英日關係尖銳化的形勢，求在沈陽的英國朋友給我們代交，這樣較為妥當。當時大家派劉仲明同沈陽的小河沿施醫院院長雍大夫（Dr. W. Young）接洽。雍大夫表示很樂意幫助，並提出很多寶貴意見，例如他提出：“你們交這個材料，必須有一封用真實姓名簽名的信，並且應親自交到調查團團長的手里，團長才能提交給調查團作為正式文件。若只有材料而有沒信，那就等於告密，按照國際法庭慣例，是不予置理的。可是這次你們處在特殊情況下，無法親自交到調查團的手里，而你

們簽字的真偽，他們也無從辨別，那只有由我們代為證明你們交信人的真實性，才算完成法律手續，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幫忙。但是，交遞該項材料，我不合適，因為我不認得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但我可以為你們求倪博士（Dr. Oniel），他與李頓是至親，容易和他談話”等等。劉仲明對雍大夫的熱情幫助，代表大家向他道謝。劉回家后寫就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謹代表大學教授畢天民，銀行家巩天民，醫師劉仲明、張查理、李寶實，社會教育家張韻冷等人，將此材料送交貴調查團審閱，借這些材料你們完全可以了解沈陽事變及以後發展的一切真象”，信末簽署劉仲明個人的名字。

三月上旬某日（實際的日子記不清了），倪博士親自來劉仲明家取那份材料。劉仲明把材料交到他手裏的時候，他很嚴肅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我死了，我是為了一個偉大的事業而死的（If I die, I die for a great cause）。”倪博士家在法庫，他覺着不便把這份極重要的文件帶到法庫去，於是他就送到沈陽英國領事館保存，鎖在領事館的鐵櫃內，他自回法庫去了。

國聯調查團大約是在四月中旬來到沈陽，住在滿鐵經營的大和旅館（即現在的遼寧賓館）。當時該館的全部人員、汽車司機以至旅館附近的人力車夫，全換了日本關東軍特務充任。調查團人員到沈陽後，被日本特務嚴密包圍，除了看到些日本擺布的假象外，什麼也接觸不到；當時伴隨國聯調查團的中國特派員顧維鈞等人，行動也失去自由。

調查團到沈後第五日，由倪博士出名邀請李頓和他的秘書到譚文綸（McNaughton）牧師家晚餐，雍大夫作陪。倪博士即席把劉仲明寫的信交給了李頓，並由倪博士、譚牧師、雍大夫等人簽字證明劉仲明和信上所提到的幾個人都是真實姓名。第二天國聯調查

团全体人員到沈阳英国領事館审閱我們所搜集的材料，共审閱了一个下午。据当时《盛京时报》載，国联調查团在英国領事館审閱了一些材料，頗为滿意云云。后来发表的《国联調查团报告书》內提到在沈阳接触了一些医生、銀行家、教育家等，就是指我們送递材料的这些人。

四、敌伪于事后的大逮捕

《調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由于提到曾經在沈阳接触到一些医师、銀行家、教育家等这个事实，自然不能不引起敌伪的注意。調查团在沈阳被他們所布置的警探层层严密包围，风絲不透，一般人是不容易接触到的，但是他們发现沈阳英侨曾宴請过英代表，认为其中必有文章，于是就沿着这綫索跟踪探索。一九三三年冬，敌伪于获得一些綫索之后就严密地布置了逮捕网，于某夜出动了大批日宪伪警，將他們认为可疑的分子——逮捕。小組同人除了张韻冷、曲凌汉二人以外，全遭捕去。巩天民被捕时，他考虑到納金分戶賬若被查出，必将牵累多人，于是急中生智，拿出賬本，当面向巩夫人說：“我此次离家，不定多少日子，家里这本柴米賬，你接着写吧”，說完交了过去。巩夫人接过，順手放在格子里。这时宪警嫌他囉嗦耽擱，怕耽誤了逮捕其他入犯的时间，也沒有閑功夫看他的什么柴米油盐賬，就紧催他走了。他們走后，巩夫人赶紧打开一看，分戶姓名尽是眼前朋友，才知道所关重要，馬上隱藏起来。天明，捕人消息传出，张韻冷立刻到巩家去，急問巩夫人有本賬拿走否？她悄声說了經過，領他从煤堆子取出，装进提袋，交韻冷由后門帶出，当夜作了处置。

更为严重的，是当夜在同仁医院逮捕刘仲宜的时候，从梁上搜

出了一台印刷机，又在写字台里搜出共产党抗日宣传品。这一来，刘仲宜马上便被直接送日本宪兵队。巩天民被捕后，伪警厅发觉他曾入过关，即引渡到日宪兵队，接着刘仲明也被提到宪兵队去了。

同时被捕的，施医院除毕天民、张查理二人之外，记不准的还有五六位；青年会有黄毅然、刘毓伦；女师有薛兰石；教会有刘国华。沈阳英美烟公司、锦州青年会、吉林青年会也都有人被捕入狱。

敌伪这样无边无岸地大批捕人，一时造成的恐怖世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小组同人漏网在外的，每天都作入狱准备，得一天自由，就为被捕同人奔走营救，探听消息。

刘仲宜自到宪兵队，即受一连串的酷刑审讯，如疲劳审讯、电流通脑、灌辣子水、滚铁板、卧短凳等，简直把他折腾疯了。所有被捕的人，胸前都挂个“反满抗日犯”的布条子。

案子始终秘密进行，从未宣布。经过了半年以后，被捕的人有的被释放出来了，接着陆续放回，较严重的不到八个月也都出来了。这个案子似乎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案结后，小组同人除少数因业务不能离开沈阳的以外，多数都设法入关，转到后方，参加抗战去了。

巩天民在警务处受审问时，有一个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塚对他說：“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并且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的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事后巩天民谈起这个日本特务所说的这段话，刘仲明說：“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果真如他所說的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

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 抗日复土斗争

閻 宝 航

自从日本侵略势力侵入我国东北以后，东北人民处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线，对日本帝国主义数十年来的侵略活动，进行了不断的斗争。远者不论，仅从一九二八年至九一八事变以前这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紧，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亦日益扩大而深入。略举数事如下：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組織，遍設于辽、吉、黑三省各大城市，而且推展到各县（辽宁一省即有四十一个县設有国民外交协会分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有力地支援东北地方政府对日的多次交涉。又如辽宁国民常識促进会，广泛展开抗日宣传活动，利用寒暑假，組織学生下乡宣传，抵制日貨，提倡国貨，深入全省各县各地。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則經常調查、揭露日本在东北各地開設烟館、販賣毒品的毒华政策，沒收、焚燒日人从瑞士及德国偷运进来、价值百万的海洛英等毒品。

此外，一九二九年秋，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日本西京召开大会之前，以余日章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沈阳举行筹备会。筹备会主任閻宝航从张学良处取得一件令人驚訝而确实可信的密件——“田中义一奏章”，征得张学良同意，决定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侵略中

国的阴谋文件译成英文、公布于世，并赶印若干本，分发英美等国代表。接着，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指出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与阴谋，和日本代表团展开激烈的论战。日本首席代表松岡洋右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企图阻止会议进行辩论，造成会议进程中的一大轩然大波。稍为远溯一点，则有为声援“五卅惨案”而举行的规模空前、组织严密、声势浩大的辽宁省城两万学生的大请愿游行。在这几年当中，东北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抗日爱国运动，形成了高潮，并且涌现出不少领导人物，从而为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东北人民抗日复土斗争准备了条件。

东北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日爱国的斗争，积渐而来，日益熾烈。迨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激起了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总爆发。流亡入关的东北爱国人士及广大青年亦及时奋起，进行抗日复土的斗争。

关内东北民众抗日复土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九一八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时起到一九三三年八月被迫结束、一度转入地下、成立复东会止，为第一阶段，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时期。从一九三三年复东会成立不久，又被迫取消而成立四维学会，一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为第二阶段，可叫作四维学会时期。一二九运动以后到七七事变之前，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联”）和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东总”被迫取消为止，则为第三阶段，即“东联”与“东总”时期。现依上述三个阶段内的东北民众抗日复土活动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就其突出的片段，加以叙述。

一、第一阶段——东北民众 抗日救国会时期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閻宝航偕辽宁省商、工两会会长金哲忱、卢广績等从沈阳設法逃出敌人虎口，抵达北平，次日即会同先已在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发起組織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簡称为救国会，以下間用簡称），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謀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救国会于九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会址設于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內。在平的东北人士踊跃参加，入会者达四百余人（會員不以东北人为限）。會員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會員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推选常务委員；常务委员会下，設总务、軍事、政治三部，各部設正部长一人、副部长二人，均由常务委員兼任。总务部正、副部长为卢广績、高崇民，軍事部正副部长为王化一、彭鎮国、熊飞，政治部正、副部长为閻宝航、杜重远（杜在上海未到任，嗣推霍維周繼任）。此外，还設有监察委员会及特种委员会，如軍事及政治委员会等。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組織成員，如从階級来分析，資产階級占少数，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絕大多數。从党派來說，国民党如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吳煥章、黃劍秋及“改組派”錢公来等，青年党如王捷俠、霍維周等，都曾参加。共产党地下黨員和在党的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則有宋黎、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軒（現名为张金輝）等。閻宝航、卢广績、王化一、車向忱等，則属于大多數的无党无派。

当时摆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和組織人民抗日的武装斗争，以期唤起全国人民共起抗日，并对日寇进行破坏扰乱，以阻挠其进一步扩大对我国领土的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即以宣传工作及军事工作为中心，展开并推动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

为了联络馬占山、李杜，策动辽东救国軍唐聚五、邓鉄梅等部及沈阳、辽西的义勇軍，救国会先后派車向忱、黄宇宙、宋黎、张雅軒、苗可秀、高鵬、紀廷榭、潘廣祺、魏兴华等及大批政工人員秘密出关，进行工作。在宣传工作方面，除了組織宣传队，沿平津、平汉等铁路綫扩大宣传之外，又以北平、天津、上海为宣传重点地区，曾派王化一、徐靖远等到平津各大学，閻宝航到南京、上海各地，报道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及东北义勇軍奋起抗战的情形。为了訓練出关抗日青年，曾組織学生軍集中訓練，为期两三个月。为了安置逃亡进关的东北青年学生，培养抗日的骨干力量，开办了东北学院（后改名东北中学）和东北难民子弟中学，以王化一、李梦兴分別担任校长。东北大学不久亦在平复校。三校开学后，均加紧实施军事訓練。言論机关則办有《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与《东北通訊》。为了安置抗日人員的眷属及逃亡关内、一时无法謀生的东北人民，設立了收容机关，名曰东北难民教养院。为了表彰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設有昭义祠。以上种种措施，都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为指导方針，各方配合，积极創造条件。

在这里須交代张学良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关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組織与抗日活动，純系东北民众出于爱国热情、民族义憤和憤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自动自发起而保家卫国的行动，事前既无张学良的授意，事后亦无需他的批准。但是张学良在

精神和物質上都曾給我們許多有力的支持，直到他被迫下野為止，如鼓勵抗日將領，維持救國會領導同志生活，及發行愛國獎券，以接濟義勇軍和彌補救國會及東北中學的開支，即其事例。

南 京 請 願

為了督促國民黨政府實行抗日，救國會決定組織赴京請願團。此時適逢國民黨寧粵兩方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救國會乃於十月二十八日開全體委員會議決，請願團先去滬向國民黨和平會議請願，再轉回南京請願。請願的目的為：一、響應和平會議，促成統一政府；二、團結全國愛國力量，一致抗日；三、督請南京政府出兵收復東北失地。

十一月五日，請願團大隊齊集北平東車站，準備出發，路局受南京政府暗示，不給掛車。張學良為敷衍南京政府的面子，也表示劝阻，請願團未予理采。南下列車行將開車，請願羣眾紛紛臥軌，阻止開行。青年們大聲疾呼，向乘車客人宣傳南下請願的重大意義，有的聲淚俱下。全體乘客深受感動，自動註出列車，並有一部分人要求參加南下請願。頓時，這一系列客車變成了請願專車，在車上車下歡聲雷動之中，駛出了北平車站。

十一月七日早晨請願團到達浦口，過江後，經在南京的東北羣眾協助，即時轉搭滬寧列車去上海，當日深夜抵達上海南站。江問漁、陳立廷等多人代表上海市各愛國團體到站歡迎，並將請願人員分別安置在中華職業學校、西成小學、上海中學、務本女中四處。

和平會議已於請願團到滬的前夕閉幕，因此，請願團決定推出高崇民、盧廣績等為代表，會同原已在滬的閻寶航去會見胡漢民、汪精衛；請願大隊則由王化一率領在上海遊行示威。汪精衛在

接見代表時大談其對國事的意見，滔滔不絕，但毫無要領。胡漢民接見時，則戒備森嚴，代表每人身後站着一個便衣。胡對張學良大肆非議，對東北的淪陷則謂“國之強弱不在疆土之大小”。一場激烈爭辯之後，不歡而散。

遊行大隊在傾盆大雨下，精神振奮，意氣激昂，先繞行南市，然後闖入英租界。英租界當局出動大批武裝英國軍警攔阻，並排列水龍、機槍以示威吓。正在相持不下時，經上海各界人士出面勸阻，大隊始轉回南市，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引起上海人民莫大的同情。

十一月十日，請愿團轉回南京，住金陵大學的體育館和禮堂的地板上。次晨，請愿團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愿，吳鐵城、張繼兩人代表蔣介石向大家講話，勸大家早日北返，不要受別人“煽動”，並說中央一定有辦法等語。請愿團當場駁斥了他們所謂受別人煽動的說法。當時聽說蔣介石躲在中央軍校，於是，大隊人馬在激昂憤怒的情緒下，轉赴中央軍校。此時大雨滂沱，中飯未吃，請愿團冒着大雨，忍着飢餓，一口氣趕到中央軍校。蔣介石推延到下午三時半才出來接見。這時，天津學生請愿團也趕到參加。

高崇民站在大隊的最前列，與蔣介石的講台相距咫尺，慷慨陳詞，請蔣介石率兵北上，收復東北失地。他說：“東北人民對促成統一、保衛國土所作的努力，對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敵寇入侵以來，不發一兵，不作明確抗日表示，一味依賴國聯，使敵寇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境，中央何以對起東北人民？”這番義正詞嚴、激切沉痛的詰責，把蔣介石質問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他於是老羞成怒，耍起流氓態度，說道：“東北失掉，東北人來請愿還可以，天津並未丟失，天津學生來請什么愿？”這一來，全體羣眾特別是天津學生請愿團

更加憤怒了，一位青年大聲高呼：“東北是中國土地，我們是中國人，你是中央政府的最高負責人，所以來京向你請願。”隨之，全場掌聲雷動，高呼“請中央領導抗日！收復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等口號。蔣介石驚慌失措，急忙轉身退入後台。十分鐘後，他又重新出來，用挑撥離間的口吻對大家說：“不要聽信造謠挑撥，要鎮靜聽候中央處理”，並且又重複“到必要時候，中央一定抵抗，還要依靠國聯正義制裁”等一套濫調。蔣介石說完之後，立即退席。這時，羣情鼎沸，呼喊叫罵之聲，不絕於耳。

請願團全體人員飢寒交迫，疲憊萬分，返回金陵大學後，即提早休息，準備次日北返。但在夜里十點鐘左右，突然闖進大批憲兵和便衣特務，叫起全體人們，逐一檢查，聲稱請願團有共產黨參加在內，散發“反動”傳單等事情，但他們搜查結果，一無所得。被激怒的全體請願人們紛紛說：“抗日有罪，請願有罪，愛國算是反動？什麼不算有罪，什麼不算反動？”有的竟氣憤得痛哭失聲。

“南京請願，白跑一趟。國民黨政府既決定不要東北，我們自己去干吧”——這是請願團六百餘人的共同認識，同時也是流亡關內東北民眾一致的決心。

國民黨反動派演唱對台戲

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進行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動，對於推動東北民眾的抗日鬥爭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國民黨反動派是不許人民抗日的，同時也不喜歡一個與張學良有關係的政治團體繼續活動下去，為此，他們就千方百計地對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進行破壞活動，首先是利用一些東北籍CC派反動分子，戴上抗日的假面具，掛出抗日工作的假招牌，借為不抵抗政策放煙幕，並妄圖以此收攬

东北人心，打击东北人民真正的抗日救亡活动。

以齐世英、梅公任为首的东北籍CC派糾合从东北逃亡进关的国民党CC分子徐箴(原哈尔滨特区电信局长)、周天放(原哈尔滨特区教育厅长)、臧启芳(原哈尔滨特区地亩局长)及早在关内的曹德宣、李錫恩、王星周等，大肆活动，从种种方面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相对抗。在組織民众方面，他們由周天放出面主持，組織“东北行健学会”，网罗东北上层人士，以国民党員为骨干；由曹德宣出面主持，組織法西斯式的反动团体“东北青年学社”及其核心組織“力行团”，宣传法西斯思想，并收买东北青年作特务(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各院校出現的东北籍特务分子，多为力行团员)。在青年教育方面，他們先后設立“知行中学”及“念一中学”，由梅公任、周天放分別主持。接着国民党教育部又在北平設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以周天放、李錫恩为正、副主任，并由該处直接办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以李錫恩兼任校长。当时中山中学、知行中学、念一中学收容从东北进关、食宿无着的青年学生为数不少，显然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领导的东北中学和在平复校的东北大学相对立。齐世英則在上海以“抗敌救国”为幌子，成立一个“东北协会”，与远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遙相对峙。

国民党反动派分子在輿論宣传方面，也不放松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对抗。他們拥有一个民友书局(附設有印刷厂)，出版《东北月刊》、《东北旬刊》、《东北青年》、《行健月刊》、《行健丛刊》、《北強月刊》、《蒙古月刊》、《黑白半月刊》等反动刊物，以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旬刊》、《东北通訊》、《复巢月刊》等刊物对抗。当时，我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言論主张上，主要表現在“是誰不抵抗？”和“不抵抗政策”的問題

上：他們拼命为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护，把丧失东北的責任推到张学良一个人的身上，說是由于张学良不抵抗；而我們則正面予以揭穿，以事实說明东北丧失是由于蔣介石命令不准抵抗。他們拥护蔣介石的“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为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进行辯护，而我們則主张全国团结抗日。我們旗帜鮮明地高呼“打回老家、收复失地”的口号，而他們遮遮掩掩，只提“收复失地”而不提“打回老家”的口号。他們的反动宣传，曾使一部分东北人士和一些青年学生受到一时的欺騙蒙蔽。

国民党反动派分子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六月“何梅协定”签订以前，鑼鼓喧天，用尽各种手段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唱对台戏，但在“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国民党的党部和中央軍、宪兵团被日本人赶出华北，东北CC分子也都夹着尾巴南逃。从此，他們也就偃旗息鼓，消声匿迹。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破坏活动，不但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了。

东北人民抗日活动轉入地下

一九三三年五月，“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何应欽奉行日寇要求取締华北抗日活动，特别是取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及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的意旨，通过高仁紱于七月十日向我們传达了取消救国会的命令。七月十四日，救国会公推閻宝航、卢广續、王化一、錢公来四委員到怀仁堂向何应欽交涉，何应欽为了減少他們屈膝外交的困难，坚持救国会必須取消，并采用威胁手段，施加压力。救国会张希尧同志于十五日在街头散发反对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传单而被捕，徐靖远同志因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而入獄。与此同时，何应欽明令停止救国会发行爱国奖券，以断絕救国会的經費来源，企图

从經濟上扼杀救国会。这时,专以镇压抗日人民为任务的中央宪兵第三团,已经开駐北平。“抗日有罪”成为公开执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聞。七月十五日,朱庆瀾主持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被迫宣告結束。

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配合向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加紧压迫摧殘的形势下,我們并未因而消极畏縮,相反,抗日到底与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但是,鉴于当时华北内外情势,抗日工作不得不轉入地下。八月三十一日,常务委員扩大會議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布結束。

在这次會議上,CC派委員黃劍秋說:“日寇不怕几十万国軍而怕十几位救国会的委員。”黃是国民党CC系的东北重要分子,他这两句話,一方面反映了日寇对救国会的畏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嫉視。

复 东 会

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經過多次磋商,决定抛开原来委員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組織,定名为复东会,并采用封建結盟的方式,举行入会仪式。依照上述方式,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即“九一八”第二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复东会的成立大会,在关岳象前宣誓,并飲苦水一杯,誓詞为:“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复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會員大会,第一次入会的會員三十一人。执行机构为理事会,設理事长一人,理事若干人,秘书长一人。因理事长人选問題内部有爭执,延至十二月十九日,才在欧

美同学会举行會員大会，选出王卓然为理事长，高崇民为秘书长，理事九人。但理事长选出后，會員仍有意見，因而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八日，王卓然辞去理事长职务，另选閻宝航繼任。

西山訓練班

与筹組复东会的同时，閻宝航和张希尧、宁匡烈、徐靖远等同志秘密筹备开办干部訓練班，以一九三三年八月至十月为訓練时期，地址选定北京西山臥佛寺，对外以“学生夏令委员会”名义作为掩护。参加訓練班者，均經审查选拔，約一百余人，国民党分子一概不要。閻宝航任班主任，张希尧負責組織工作，兼管生活事务，是主要負責人之一。訓練主要内容为馬列主义、游击战术、爆破技术及时事討論等。宋星池、徐靖远、宁匡烈分別担任馬列主义、游击战术及爆破技术的讲授，閻宝航主持时事討論。全体受訓人員分为兩組，討論課題时，則分为更多的小組，以縮小目标，便于掩蔽。訓練结束后，受訓人員均分別派定任务，有的留在平津，有的潛入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其中一部分則进入当时的苏区。

必須指出，这个訓練班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张希尧、宁匡烈等同志領導之下举办的。由于当时环境险恶，救国会某些成員对共产党的認識尚有差距，甚至还有反共的，因而訓練班不得不保守秘密；即使救国会領導核心成員，亦只知有訓練班而不知訓練內容。

开办西山訓練班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批受訓的东北青年認清了国民党投降卖国、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質，确定了跟着共产党走、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任务而斗争的方向。

霍維周被刺案与东北青年党人的分化

与此同时，东北青年党人也起了分化。

东北青年党人的实际领导者霍維周被选为救国会的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后，极力发展組織，扩大影响，在东大、东中及一般东北青年中吸收党员不少，如苗可秀、高鵬、紀亭榭等东北青年，一时尽入其网罗。但后来事实証明，霍維周还不失为一位爱国者：約在一九三三年春，青年党头子曾琦、李璜与日本关东軍参謀长小磯国昭勾結，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为条件，接受日寇百万元巨款，名为反蔣活动費。霍維周发觉此事后，不久即与王捷俠登报揭发青年党的这一通敌卖国事实，并声明脱离青年党，另組“国社党”（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六月十七日，霍維周被青年党派人刺死于西单北大街石虎胡同口。

絕大部分原东北籍青年党人都随同霍、王一起脱离了青年党，其中一部分，如高鵬、紀亭榭等，在霍維周死后，并未加入新組織的国社党，最后终于选择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第二阶段——四維学会时期

四維学会的成立

复东会成立后，抗日活动轉入地下，并排出了CC分子，这就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大的疑忌与敌視。

轰动一时的霍維周被刺案与国社党的宣布成立，增加了国社党头子王捷俠的声势。国社党成立后，在东北中学、东北大学中确实吸收了一些党员，起了些消极作用。他們有时与进步学生为敌，

有时也与国民党分子作对。而王捷俠則自我吹噓，迹近招搖，声称东中、东大以及东北軍人中均有国社党黨員或同情者。国民党 CC 派分子更加以扩大，密报于蔣介石，謂东中、东大、东北軍都已“国家主义化”，并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組織。蔣介石遂派特务头子戴笠来平，会同在平的国民党北平軍分会政訓处长刘健羣进行調查。

戴笠、刘健羣經過調查研究后，对国社党与复东会作出了显然不同的評價与对待。一方面，他們对国社党认为无足輕重，并采取了压迫手段，于一九三五年一月逼令宣布解散，王捷俠被张学良軟禁于武昌，短命的国社党遂告夭折。

另一方面，他們对复东会則认为是关内东北人的一个核心力量，且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事实上，东北軍將領与救国会领导人，多系知交故旧；东北軍在张学良被迫下野后，失掉了領導，許多將領如王以哲、黄显声等多同情支持复东会，因而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軍与东北人的联系的紐帶。同时，张学良从德、意考察归国后，主张拥护領袖、实行独裁政治等論調，复兴社认为大可利用。当时复兴社成立不久，羽毛未丰，正想从各方面拉攏实力，以与 CC 系对抗。他們认为，如果把复东会拉了过来，便可以影响张学良这一方面的力量，削弱敌对势力，壮大自己陣容，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于是，他們对复东会就打定了拉攏的策略。

先是，国民党 CC 派分子在密报中曾指出王卓然、王化一都是国社党，蔣介石要求张学良对这个問題連同所謂东北軍“国家主义化”問題，一并加以澄清。为此，张学良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电邀王卓然、王化一两人去汉口轉南昌，見蔣当面解釋。戴笠适于此时由北平到达汉口，陪同王卓然、王化一去南昌。事先，张学

良与蒋介石曾談到拥蔣抗日、与黄埔系合作的問題，可以設想，戴笠这次到汉，必然会和张学良談起這個問題。

四月一日，王卓然、王化一在南昌北坛分別向蔣报告了复东会的組織和九一八后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工作。接着，談到合作組織新团体問題，蔣指定刘健羣、邓文仪、戴笠和王卓然、王化一共同商量。商量結果，决定以下各点：一、彻底融合蔣、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唯一領袖，肩起复兴民族之大业；二、繼續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大战时之准备；三、复东会由张学良負責說服取消，领导人加入新組織；四、蔣为事实上的領袖，不居名义，組織理事会，由张学良就近領導；五、新組織定名为四維学会；六、会址暫定設在武汉；七、对外暫守秘密。他們并根据上述各点起一草案，送蔣介石亲自加以审批。

四月十五日，邓文仪、戴笠、王卓然、王化一同返汉口，共同向张学良汇报了經過，张学良同意草案内容。同日，王化一返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組織传达了张学良的意見和去南昌的經過。关于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維学会問題，核心組織进行了多次討論，爭論很激烈。最初决定絕不同意参加四維学会，更不能取消复东会；嗣則考虑可以参加四維学会，但不取消复东会，以高崇民、閻宝航主张为最力。四月十八日，王化一曾致电在武昌的王卓然称：“此事（指取消复东会）最难解决，或兄回平，或高、閻去汉面商。”函电往复，終未解决。四月二十六日，王卓然由汉回平，轉达张学良的希望，并进行說服。王卓然在南昌时蔣介石曾問及复东会能否取消，王卓然表示不成問題，他可負責。而王化一当时在場，对王卓然这种未得理事会討論决定、擅作主张的答复，也沒有表示反对。

旋张学良又派黎天才来平疏通。理事会經過几次討論，最后

决定：可以考虑张学良关于取消复东会、加入四維学会的主张；但四維学会必須明确繼續抗日救亡工作；为避免敌人注意，仍采秘密方式进行；并决定上項意見由复东会领导人去武汉面見张学良作最后决定。

五月三日，閻宝航、高崇民、卢广續、王化一去汉口，王卓然則先一日去南京轉汉口。

五月七日，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亲自向复东会领导人作了長時間的說服工作。他的主要理由是：要打回老家，我們自己力量不够，必須与握有軍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結合，以及在当前大势下必須拥蔣才能实现抗日，等等。他的意見最后取得了大家勉強一致的同意。

五月十二日，四維学会在汉口銀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举理事。选出的理事共十五人，蔣介石方面的为：賀衷寒、刘健羣、戴笠、邓文仪、邱开基（后因犯罪被扣，由曾扩情补充）、丁炳权、袁守謙；张学良方面的为：王卓然、王化一、閻宝航、高崇民、卢广續、吳瀚涛、黎天才、关吉玉；另有候补理事五人。嗣又根据蔣介石的指示，选出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羣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丘开基为常务理事。蔣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实际上，蔣为会长，张为理事长，而以王卓然为对外的幌子）。

至此，表面上以“拥护唯一領袖、团結一致救国”（会章內有此两条）相号召，而实际上貌合神离、各有用心的“鬼胎儿”——四維学会，就呱呱墜地了。

四維学会成立后，全体理事去南昌見“領袖”。蔣介石接見以后，为了拉攏张学良方面的理事，下条留閻宝航办新生活运动，留吳瀚涛任海会寺訓練团教官。閻宝航通过邓文仪婉辞不就，理由

是，一則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則在北方还担负抗日的一部分领导工作。蔣介石和宋美齡一起再次接見，詭称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即是为抗日作准备，并不干預政治，而且对抗日活动允予援助（这是欺騙中的欺騙）。閻宝航又电告张学良請代为婉辞，而张学良复电則称“万勿推辞”。閻宝航乃允回北平稍作安置，再回就职。此即閻宝航当上蔣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总会書記的由来。

成立四維学会区分会

四維学会成立以后，迅速开展組織，首先在武汉成立了总会，会址設于武昌明月桥旧奉直会館內，由常务委員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負責主持；并在同一地址設立新生活俱乐部。接着在南京成立了区分会和一个新生活俱乐部，負責人为吳瀚涛、刘詠尧（复兴社分子）；在北平成立区分会和新生活实践会，地址在霞公府，負責人为王卓然、李靜澄等。上海的区分会的負責人为陈质平、孙一民；杭州的区分会負責人为赵龙文（复兴社分子）、李世璋、张师等。上述各大城市組織成立之后，积极开展活动，吸收成員。

蔣介石势力渗入东北軍，成立政訓处

四維学会成立以后，蔣介石就进一步阴谋把他的势力乘机渗入东北軍。他首先将东北大学、东北中学两校考取的学生集中訓練，作为政訓工作骨干。与此同时，蔣介石取得张学良的同意，在东北軍中以軍、师为单位，先后設立政訓处，派刘健羣、曾扩情、阮齐为东北軍的軍政訓处处长，随后又以刘伯华、高士栋等为师政訓处长。上述軍、师政訓处长人选，都是复兴社的骨干，黃埔系的中

坚分子。

东北軍將領对政訓处之設立,均怀有疑惧,万福麟曾公开表示反对,王以哲、何柱国等則虛与委蛇。蔣介石在东北軍中的政訓工作,虽未能深入展开,但对东北軍的最后瓦解,未尝沒有起过一定的作用。

与复兴社和 C C 派的斗争

显然可見,瓦解、消灭张学良的集团势力,是蔣介石成立四維学会的主要目的,而解散复东会,設立东北軍政訓处,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阴谋手段,至于所謂“团結一致、抗日救国”,則是欺騙东北人民的鬼話。然而张学良和我們某些抗日救国人士中,初見竟有不及此者。但是,就在这样情势下,我們对复兴社的欺騙和 C C 派的压迫,仍然进行了尖銳曲折的斗争。略述二三事,以为佐証。

一九三五年七月,华北局势紧张之际,某日在武汉黎天才家开座談会,在座的有賀衷寒、邱开基、丁炳权、刘詠尧、袁守謙,和高崇民、王化一等。高崇民說:“敌人如此猖狂,得寸进尺,实在忍无可忍,希望我們的‘領袖’馬上领导抗战,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否則全国人民对‘領袖’的拥护和信仰,将发生动摇。”賀衷寒立即反駁說:“領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不許对他不信任。我們四維学会的成員是宣过誓的,对‘領袖’更不可有批評。”高崇民反駁說:“我們宣誓是拥护他抗日,做抗日的領袖;如果他不抗日,我們就不拥护他。我把他看作是一个人,并未把他看作是神是圣。”从此高即忿然离开武汉去上海进行抗日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冀察政委会成立后,竟将抗日爱国青年开

列名單，送交日寇駐天津司令部。閻寶航根據地下工作同志密報，得悉此事，憤慨莫名，徑找賀衷寒大吵一番。賀衷寒推諉責任于華北當局，閻寶航氣極叫罵：“華北當局是你們中央政府的一部分，竟把抗日愛國青年出賣給敵人，而你們中央政府不問不管，你們這是什麼政府！”

從四維學會成立以後，我們和復興社骨幹分子的鬥爭，層見迭出，上述二事不過舉例而已。現在再舉一例說明我們對 CC 派的鬥爭：張希堯同志與閻寶航經常聯繫，負責支援華北、東北的抗日活動及地下黨的工作。他積極熱情，堅苦奮鬥，但行迹不免暴露，一九三四年冬季被國民黨北平市黨部逮捕，並搜出共產黨書刊及宣傳小冊子，同時被捕者還有寧匡烈、張雅軒、戴福純、牛牧野、王軀忱等共七人。閻寶航聞訊後，向當時擔任新運總會推行股股長的邵華關說，由邵介紹與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得徐一言而張希堯等七位同志即獲釋出。事後，陳立夫復閻寶航給他們的謝函有云：“彼等在吾兄領導之下，即在吾黨領導之下，彼等今后的行止，一切應由吾兄負責處理。”於是，張希堯留住閻寶航家一個時期，又返回華北工作；寧匡烈到武漢新生活俱樂部工作；其餘各人有的回華北工作，也有的進入了蘇區。

張學良的轉變

東北民眾從蔣介石的欺騙中更加認清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本質，張學良也從“擁蔣抗日、實行獨裁政治”的迷夢里醒悟過來，而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請看下述二事：

一、給張學良的一封信

杜重遠因“新生事件”被押于上海曹河涇蘇州第二監獄，以與

論关系，頗受优待。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一日，高崇民、閻宝航、卢广績、王卓然、王化一同去看望。大家利用这个在獄中共同会談的机会，研討了国内政治形势，咸認為，蔣介石坚决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东北、华北，以保持四大家族小王朝，而东北軍被命令参加“剿匪”，是蔣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軍的一箭双雕政策。因此，我們东北人民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打算，必須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否則，东北軍如被消灭，則复土还乡，更无希望。基于这样的共同認識，大家当时便联名写給张学良一封沉痛的信，提出停止“剿匪”、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适逢胡愈之亦来看望杜重远，他也和大家一起力促高崇民赴西安一行，送达这封信并对张学良进行說服工作。

二、张学良的一次长時間的談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旬，閻宝航以視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十四日，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館召集閻宝航、卢广績、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作了一次长時間的談話。张学良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了决不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并进而談到如何調整人事、掌握輿論等具体問題。但他表示还要以至誠去“感动”蔣介石，以實現其主张。张学良在結束談話时，还要大家去和高崇民談談。事实上，我們和高崇民在前一天晚上，已經在楊虎城的王軍需处长家作过长談（談話时得知高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駁斥当时反动派的唯武器論，散发給东北軍和西北軍），大家一致認為除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別无出路。此时距“西安事变”只有一个月左右，山雨欲来，箭在弦上，东北人民、东北將領，和张学良一起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最大决心，已經是无法遏止了。于是，貌合神离、各有用心的

四維学会,这时便在张学良“暂行擱置”的指示下,无声无息地实际宣告結束,同时組織以张为首的抗日同志会,但未公开。

三、第三阶段——“东联”与“东总”时期

一二九运动后流亡北平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工作的 蓬勃开展和“东联”的成立

流亡关内东北人民抗日运动气势磅礴地开展起来,是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开始的。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救亡运动后,随着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流亡关内的广大的东北人民都觉悟起来了,唾弃了国民党的对日投降、对内内战的政策,接受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紛紛組織抗日救亡团体,以推动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处在抗日斗争最前綫的北平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最为深入:首先是东北留平各大专学校在一二九运动中紛紛成立起学生会,积极参加救亡活动。接着,一九三六年春,由李延祿、于毅夫、赵濯华、张克威、陈大凡等組織了“东北人民抗日会”,出版了《东北之光》。繼之,“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妇女救国联合会”、“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基督教青年团”、“黑龙江救国联合会”、“吉林救国联合会”,及“图存学会”等紛紛出現,出版刊物有《东北生活》、《东北呼声》、《黑流》等。

为了貫徹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广泛团結东北各阶层人民抗日力量,一九三六年秋,在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会等十三个团体又合組为“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出版机关刊物《东北知識》。“东联”的会址設在西直門内东北大学校

部，领导人为了于毅夫、李延祿、張克威、趙濯华、陈大凡、汪之的、張希尧、李向之等。

“东联”成立后，在关内东北人民中展开抗日救亡活动，曾发动会员去西安参加东北軍学兵队和去保定东北軍五十三軍呂正操团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綏远抗战起，“东联”派于毅夫等去綏远傅作义部进行慰問。西安事变爆发时，“东联”在北平散发张、楊八項主张传单，組織各界座談会，并派代表去西安取联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发动签名运动，要求停止內战，对日抗战，实行民主政治，由于毅夫等携带姜紹虞等一千七百余人的东北人民签名，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請愿。一九三七年春季，国民党教育部派 C C 分子臧启芳強制接收东北大学，东大同学拒絕接收，在“东联”的声援和支持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留在北平的东大同学去南京請愿，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释放张学良、續发东大經費等，“东联”发动旅平东北人民繼东大同学南下之后，准备繼續出发，为学生后盾，后因东大同学火車被胡宗南第一师扣于江苏柳泉車站，遂停止发动。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东大三百余同学，絕大部分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很多人經過党的长期培养，以后都成了党的优秀干部。七七事变后，“东联”的战地服务团在宛平、长辛店最为活跃。北平失守后，“东联”疏散干部，一部分化装南下，开展内地救亡活动，并派会员到魯西北、冀中、冀南、太行、晉东北、晉西北和陝甘宁各地区以及馬占山挺进軍、石友三部十軍团工作。并有董学礼、戴福純、高鵬等人爬出城牆，董到晉西北一带組織武装与敌人作战，后陣亡于山西兴县。戴、高等去平西发动游击战，后来发展成为赵侗等率領的华北国民自卫軍，以后赵侗逃走，即由高鵬、紀亭榭、汪之的等率

領，改編為八路軍。

其次，有必要記述一筆關於東北人民在西安方面抗日復土的活動。旅陝東北民眾“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大會，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因為這次紀念大會，集中地表現了東北人民的覺悟和決心。

西安“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大會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旅陝東北民眾特假西安革命公園舉行“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大會。參加者計有東北四省旅陝同鄉，東望小學、竟存小學、東大工學院全體學生，東大西京校友會、旅陝留日同學會及東北耕武堂同學會會員共八千餘人，還有西安省立高中、一中、二中、女子師範學校、女子中學、玫瑰女中等十二個男女學校學生四千餘人。紀念大會在金錫如主持致詞後，由郭寒濤、東望小學學生林馥馨和竟存小學學生楊季英先後發言，悲壯熱烈，慷慨激昂，一致堅決要求國民黨政府早日實行抗日，收復失地。大會接着遊行，沿途散發傳單，高呼口號，行至西北“剿匪”總部時，張學良戎裝出見，在“請張副司令領導抗日”的口號聲中，當場致詞，接受了東北同胞的要求，表示了抗敵復土的最大決心。

紀念大會發表了宣言、通電、向國民黨請願書及“上副司令請願書”。在宣言上說：“五年來血淚斑斕的歷史，給與了我們最嚴厲深刻的教訓，使我們認識清楚：忍辱退讓，只能加強敵人的侵略，並不能減輕我們的痛苦；親善睦鄰，只能加速自己的滅亡，並不能緩和敵人的態度。”宣言指出：“抗敵則生，不抗敵則死。我們認定這是唯一的真理，我們也確定它作唯一的信條。”顯然可見，這是東北人民的覺悟和決心的集中表現。而他們的覺悟和決心更表現在“上副司令請願書”上面——“我們要求副司令的，是不要再信什麼‘調整’、

‘亲善’的辞令了，因为那是残暴式的骗局，我们指望它，永远不会有回家之日；也不要再作‘待机’、‘等待’的念头了，等到那天，侵略者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交还东北，反来只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铸成积重难返的错误；也不要再信‘三日亡国’、‘十日亡国’的滥调了，‘事实胜雄辩’，拿淞沪之战、长城之战的铁证，敌人并不是多末可怕的。我们拼着我们的血肉头颅，一定可以达成回家之愿。……期望副司令领导我们，早日踏上杀敌的战场，完成历史的使命，胜则披甲还乡，败则亦愿效田横五百的义死。我们的心已坚如铁石，我们的血已沸腾到顶点，愿以我们数十万颗的肉弹作副司令的武器！”这是东北人民悲壮豪迈的呼声，这是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的响彻云霄的迴响和怒吼，这是历史转折点的西安事变的雄壮前奏曲！

必须指出，东北人民这样的觉悟和决心是和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分不开的。共产党和它的地下党员在促成和提高东北人民的觉悟和决心方面，进行了耐心深入的工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东总”的成立

西安事变和它在共产党主张下的和平解决，制止了罪恶滔天的十年内战，并为实现全民抗战开辟了道路。但是，全国人民鉴于日寇侵略的紧张，民族危机的深重，因而要求实行抗战的浪潮日形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与号召下，为了推动和迎接行将到来的全民抗战，在精神和组织上必须作出准备。

一九三七年春，共产党人刘澜波、栗又文、张希尧、苏子元（当时由苏联回国，化名王俊清）四人和高崇民在北平聚议组织新的东北人民救亡团体，以适应时势的需要。嗣由刘澜波、高崇民、苏子

元与閻宝航会商于南京，当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定名为“东北救亡总会”，并决定邀请以李延祿、李杜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加入，形成为关内关外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这个组织是继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之后，抛弃了四维学会，以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东联”为中心，合东北各抗日团体而为一的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是东北人民抗日复土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继续和发展。

南京会谈作出内部决定后，复在上海由李杜、李延祿、閻宝航、刘丕光、董麟閣、孙山出名召开了旅沪东北人士二百余人的大会，公开宣布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的决议。大会并提出援助东北抗日联军、释放张学良、拥护国共合作到底、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等主张。然后，刘澜波、高崇民等返回北平，正式举行了“东总”的成立大会，时在一九三七年六月。

时隔一月，七七事变爆发，“东总”决定迁到上海，会上海抗战爆发，又迁到南京，设会址于芦蓆营；南京失守前，又迁往武汉。

“东总”的组织与领导简述如下：在常务委员会下，设有秘书长及组织、宣传、训练、联络各部，并由常务委员会推选主席团负责执行日常会务。十月六日，常委会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当时的政治情况，推定閻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杜重远、王卓然等为主席团，并确定秘书长及各部负责人：秘书长为于炳然（“东总”最初在北平成立时秘书长为栗又文），组织部为高崇民，宣传部为于毅夫、徐寿轩，训练部为刘澜波，联络部为王化一、陈先舟；并决定关外工作由閻宝航负责，于毅夫负责主编“东总”的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广大东北人民的言论核心。

“东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共产党人不得不以无党无派的面目出现，有的同志如刘澜波、于毅夫等都不作“头面”人物，而实际上负责领导。当时为了求得掩护，避免打击，不得不利用名存实亡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不得不在复兴社和 CC 的矛盾中间求存在。于是决定由高崇民、王化一出面与复兴社的军统局头子戴笠接洽，说明东北人民成立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的必要，和中央（意思是指戴笠）便于领导等等理由。戴笠于犹疑之后表示首肯，并允每月补助五百元，当即交付二千元作为四个月的开支。此即“东总”与戴笠发生关系的开始。

“东总”在武汉时期的活动，除组织与训练工作外，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在东北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进行抗日宣传与捐款慰劳前方将士及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保卫大武汉、反对投降妥协的各种活动；输送干部，组织敌后武装。“东总”全体成员以及家属无不精神振奋，踊跃参加。

在这期间，有几件事可叙述如下：

“新生活干部训练班”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阎宝航以筹备迁移“新运总会”名义到武汉，遂与“东总”负责同志商定以“新运总会”名义开办一训练班，名为“新生活干部训练班”，班址即设于武昌明月桥“东总”的会址内，选收热心抗日救国、思想进步的青年百余人进行训练。训练内容，主要为动员组织民众，坚持抗战到底及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邀请爱国进步人士来班讲演，刘澜波、于毅夫和聶鹤亭等共产党人，均曾给训练班作过报告。训练结束时，适值“新运总会”总干事黄仁霖由南京来到汉口（西安事变后，阎宝航坚请辞却新运总

会书记职,蒋介石乃任黄仁霖为“新运总会”总干事,留閻任副总干事)。黄对训练班的实质似乎有所察觉,对閻宝航说:“这个训练班的学生,我們都不要,由你自己安排好了,所有开支又不用报销了。”于是,“东总”负责同志共同决定把这批“新生活干部”分别派遣到某些战区工作,并介绍一部分学生到陶铸同志和李范一先生举办的湯池合作社去。閻宝航也就从此时脱离了“新运总会”。

东北中学的斗争

东北中学于一九三一年創設于北平,一九三四年受日、蔣双方压迫,南迁到豫鄂交界的鸡公山。一九三六年秋,王化一辞校长职,孙一民继任校长,馬献图为教务主任。校中备有輕重机枪和械弹,为学生軍訓之用。学校师生中有国民党及复兴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經常进行斗争,但在共产党地下党员如王铁良(即王一夫)、馬献图等领导和影响下,进步势力漸占上风。“东总”以这个学校为培养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的园地,而国民党則视为眼中釘,几年来一直在鼓动风潮,企图搶夺。

西安事变后,十二月下旬,何成濬即派军队来山,围校繳械,封鎖学校,不准师生出入;同时,国民党財政部停发学校補助費。是年除夕,刘峙派清剿队一营人包围学校至次日一整天,特务队长持黑名单,咆哮索人。因学校早有布置,一些进步师生未遭逮捕。

一九三七年四月,国民党湖北教育厅厅长 CC 分子周天放派赵雨时来校,强行接收,被学校师生拒絕,于是,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当赵雨时来校时,学校閉門不納,并高唱“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紀念九一八”、“遙忆松花江”及“黑水白山”等歌詞为赵雨

时“招魂”。赵雨时不得其門而入，乃租一飯店，在門前懸掛一“东北中学临时办事处”招牌。学生怒不可遏，拥至門前，将招牌摘下。赵雨时老羞成怒，从屋內开枪，学生并无一人受伤，而他自己带来的一个狗腿子李某却被打死。

在东北中学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同时，“东总”决定由閻宝航、杜重远、王化一代表校董会向国民党教育部进行交涉，并抗議湖北教育厅向私立学校強派校长、摧殘教育的非法行为。斗争持續有半年之久，后因学校原存粮煤、食用殆尽，而大敌当前，武汉垂危，长此下去，无大意义，因而在校董与师生共同商議下，結束了这一場斗争。大部分进步师生前往西北和华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走向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及一部分落后师生則随着被搶夺过去的东北中学流亡入川。

在动员民众問題上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惧怕人民，敌視共产党，更怕共产党把民众动员、組織起来，下述一事，提供了最确切的証明：一九三八年，以陈誠为首的总政治部成立后，閻宝航被聘为設計委員。康泽任总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邀閻宝航参加拟訂計劃，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有的所謂組訓民众办法作为藍本，进行研究。某日，戴笠設席邀宴东北人士，被邀者有王卓然、王化一、吳瀚涛、田雨时及閻宝航等人。席間，閻宝航談及如何动员民众問題，并指出康泽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旧办法来拟訂动员民众計劃，除了取締限制外，还是限制取締，这与今天需要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逢迎討好、意图升官的吳瀚涛馬上接过去說：“我們今天不能再来个双十二，张学良已經鑄过大

錯，我們不能再鑄個大錯，一切都應听从中央”云云。經吳火上加油，戴笠勃然色變，對閻說：“你這話是為共產黨開路。老實說，共產黨是壯漢子，我們是病漢子，我們不能跟他賽跑，不但不能跟他賽跑，還得拉着他後腿，不讓他跑。”閻寶航說：“今天是為了抗戰，必須動員民眾，愚見如此，僅供參考。”宴後，戴笠委婉其辭地說：“玉衡兄，你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言論有影響，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仔細談談，你好好了解我們的政策。”看來，戴笠還算一個說“老實話”的人。

CC派對“東總”的誣陷案

戴笠既奉蔣介石的命令，監視“東總”，同時他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比重，並張揚復興社與CC派對抗的聲勢，也樂於和“東總”接近。而CC派則一貫地對“東總”進行打擊，亦以之來對抗復興社。下述誣陷案即為一例。

在“東總”積極動員流亡關內的東北人民參加抗戰的時候，國民黨CC派的東北籍囉嚨們除發行《東北月刊》、《東北論壇》等反動刊物，高唱反蘇、反共、反人民的謬論，以與“東總”主編的以宣傳共產黨的政策為內容的《反攻》唱對台戲外。東北CC派特務頭子齊世英經常派人窺伺“東總”的活動，刺探消息，企圖破壞。常來“東總”窺視刺探並曾被“東總”同志痛打過的韓韜，捏造了一個驚人的密報，說“東北救亡總會與共產黨勾結，聯合武漢工人，準備在武漢危急時，奪取漢陽兵工廠武器，舉行暴動，劫殺蔣委員長”。他還假刻印章，偽造了一個有“東總”負責人簽名、各部蓋印的“會議紀錄”和“暴動計劃”。這個密報是由韓韜交由東北CC派頭子齊世英轉交陳立夫而上呈蔣介石，企圖把“東總”負責同志一網打盡。

五月十五日，戴笠突然派人找王化一，說有急事請即去。戴見王時說：“化一兄，我們要相見以誠。多久以來，有人屢次給委員長寫報告，說東北救亡總會是共产党的外圍組織，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負責同志的話，總說你們是個抗日救亡組織，多數人是四維學會的成員，因為老家沒有了，說話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關組織。現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騙了領袖。”王化一摸不着頭腦，答道：“雨衣兄，請相信我們。”戴笠搶着說：“我過去最相信張副司令，對他從來未加過小心，但是他卻搞出了西安事變。今天我不是凭空說話，請你看看証據”，說着，他從保險櫃里取出一份卷宗，里边夾着兩份文件，并附一張簽呈，內容是根據齊世英送來的報告，說東北救亡總會“受共产党的指示，乘委座在漢之際，勾結武漢外圍‘赤匪’，定期暴動，……茲呈上該會會議記錄、暴動計劃各一份，請核示”云云，蔣介石在上面批了“嚴辦”兩個大字。王化一開始心情有點不安，略為翻閱以後，轉而鎮靜。他一邊看，一邊用沉着堅定的語氣說：“這完全是偽造的，根本沒這回事。”戴笠說：“你有什么反証？”王說：“我首先提出幾點很顯然的破綻：第一點，記錄上羅列了全體委員的名字，但是目前在武漢的委員還不足半數，有人去西安，還有人去上海的，按開會日期說，他們怎能出席，又怎能簽字呢？又看簽的字，有的還有些象，有的根本不象，從筆迹和墨色看來，簽字和記錄都是出于一個人的手筆。第二點，在會議記錄後半段有各部給工作人員發出的動員指示，每部都蓋有部的圖章和部長的名章，這很明显是不對頭的，什么會議也沒有在記錄上蓋章的。第三點，報告上說東總和共产党武漢工人勾結，企圖奪取漢陽兵工廠武器，響應外圍進攻，劫殺委員長等，是整個捏造，不攻自破的。”

其实，戴笠已经看出这个密报有疑问，他知道CC派和“东总”的对立，在蒋介石面前他又常为“东总”辩解。这时他听了王化一的解释后，就先送一个人情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局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然后又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实的反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下，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戴笠大概是下定决心，要借这个诬陷案来拉着“东总”反击CC派。

王化一回到“东总”后，经过大家的研究，先由在武汉的同志们每个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一并送给戴笠。戴笠把这些签字和印章找中央银行一位印鉴专家加以核对，当然相差很多，其中惟训练部部章很相似，那是偷扯下训练部的布告，照布告上的印章仿刻的，但专家一望便知。戴笠又派人了解，“东总”确实有些人不在武汉。

这时，武汉几乎天天有敌机扰乱轰炸。戴笠有了把握，便借口防止汉奸，检查户口，对机关团体也作重点检查，密令稽查处处长赵士瑞率人到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韩韬寓所突然进行检查，搜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这时在武汉街头有人散发了一些传单和“暴动计划”，内容大致和韩韬伪造的文件一样，这就更证明了是谁在制造这件诬陷案。

戴笠拿到这一件法宝，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介石阅后又批交陈立夫、徐恩曾彻查。

东北救亡总会就是这样在复兴社与CC派矛盾的中間得以存在，一直延續到皖南事变的反共高潮中复兴社与CC派合謀进攻而被取消时为止。

戴笠是不是因为查明了这个诬陷案，就对“东总”放了心呢？不

是的。在一个月以后(八月二十八日),武汉市警察局突然派来大批警察检查“东总”,什么也没有检查着。事后戴笠系统的人說,这是CC分子的报复行动,其实是戴笠干的,武汉市警察局长方超就是“軍統”的人。这証明戴笠对“东总”并不放心。与此同时,康泽对閻宝航也提出警告說:“关于你的情报很多,我还不相信,但不要和共产党人多接近”云云。“东总”由此提高警惕,化整为零,分散各地:刘澜波、张希尧去延安,高崇民、陈先舟赴西安,于炳然随李杜赴广西轉四川,閻宝航、于毅夫赴四川。武汉只留王化一率一部分工作人員应付門面。这时距武汉撤守已为时不远了。

反共高潮时的“东总”

“东总”在武汉撤守之前迁到重庆,会址設于重庆市領事巷。經常主持会务的有于毅夫、閻宝航、于炳然等,还有徐仲航、卢广声、李羽軍等少数工作人員。由于精簡机构人員,縮小活动范围,这时的“东总”似較在武汉活跃一时的“东总”表面上稍为逊色,但实际上,“东总”負責同志及少数工作人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傾全力于地下工作,并且积极参加支持許多民主团体的活动,工作更为紧张而繁重。

复兴社和CC派合力向“东总”进攻

在皖南事变后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复兴社与CC派已由对內的矛盾轉而为对外的一致,一向拉攏“东总”以对抗CC派的复兴社,这时轉而与CC派合作来打击“东总”,摧殘压迫,无所不用其极。

一九三九年秋,复兴社分子賀衷寒在洛阳軍訓會議之后,取消了“东总”在成都等地的分会,进而指使駐西安宪兵团压迫西安的

“东总”分会，逮捕董昆一、于葦、段永杰諸同志，当时虽經高崇民、陈先舟利用与 CC 派王德溥的私人关系，出而与复兴社抵抗了一下，但仅使被捕諸同志获释，而西安分会終于被取消。与此同时，CC 派則不断压迫車向忱主办的东北竞存中学，检查学校，逮捕师生，教員王揚、滕靖东等不得不在校潛走重庆。

一九四一年春，“东总”会員李华春（共产党员）在“西北工合”駐南郑分所工作时，被汉中警备司令祝紹周誘捕，秘密活埋。一九四二年夏，徐仲航、李羽軍等被中統局重庆区分部逮捕，押入軍統局的江北宪兵監獄，酷刑审讯，受尽折磨，李羽軍因受摧殘过重，病死于獄中。徐靖远由重庆返河南防地时，被軍統局謀害，将其溺死于黄河。韓乐然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員身份，而被“軍統局”逮捕于西安，入獄达两年之久，始获释出。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复兴社与CC派合謀，以取消原有东北各团体、另組一个总的团体为“理由”，組織了由CC派把持的“东北抗敌协会”，阴谋扼杀“东总”。这个以“抗敌”为名而行反动之实的組織，“东总”負責人除王卓然、陈先舟以个人名义参与外，均拒絕参加。“东总”形式上虽然被迫取消，但实际上抗日救亡活动并未停止。皖南事变后，重庆一度紧张，于毅夫不得不离开重庆，行前将“东总”所出之《反攻》半月刊征得王卓然、王化一同意，分別担任总編輯和发行人名义，并函高崇民来重庆主办。高于一九四一年四月由西安到重庆，与閻宝航、陈先舟計議，仍本“东总”抗日救亡精神及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到底的統一战綫政策，克服困难，繼續出版，与东北抗敌协会出版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东北論壇》进行斗争，直至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后，于九月十八日宣告停刊。

至此，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总”，完成了它所負的历史任务。

东北軍討伐石友三的战争

于 学 忠

一九三〇年九月間，蔣介石与馮玉祥、閻錫山在中原地区大战正酣之际，张学良受蔣拉攏，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旋派兵入关，北平的国民党扩大会议因而解体。大战结束后，蔣介石命令张学良負責处理华北軍事善后事宜，所有晉軍、西北軍及石友三的軍隊，均归张学良节制整編。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石友三曾到沈阳謁見张学良，张对之頗为优遇，代为电蔣請命，并先由东北方面发给协餉五万元。当时据石友三自报，其兵力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騎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鉄甲車大队，共約六万余人，經蔣介石核定石部每月軍餉六十万元，由张学良轉发。以后石仍感觉不足，要求增加，张又为之增加十万元。这时石友三在平汉綫鉄路扣有車皮十六列，不肯交还，迭經南京鉄道部电請张学良促令交还。张向石友三一再劝說，石始交还車皮十列，尙扣六列未交。石友三在沈阳期間，曾請张学良选派秘书一人，为其第十三路总指揮部的秘书长。张乃派石友三的吉林同乡并与之早有交誼的张云責到十三路充任秘书长。不久，石友三将回关内防地，向张学良辞行，张对他說，“再住两天吧”，而石竟多疑，当时即向別人說，“是否张副司令要扣留我？”其猜疑成性，于此可見一斑。

石友三自沈阳領走第一次軍餉，回至关内，即以現洋十三万

元,在天津日租界购买楼房一所,这时,石友三即与日人暗中有所勾结。一九三一年四月間,石友三部即有不稳的消息。石在其防区附近,大事挖掘沟壕,而对人却解释說,“本軍修筑沟壕系为防御水患,以兵代工,外間传言,乃系不明真相”,并派其参謀长唐邦植、駐平办事处长毕广垣謁見张学良,声明绝对拥护“中央”,服从东北。张学良当时告以“东北軍矢志和平,汉章(石友三字)諒所深悉,如有存心破坏和平者,实为天下公敌,外間謠传,固不足信,惟望汉章深体余意而行”。五月間,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組織国民政府,傳聞曾委石友三为第五集团軍总司令,兼該集团軍政治委员会委員长职务,并由邹魯汇寄五十万元,石曾要求再汇一百万元。是月二十八日,张学良患伤寒病入协和医院治疗,不能亲理公务,石友三竟于是时乘机阴谋叛变。

先是,张学良的副司令行营中,有一职员名蔣宗标,专擅繙譯各种电报密碼,在六月中曾截得石友三致张学成的密电一件(张学成系张学良的叔伯弟兄,素有野心),大意謂:“弟部即将进攻平津,后图东北,希兄即与日方切取联系”等語。副司令行营据报后,即由参謀长戢翼翹与万福麟、王树常、鮑文樾、王树翰和我共同商量,于六月二十八日由东北抽調步兵三个旅、炮兵一个旅(計为孙德荃的第十九旅、王永盛的第廿九旅、于兆麟的第三十旅及王和华的炮兵旅)分駐平津,以固防务,并布告周知,以安人心。七月初,石部不稳的传言更为滋盛,我乃与戢翼翹等商議,由我以平津卫戍司令的名义,到順德检閱白凤翔的騎兵旅,就便看看石友三的动态(那时石友三部与白凤翔旅均駐在順德)。我到白凤翔旅检閱完毕时,即密告白凤翔,“石部如有行动,你可稍与接触,即沿平汉綫节节撤退,务須引其追赶,不与脱离,以便我方集中兵力,与之决战”,以

免兵力分散，为其各个击破。及至我到石的防地，石对我表示甚为欢迎，但我看出张云贵偈促不安，面带忧容，且不敢和我谈话，我即料知石部确有不稳的企图。

回平后，我在行营会议上分析，石友三部定要妄动，而动必失败，因为：第一，石部没有根据地，只占六列火车，不能离开铁路线，我们如以少数的部队与之接触，不让他往津浦线转移，以逸待劳，诱其深入，即可将其消灭。第二，石友三鸦片烟瘾很大，常识不足，极端腐化，并对于东北军存有轻视之意，骄敌者必败。第三，表面上看来，好象石善于练兵，士兵的体质亦较强，但石不注意士兵的生活，向不正式发饷，兵有贰心（我到顺德时会应石之请，在他那里住了两天，看看他的军队，当时石的部队往往半夜练兵，天天从车站来回开动，有对我示威之意，我看见他的兵都穿得很破烂，有些兵穿的鞋是用麻绳捆着的）。第四，石的为人性极反复，轻举妄动，用兵也好轻进轻退，一切都贪，不能持久，利于速战，我如沉着应付，必可将其击溃。我回平以后，石友三的驻平办事处长毕广垣曾持石的信前来看我，信中诉说石部的饷项不足，很发牢骚。我曾托毕给石友三带去复信，劝他要为整个大局着想，处事要冷静。旋接石的回信表示，“我绝对听从大哥的话”，言甘而简，显非真诚，其决心叛乱，殆难遏止。不久，石友三活埋其秘书长张云贵的消息传到北平，白凤翔旅长亦有报告。七月十五日，又接到石友三又在平汉线顺德一带扣留火车的情报。十八日下午，据报石部忽将北平、郑州间经过顺德的一段电报电话线擅行割断，并据传言，石友三已于当日在顺德就任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石部于十九日拂晓北犯，白凤翔旅于两小时前撤出顺德，在内邱以南与石部的前卫稍有接触，即按照我的授意，节节后退，但不与

石部脱离。这天,副司令行营召集紧急会议,出席者为戢翼翹、万福麟、王树常、王树翰、鲍文樾及我等人,由戢翼翹报告石友三叛变的各种情报,并讨论应变方针。王树常当时微露撤退关外之意,他说:“我们退守关外,尚可自立。”我当时力主不可,我说,“我东北号称数十万的大军,若为石友三的一小撮队伍逼出关外,东北军的威望从此扫地;即能退出关外,亦将为日人所轻视,此后对外更难应付。据我们的估计,石友三一定先图袭取北平,并力求速战,我可率领一部队在平汉线堵击之,并将其部队引过滹沱河稍远一点,在保定、望都之间,方顺桥以南,与之决战,当可将其击溃。”大家同意我的主张,乃由副司令行营发表我为第一集团军司令,统辖陈贯群第十四旅、杜继武第十八旅、李振唐第十三旅、董英斌第十一旅、白凤翔骑兵第六旅及乔方炮兵团,负平汉线作战之责;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统辖丁喜春第八旅、黄师嶽第十七旅、常经武第二十旅、姚东藩第十五旅、李福和骑兵第五旅及王致中炮兵团,负津浦线作战之责。我即于二十一日赴保定督师。这时张学良副司令病势仍重,一切军事行动,都未让其知悉,我赴保定那天,到医院去看他,还故意穿着便衣,表示外面平静,无何事端。二十二日,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谓,“石友三图谋不轨,竟敢破坏我‘剿赤’垂成之举,万难宽容,请即日提会讨论,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所有第十三路部队,归韩复榘节制”等语。南京国民政府于二十四日下令拿办石友三。当时南方的将领由刘峙领銜,北方的将领由张作相领銜,分别通电共同讨石,张学良亦以副司令名义电致华北各将领,谴责石友三。讨伐石友三的战事,乃正式开始。

石友三北犯的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为先鋒,沈克、唐邦植及石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后。当时石的兵力约有五万六千余人,留

有一个旅駐守順德。我方白凤翔旅逐步誘石深入，將石部引至石家庄地帶。当时我軍杜繼武旅駐在石家庄，我令其不得出击。当我方再由石家庄轉移时，蔣介石曾有电报謂，“石家庄系軍事要冲，不宜放弃”，但我軍为了执行既定的战略，仍由石家庄轉移陣地，將石部引过滹沱河，直至保定、望都之綫，并在方順桥以南严陣以待。石友三因利于速战，自二十七日与我軍开火后，即以最大的兵力攻我中央防綫。二十九日，我軍中央地区被其突破，敌約有三万余人进入大冉，距保定仅二十五里。我軍左右两翼坚定不动，我一面命董英斌旅堵住中央缺口，一面令白凤翔騎兵旅在敌軍右翼安国、博野一带，故作疑兵，尽力作大区域的活动，每天更換番号，主要的目的，是不让石部向东轉移。石部在大冉进入我軍的口袋陣以后，与我軍相持三天。我命令炮兵只向大冉的村外发炮，不打村内，因恐波及人民，損害太大，并防止石部逃出村外，不便包围。石友三因攻我三日未动，即令沈克师由完县迂迴。我們认为沈克并非軍人出身，油滑成性，不諳軍事，况且他們的力量业已分散，絕不敢孤軍深入。我軍乃又用疑兵之計，故意在完县一带的村庄大号房子，贴上我軍各部队占用的条子。沈克果然中計，疑为我軍又行增援，因而未敢有所活动。石友三見攻我不动，沈克的迂迴又未成功，而我王树常集团軍对其右翼的压迫，这时已很为接近，同时南路刘峙的胡宗南师又已将其留守順德的一个旅解决，形势十分不利，乃突于三十一日下午，向我假作攻击的姿态，企图退却，枪声很急，而实际并未进攻。我一聞此种枪声，即判断其夜間必将退却，决无再战之意。这时北平的人心甚为恐慌，我即用电话告知行营參謀长戡翼翹，“石軍突然枪声很急，判断其今夜将要撤退，一定系經過临城、德州之綫，向山东方向撤退，敌人定准是失敗啦，請北平放心。”我

一面部署我的全部軍隊，仍用原隊形于拂曉攻擊，一面通知南路的劉峙軍及我方的第二集團軍速到滹沱河以南向山東的方向準備截擊。石友三部于三十一日的夜間，果然全軍退却，我軍立即追擊。這時第二集團軍的黃師岳旅和常經武旅，都已由東向滹沱河推進，而李福和的騎兵旅更先行到達深澤以東，南路劉峙的胡宗南師亦星夜趕到深澤以南，我軍追過滹沱河，亦到達深澤。石軍潰退至滹沱河時，正值河水暴漲，行動維艱，渡河以後，萬分狼狽，已無戰鬥的能力。各軍即在滹沱河以南、深澤所屬的地區，分別將其繳械甚多。石友三本人及唐邦植，僅率三千人逃赴山東，依附韓復榘。石部師長米文和、孫光前被俘；沈克向我軍投降，請求收編。石部的潰兵竄至山東境內時，副司令行營令韓復榘負責收容，韓曾委派程希賢為收容主任，所有第十三路軍的原建制，至此解体。

這次討伐石友三之役，雖為時甚短，前後不及半月，而對於東北方面的影響極大。由於石友三之變，張學良將留在關外看家的大部分東北軍調入關內，軍火械彈亦運至關內甚夥，致使東北地方防務空虛，為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造成了便利條件。

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

王家楨

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軍閥用野蛮手段炸死张作霖，原来是想造成混乱局势，混水摸鱼，乘机进占东北，但是結果沒有达到目的。于是它就改变策略，用拉攏的手段来鼓动张学良，阴谋誘使东北集团維持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宰割中国的阴谋。在张作霖被炸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的时候，日本政府特派林权助为弔唁专使来沈阳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日本派这样一个人物来作弔唁专使，实际上就是以实现这个阴谋为目的的。

日本駐沈阳的总領事林久治郎把这个消息通知我們后，我即和他商量招待林权助的日程。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所应酬，所以在我們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在日本总領事館設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张学良和我，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宴后举行会談，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河野領事，还有另一个日本領事（我記不清是什么名字了），由我一个人任翻譯。

林权助在这次会谈中正式提出了阻挠东北易帜的问题。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是承日本内閣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自己的论点争论起来。争论到了顶点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划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我也照着林久治郎的语气,大声翻译给张学良说:“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不准你挂旗。”张学良听了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了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的地位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

支持你。”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有来往。”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这次会谈连同吃饭时间在内，共历四个多小时，夜十时半始散，临散时新闻记者曾摄影数幅（我还保存一份）。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三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系以讹传讹的谣言。

二

张作霖出殯后不久，林久治郎总领事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饯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由陶尚铭任翻译，我在场作陪。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我们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发展，那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起见，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倘若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的话。”张学良听了这些话，没加思索，就连声答应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我急忙从旁插嘴说：“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总领事也没答复我的话，张学良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和林总领事说的是日本话。

林总领事走后已经很晚了，我就跟着张学良到他的卧室，和他谈：“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找的麻烦可不小。他想拿一根针来换你的一头牛，你怎么能随便答应他呢？他回国向日本内閣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我告诉他说：“林总领事所说的取消

領事裁判權，是在東北內地根本不存在的領事裁判權。因為日本人在東北內地或非商埠地的商租權問題沒有解決，他們絕對租不到房子，所以他們就不能、同時條約也不允許他們在內地居住。沒有日本人居住的內地，那來的領事裁判權呢？倘若你允許他們有內地居住權，他們就可以買地押地，依仗日本政府的勢力，那還得了！他若是將租界、附屬地、商埠地的領事裁判權取消的話，那自然是可以答應的。”張學良說：“那怎麼辦呢？我答應他的話也說出來了。”我建議請他寫封親筆信，就說今晚談話很重要，唯恐翻譯有差錯，所以將談話扼要告訴他，以免誤會。張學良同意這個意見，並叫我立即起草底稿，我就在他的臥室外屋將稿擬好。這時已近午夜，我敲門請他出來親筆書寫，叩門很久，沒有應聲。我正疑惑間，張夫人于鳳至出來說：“他疲倦極了，有事明天再說吧。”我說：“不行，明早林總領事就走了，今晚非將這信寫好不可。”張學良那個時候身體非常不好，還是勉強將信寫好交給我。我拿信回家，已過午夜。次早我即將信交與林久治郎，並陪他上車站送行。林久治郎和我說：“翻譯並沒有錯誤，因為我們河野領事聽得很清楚。不過這事也很關重要，張學良將軍既然有親筆信，我們只有以信為凭了。”並笑着對我說：“等我回來，咱們好好談談，我們對閣下的意見非特別重視不可。”

當天下午，張學良即用火急電話召見我，見面頭一句話就問我將他的親筆信拿回來了沒有。我將林總領事的談話詳情報告給他，他還是叫我将他的親筆信要回。我問他是对信的内容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返悔不該寫這封信，他說，全不是，就是不愿意將親筆信留給日本人。我只得打電報到朝鮮漢城車站投交林總領事，請他將信閱畢擲還。林久治郎當即回電說，俟到東京，信用畢後即郵

还。我将林的电报拿給张学良看，他一笑就了事。那个时候，我們全是年青人，因为我逼他午夜写信，他就給我出出难题，叫我出点冷汗，追忆往事，感慨系之。从此以后，他每逢会见重要的外国人，会后常常問我：“我今天說的話，有什么錯的地方沒有？”我也每次都是忠心耿耿地竭誠以对。

三

在东北尚未正式掛起青天白日旗前，日本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典，各国都派遣专使前往祝賀，东北政权当然不能例外，所以张学良就派莫德惠和我为正副专使前往祝賀。我們帶了貴重礼品，偕同秘书蔡公智、科长安祥逕赴东京，在东京与各方酬应了一个礼拜，然后到京都正式参加典礼，因为典礼是在京都举行的。原来明治迁都东京时，曾亲自允許京都作为陪都，并且規定国家大典必須在京都举行。我們一行在东京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隆重招待，特别是滿鉄對我們的招待更是无微不至。那时我国駐日公使汪榮宝和我們虽然有来往，可是日本人对他却甚冷淡，例如大臣們請我們吃飯，从不請汪公使参加。

我們在东京的时候，日本外务省就和我們約定說，內閣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希望在京都和我們举行一次悬談。我們到了京都第二天，晚上六时田中义一邀莫德惠和我在他的官邸便餐会谈。会谈只有我們三人，因为莫德惠不懂日本話，并且他要我不必當場翻譯，事后告知他即可，所以实际上就是我和田中义一两个人的对談。我們的談話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具体的鐵路交涉，談到日本和东北的政治关系，以及国际局势、张学良將軍的地位等等，談了四个多鐘头。詳細內容我当然不能全部記憶，但是关于談話的重点，

因为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事隔三十余年,还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例如:关于东北的地位与张学良将军的前途问题,田中说了很长一段话企图说服我。他说:“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张将军掌握政权以来,也很得到你们这帮人的辅助,政绩日见兴盛,真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了。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将军的雄图壮志怎么样?张将军还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张将军能够发抒宏伟志,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且我可负全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他的这种事业。当然啦,张将军也许会說,我受日本政府支持的事业,我们的老百姓是不会赞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转告张将军請他放心,我们绝不叫他为难,我们绝不向他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我插一句话問他所指的这些权益是什么,他说:“比如說,在南满铁路公司里,我們可以設几个中国理事,”同时他着重說:“当然,这是随便举的例子。”接着他又說:“王先生,你呢?你是一个年青有識、大有前途的政治家,你不愿意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当一个开国元勳嗎?难道你就心安理得地永远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嗎?”他还說了好些和解的、和两国应该如何亲善的话,但是同时他也作了不少威胁性质的暗示,例如他說:“我们大和民族是优秀而有志的民族,为了日满伟大前途,我衷心希望张学良将军能当机立断,深謀远慮,为自己前途着想。至于我们日本,不管事态怎样演变,我们的政策是鋼鉄般的坚定不移的!”

我对他也談了差不多同等数量和同等分量的話。我当时的心情，是爱国思想占了主宰，对他的誘惑絲毫沒有动心，对他的威胁也沒感到可怕。只是他所表示的日本愿与东北謀求亲善的話，倘能得到实现，倒是我心向往之的事，因为那样我們才有机会能将自己家里的事弄好。所以我向他說：“感謝閣下的开誠見教，我必将閣下的全部談話无錯誤地告知张学良將軍。我現在将我个人的意見也毫无隱諱地向閣下陈述，請指教。”我說：“国家与国家交朋友，也和个人与个人交朋友一样，真正的朋友只有互相关怀彼此的利益，才能成为良友，尽管两个朋友各自的賢愚不同，地位不同。否則不管怎样叫嚷亲善，也是事与愿违，不能以心相見的。”接着我将日本人近年来在东北的橫行霸道情况，举出許多实例，內中也有影射他們謀杀张作霖的事痛說一番后，又說：“我相信日本有識之士和制定国策的首脑人物，当然不会贊成这种举动的。至于我們这一方面，是双手高举，贊成閣下所号召的真誠亲善关系，因为我們是弱者，在一切方面都比日本落后。只要日本真誠和我們要好，我們那有不欢迎的道理呢！不过，中国人的爱国思想也和日本人一样，是根深蒂固的，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忽視；誰若忽視了这一点，誰就一定碰釘子。”为了扭轉日本侵略中国的矛头，接着我对田中义一进行了反对白色人种的煽动。我說：“我們中日两国都是人口稠密、經濟不算富裕、身受白种人欺侮的国家，日本虽然比我們強，但是美国移民法案对待日本人还不是和对待中国人一样嗎？象澳洲整个一洲，地广人稀，可是被白种人霸占着，不准有色人种插足。南洋那样物产丰富的地方，完全由白种人統治。你們日本人是有色人种的独起之秀，倘若你們振臂高呼，領導我們向白种人算賬，重新分配世界，誰还能不心悅誠服，唯你們的馬首是瞻呢？但是不

幸的是，你們島國的陸軍將目光完全注視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国土上(日本陸軍大學學生學中國話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學俄語的次之，其餘學英、法等國語言的極少，田中本人是學俄語的)，所以白人睹此，自然暗中拍手，作會心之笑了。”

我說這些話的時候，田中好象是有点动容。我們談到十時半左右，雙方的話還沒有談透，忽然田中叫人拿葡萄酒來，他大喝一杯，不多時，就打个招呼離席而去。隨即由佐藤少將出來陪我們談了片刻，并問田中離席前的情況。我告訴他說，田中喝了一杯葡萄酒，就匆匆離席。於是佐藤再入內室出來告知我們說：“總理大臣感覺不適，總理大臣說，日內再邀談。”我們也就告辭了。次日果然報載田中總理大臣患窄心病，暫時不能親理政務。當日日本外務省通知我們說，總理大臣暫時取消一切約會，我們從此再也沒見過田中這個人了。

我們參加的日本天皇即位典禮，把我們帶到我國唐朝時代的氣氛中去了。天皇穿的禮服是中國唐朝的服式，奏的樂是唐樂，跳的舞是唐人舞。國宴也是席地而坐，每人面前用一塊白緞子鋪地，擺一張小桌子，一切食具全是特制的，帶有皇室菊紋徽，餐畢各人可以用白緞子將小桌及一切餐具包好帶走。這一切帶有皇室菊紋徽的東西，在日本人眼中全是聖物。

我們回到東京，莫德惠先行回國，我又在日本滯留一個時期。在這期間，我參加了几次當時覺得很得意、現在想來令人出冷汗的集會：一次是工業俱樂部請我吃午飯，叫我即席演說，我作了一次鼓勁性的演說，大談中日聯合起來向白種人算賬、重新分配世界資源的問題。因為當時正是日本對美國移民法案排斥有色人種特別感到憤慨的時候，所以我的演說很得到與會者的贊許。日本突

业界巨头澁泽子爵当晚請我吃飯，出妻見子，特別表示隆重。另一次是日本財經界主腦人物組成的俱樂部“交詢社”（社員主要是庆应大学出身的，会費很貴，資格限制很严）請我吃飯，并介紹我为該社免費社員。主席鎌田榮吉是当时的文部大臣，也是以前我在庆应大学讀書时候的庆应大学校长。他介紹我为該社社員时說：“我們很荣幸，接受第一个中国名士作为我們社的社員，同时我想王先生也应该很高兴。以大正年代的庆应毕业生的少壮年华，得为本社社員的，王先生还是第一人。”此外我还参加过一次东京帝大新人会的左翼作家小聚会（現在我还保存这张紀念照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是暂时采用拉攏的手法，企图以拉攏的手法把东北变成它的“滿洲国”，所以对我这样帮助张学良办对日外交的人，也极尽拉攏的能事，他們的用心可以想見。

我在东北帮助张学良办理对日外交时期，共去日本三次，这是第一次，共滯留一个多月。在这期間，我已知道东北已經易帜了。等我回到沈阳，作为国民党政权标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国旗，已經到处飄揚了。

一九六〇年四月于北京

清末东三省綠林各帮之产生、 分化及其結局*

宁 武

一、綠林各帮概况

东北三省从清朝末年以來，就以产生土匪著聞。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它是甲午、庚子两次战乱的产物，是清朝反动統治黑暗腐敗、对人民殘酷压迫和剝削的产物。它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对于东北的侵略和荼毒所造成的結果，并非由于东三省人性喜为匪，更非由于东北这块土地适于产生土匪。关于这一点，我們應該有足够的認識，唯有这样，才便于进一步說明清末东北的土匪問題。

东三省的土匪多数是騎馬的，所以又叫馬胡子，它有反对反动統治政权的一面，但也有危害社会秩序、破坏生产力的一面。因此，我們对这些人要进行具体分析，方能得出比較正确的了解。

清末东北的綠林，主要产生于甲午、庚子以迄甲辰这十年之間。其所盘踞的地区，基本上在辽河下游一带及辽西各县，也就是

* 本文作者最近写成“老殘回忆录”一稿，写出他自己从甲午战争以來六十多年来亲自经历和見聞，全文共二十多万字，是一部帶文艺性的記述。本文是其中的一段，經征得作者同意先在本輯发表。文中插題是編者加的，文字也經編者作了一些修改。

甲午、庚子以及甲辰各次战乱的受害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兵灾之后,地方糜烂,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社会上呈现极度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游手好闲的青壮年就要挺而走险,这是很自然的。同时,战后的一些散兵游勇,流散到社会上,无所事事,也是产生胡匪的一大来源。于是就有别具野心的不逞之徒,利用这种机会,竖起綠林的旗号,嘯聚徒众,称霸一方,儼然形成了独立王国,为所欲为,莫可誰何。这就是东北各帮胡匪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以后軍閥割踞关东、称王称霸的历史根源。

据老殘回忆,当时各匪众主要分为以下几帮:

1. 趁火打劫,混水摸魚的馮麟閣:馮是海城县的衙役出身,为人貪殘狠毒,利欲熏心,他看到社会动荡不安,认为有机可乘,就趁火打劫,混水摸魚。为了欺騙羣众,籠絡人心,他也仿照义士赵志刚^①之所为,打起杀富济貧的幌子,糾合地方上的流氓賭棍、散兵游勇等在盘山县的田庄台、辽中、台安、錦州、彰武一带橫行霸道,搶劫淫掠,为害一方。解放后为我人民政府鎮压的大汉奸张海鵬和曾当过綏远都統的汲金純,都是他得力的助手。他的徒众經常有百八十人出沒各地,最多时能嘯聚到几千人。

2. 驕橫強悍、独树一帜的杜立山:杜是辽中县人,家境貧困,为

^① 編者注:据“老殘回忆录”关于“义士赵志刚”的一段中所述,甲午战争后,牛庄有一鉄匠赵志刚,为人有胆識,好打不平,深得貧苦羣众爱戴,称之为赵义士。当地范姓惡霸地主逼令佃农白老头将其女菊花押为侍女,引起羣众公憤。某夜赵偵知范姓夫妇毒打菊花,乃越墙而入,救出菊花,并将惡霸击毙,隨即約集貧苦羣众数十人組織穷人队,赵自率青壮年杀官济貧,为穷人报仇;老弱妇孺则由白老头率領,到处吃大家,声势頗为浩大。后赵經作者本人介紹加入同盟会,表現很勇敢,辛亥革命时,不幸因被部下出卖而牺牲。

人豪爽。据说，他有八个老婆，都非常剽悍，杜和他的老婆都能骑马打枪，百发百中。他在辽中县威信很好，能纠合徒众千余人，枪马具全，自立一帮。杜在各匪首中是最年幼的一个，但他的势力最大，声威最盛。伪满有名的汉奸于芷山，原来就是他手下的健将。

3. 具有政治野心的张作霖：张本是宋庆所部毅军的一个骑兵小头目，跟兽医官学了些兽医知识，退伍后回海城县高坎村开一小兽医庄。他因经常给各匪帮医马疾，因而同各匪帮都有所接触，到后来社会上都说张作霖是匪徒的窝主，所以也就迫使他走上了绿林的道路。当时张的势力，同其他各匪帮比较起来，还是很薄弱的，他的徒众最多不过数百人。但张有几个助手都很强悍，如曾经毒害热河老百姓的热河都统汤玉麟（绰号汤二虎），曾当过察哈尔都统和伪满内閣总理的张景惠和曾作过吉林督军的张作相等都是张作霖的得力助手。汤玉麟在捕盗营当兵，原是个赌棍出身，为了闖光棍，他用烧红的铁通条烫自己的肋骨，眉头不皱，谈笑自若；张景惠原是个豆腐匠出身，后拉起一小帮；张作相是泥瓦匠出身，在锦州也拉起一小帮。后来他们都投到张作霖的旗帜之下，入了大帮。张作霖在帮中本来是后起，他的势力所以扩展得那样快，和他手下这三员健将是直接关系的。

4. 扒贼作父、卖国求荣的金万福：金原是小站北洋新军的一个小头目，因不惯军队的纪律生活，回到家乡海城县后，见到当地土匪势力很大，而且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他就起意纠合一批流氓、恶棍、赌徒等成立匪帮，他自己当上了头目。但他因为人少力弱，便拜馮麟閣为老大哥，等于馮麟閣的一个别动队，唯馮之马首是瞻。

5. 混入匪帮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王小辫子：所谓王小辫子，

就是甲午战争时在旅顺口被清军捕获的日本间谍田老二^①的同伙“王老板”(他的日本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潜伏下来的特务机关长,有一个助手叫林大辫子,日本原名叫津久居。他们都是日本现役军官,潜伏在中国作间谍活动的。这两个人和众匪首拉拢勾结,为各匪帮供应枪械子弹等,自己也成立一小帮,跟着各匪帮活动。

以上这几帮红胡子都是在庚子前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馮麟閣的资格最老,除金万福拜他为老大哥外,杜立山和张作霖都算是他的晚辈。杜立山有个本族叔父名叫杜泮林,是辽中县的一个举人,给众匪首出谋划策,俨然是他们的军师,除因年龄关系,和馮麟閣以弟兄相称外,张作霖、金万福都拜他为义父。各匪帮初起时,搶劫财物,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庚子以后,他们的做法有所转变,基本上是各踞一方,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已不以一家一户的搶劫为主,而是与地方富绅、地主勾结,并与官吏互相默契,各在所盘踞的地方实行保险,即保证在所保险的界内不发生綁票搶劫案件,而由界内居民按月摊派一切费用。这样,地方上虽然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就越发沉重了。

二、日本间谍对胡匪的勾结和利用

甲午战争后,东三省成为帝俄和日本两大侵略势力角逐之场。

^① 编者注:“据老殘回忆录”关于“英雄女子王氏的形象”一段中所述,甲午战争以前,有两个日本间谍冒充山东籍渔民,潜伏在旅顺口附近的小平岛,进行间谍活动。其一化名为田老二,并騙娶一山东籍王姓妇女为妻;另一化名为王小辫子。战争发生后,我旅顺口炮台守军发现夜间有信号灯光,偵查結果,发觉“田老二”形跡可疑,即将他拘捕审讯,但他坚不承认。我守军乃一面将他暫送回家中,一面說服其妻王氏,并由王氏协助,搜出间谍确証。王氏发觉被騙后憤极,立即用菜刀把这个间谍砍毙。

日本因被帝俄联合法、德两国强迫归还辽东半岛而始终不肯甘心，一直在进行阴谋活动，想实现它的所谓“大陆”政策。因此，日寇秘密派遣现役军人潜入东三省及内蒙等地勾结和制造土匪，并挑拨汉、蒙族之间的关系。王小辫子就是负有勾结和制造土匪任务的一个现役军人。在甲午战争前，他是在旅顺口和山东威海卫一带刺探我国海军情报的大间谍。战后他又混入东北匪帮之内，极尽拉拢勾结利用之能事。他的助手林大辫子（日人津久居的化名），和同盟会的兰天蔚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辛亥革命前二年，老残曾在兰天蔚家里见过面。那时他着日本大佐的军服，自称是关东厅守备队驻瓦房店的一个联队长。这次王、林两人在勾结和利用土匪的问题上所下的工夫更深，所起的作用也更大。在东北土匪的问题中，这是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因此，特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写在下面。

王小辫子和馮麟閣、张作霖结为盟兄弟。金万福因与馮的关系也常同王接触，后来成为密友。这几个匪首都称王为大爷，唯杜立山则不然。杜与王不相往来，因为杜立山的第三个老婆就是甲午战争时在小平岛杀死前夫日本间谍田老二的那个英雄女子，他在众匪首宴会中见到了王小辫子以后，王氏将王小辫子的一些情况说给了杜立山，所以，杜对王小辫子始终保持着警惕，拒绝和他接近。

杜立山虽是馮麟閣的晚辈，但他与馮的关系比较深，馮对杜也比较亲近。杜曾劝馮说：王小辫子是一个日本间谍，他所以要混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怀好意的；我们过去不得已走上了土匪的路，这已经是很难看的了，再受日本间谍利用作个卖国贼，那岂不更是留骂名于千古吗！后来馮把杜劝他的这番话，告诉了金万福。金听到

后,一方面在表面上对馮进行敷衍,另一方面对王不但不戒备,反而更加密切了。王听到金的訴說后,更加利用种种手段把金紧紧地籠絡在他的手中,使金完全听从他的摆布。金在王的吹拍之下,更加得意忘形地劝馮說:人生在世,总要有个出头露面的日子吧,我們搞这种勾当,到什么时候才算了呢?这能有什么好下場呢?接着他就把王的情况介紹給馮說:不錯,王确实是个日本人。他因为在軍隊中犯过錯誤,不愿回日本,就流落到这里和我們混在一起;我虽然和他認識在后,但是他很相信我,对我无話不說,可說是相印以心。他过去在陸軍中当过将官,有好多同学同事和三井洋行老板有关系,我們和他多接近,不但現在的枪械子弹容易解决,而且将来我們缺錢有錢,缺人有人,那里有这样好的借重呢!我看我們應該想开一点,日本固然是中国的仇敌,但这和我們个人又有什么相干呢!我們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不要听杜立山这个小子胡說八道。杜立山耳朵軟,听老婆的話就信以为真,太沒有汉子气了。我們应打定个人的主意,不要三心二意,搖擺不定。金的这番話虽然打动了馮的利欲念头,但杜立山劝說他的話已先入为主。是留罵名于千古呢?还是貪图快意于一时呢?这两种思想不断地在馮的脑海中斗争着。因此,馮对王小辯子也就采取不即不离、亦即亦离的态度。

杜立山的忠告,終究是战胜不了日本間諜处心积慮的勾引。馮麟閣对王小辯子虽然存有戒心,但仍逃不出王的魔掌。金、馮两个匪首終于在日本的指使下,出动他們的騎匪破坏东清鐵路工程,并揚言除非帝俄拿出巨額代价,絕不停止扒路活动。帝俄偵知这种情况,派便衣人員設法把馮捕去,押赴西伯利亚下獄,但为时不久,又由王小辯子收买中国通事(即翻譯)刁义廷从西伯利亚監獄中把

馮營救出來，回到奉天，仍舊干他的老勾當。從此以後，馮、金同帝俄結下了深仇，同日本間諜王小辯子結成不解之緣。

甲辰日俄戰爭中，日軍在遼陽南首山一役遭俄軍抗擊，屢攻不下，傷亡慘重，結果利用馮麟閣、金萬福所部騎匪數千人組成了所謂“忠義軍”（當時人稱為花膀子隊），從遼河以西挺進，抄襲首山的右側背。俄軍出於不意，放棄首山，向北敗退。日軍乘勝長驅北上，俄軍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日俄戰爭勝負之局，由此也就決定了。馮、金兩匪部，幫助日本襲擊俄軍，使首山戰役轉敗為勝，因而決定了整個戰局，對日本來說，這是很大的一功。日本軍事當局奏明天皇獎賞他們兩人寶星勳章，並電請清政府將這兩個匪首收編重用。不久金、馮兩人就被清政府擢用為奉天省巡防營統領和幫統。雖然如此，馮麟閣多少還知道一點民族氣節，以後漸漸地與日本疏遠下來，唯有金萬福一心甘願作漢奸，所以他的幫統衙門里用了大量的日本顧問為其出謀劃策。日本還利用金、馮與張作霖明爭暗鬥，製造糾紛。金所部巡防營駐在鐵嶺、開原一帶，常在轄區內興風作浪，敲詐撞騙，設賭抽頭，在奉天綁票勒贖，與土匪行動一樣，由土匪變成了官匪。

三、張作霖的出頭露面 and 杜立山的被消滅

張作霖對各匪首採取不即不離的態度，一般說來，還敷衍得不錯。他是個機警過人、別有野心的人物，庚子變亂之後，他看到這樣干下去是不会有好結果的，就同張景惠等幾個得力伙伴計議說：我們長此在綠林中吃黑飯，前途是暗淡的，是毫無出路的。我看不如借我們現有的這點實力作本錢，向官家討價，棄暗投明，總比這樣繼續干下去有些出路。當時他的幾個伙伴都表示同意，並且說，

只要当家的(匪中黑話,即首領之意)有好办法,打定主意,我們无不唯命是听。张接着說:只要大家愿意,我自有道理,不过在未实现以前,必須严守秘密,如果泄露出去,不但事情要失敗,而且更要被綠林朋友耻笑。你們也許听說了吧:奉天將軍增祺帶家眷逃到錦州、义州一带好久,后来他自己回到奉天,家眷就进关去了。听說前些日子已派人去接他的家眷回到奉天。現在火車只通到沟帮子,这就是我們的大好机会,将来曾的眷屬从此經過,我們要連人帶物都給劫下来,但不准乱动,到时听我的命令行事,关于这一点必須同众弟兄講清楚,违者就要以手枪相見。

果然,不久曾祺的老婆和随护人員,乘着十几輛馬車行至新立屯附近一条荒僻路径,就被张作霖早已埋伏的匪众拦截住,将大小官弁所携带的枪械子弹以及数十件箱柜全都劫了下来,連人帶物一并押解到新立屯街上。他們把擄來的人員車馬都安頓停当,单給曾的老婆和她的貼身侍者安置在一座很好的房舍里,并用最好的鴉片烟款待曾的老婆和随行人員。这些人看到这帮土匪非常温和,很容易接近,心中有些莫名其妙。张作霖又亲身招待随行的几个重要人員躺在床上吸鴉片烟,还表现出唉声叹气的样子,并說:咳,現在我們的国家是如此的軟弱,毫无国际地位,受尽了外人的欺凌,国内人民生活竟达到这般境地,真使我有說不出来的伤痛!我們所以当上土匪,也是被逼上了梁山哪!曾太太的随行人員看到张談吐如此文雅和滿腹牢騷的情景,料定其中必有文章,其中一个比較有地位的人搭訕着說:我們很同情你的处境,我想我們將軍來到奉天一定会有办法的,你們也一定会有出头露面的那一天。接着又說:請原諒我不懂規矩,不知道應該怎样称呼,我要大胆請問您貴姓。张答說:我就是张作霖。这几个人一听是张作霖,倒抽一

口冷气，一时都很愕然。这些人过去听说张作霖是奉天著名的一个匪首，生成的身魁力大，面貌凶恶，今天真个见了面，却是这样一个儒雅温和、文质彬彬的廿六、七岁的青年，暗中觉得有些诧异。张作霖接着就把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会走上绿林这条路的前因后果，很坦率地说出来了，言下流露出一股愤懑不平之意，对奉天将军曾祺故意特别表示怨恨，说曾到任不久，不弄清真假虚实，就要严拿法办，使我们有口难分，不过我们干这个勾当，个人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了！那个随员接着说：依我之愚见，长此同官家作对，毕竟是没有好处的，为了个人的前途，我看你们弃暗投明，才是正路，随后问张：假如有这样的机会，尊意如何呢？张回答说：我已说过了，我们是万不得已才当上土匪的，假如能得到机会为国家效命是正合我们的心愿的。不过听说曾将军这个人很固执，我们现在还很难使他改变态度，等等。张接着又问：你们究竟是那一部分的呢？那位太太又是谁呢？请放心，我们保证不会加害你们的。带头的那个人思索片刻说：待我回禀太太一声，取得她的分付再同你谈。这位随员立即去见曾太太，把和张作霖的谈话经过述说一遍。曾太太当时考虑，一来为了解除眼前急难，二来为了替曾祺去一地方治安的大患，论公论私都应见张一面。她和随行人员商议决定之后，准备与张一见。张入室行了个大礼参拜，低首站立着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分付。曾太太看张对自己很恭敬，也很谦逊，就对他說：我明白告诉你吧，我就是曾将军的夫人。我们这次是由京城来到奉天，路过此地。我原在省城时，就听说绿林各帮与曾将军为难，特别是你的声名最大。现在路上巧逢，想不到你这样对待我们。适才听到随行人员报告关于你过去的一切和你的愿望，我很同情你，我看你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而且又有这样一部分力

量，假如你能很快地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我想你一定会愿意这样作吧！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我也一定保证向曾将军建议收编你们这一部分力量为奉天地方效劳，既有利于地方治安，你们也有了出路。随即问张：你看这样作好嗎？张立即称谢，并说：假使我张作霖能带众弟兄投到曾将军麾下，为国家效命，有生之日，决不能忘掉曾太太的大恩。随即辞出与张景惠等说明，并命令匪众把所劫的东西连同枪械子弹照数交还随行人员查点清楚，寸草未动。曾太太和随行人员更大受感动，并拿出五錠紋銀賞給张的部众。张婉言谢绝说：只要我们有出头露面的一天，那就殁世难忘了。曾太太一行人等随即离开新立屯，平安回到了奉天。

曾太太到达奉天后，立即把途中遇险和张作霖诚心弃暗投明的愿望说与曾祺，并且把张作霖的实力和他的为人以及她本人对张的看法，详细向丈夫叙说了一遍。曾祺听太太和几个亲信随员说了这些情况后，一时大为动容，经过考虑后，决定奏明清廷，并命新民府知府增韞（子固）把张部收编为省防营。这是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的事情。从此以后，张作霖和他的三个助手就成为奉天省防军的正式军官了，但仍驻在新民地方负责维持这一带地方治安。过了不久，曾祺召张作霖到省城进见，张作贼胆虚，託故让张景惠顶替他去省城见曾，被曾的左右识破，稟明了曾祺。曾知道张作霖有所顾虑，加以原谅，并指示张景惠说：只要你们真能为朝廷效命，我就一定准许你们戴罪图功，决不会欺骗你们的。现在奉天省还有杜立山等几个匪帮为害地方，应密告张作霖相机图之，如能为地方除掉这些巨患，那就是你们的大功，将来一定还要重用你们的。张景惠受到曾的抚慰之后，回到新民如实对张作

霖說明，張作霖聽到後，又羞愧又感動，同時內心也就打定主意了。

奉天各匪幫中，實力最厚的算是杜立山了。他在匪中獨樹一幟，除對馮麟閣以老前輩相待、特別尊重外，對其餘各匪首均不在話下，驕橫傲慢，目空一切。杜和金萬福不常來往，對於張作霖的投降，認為沒有小子骨頭，加以鄙視。日俄戰爭中，馮、金兩匪幫助日本攻陷首山有功，經日本建議清廷收編為省防營，其他另星小幫大部被張作霖陸續消滅。到了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只有杜立山一股還為害遼西一帶，未被消滅。這時徐世昌已任東三省總督兼練兵大臣，帶了一鎮（即一師）陸軍兵力到奉天，以壯聲勢，首先嚴令新民府知府沈金鑑和張作霖二人共同負責，限期剿滅杜立山匪眾，逾期不滅，惟他們兩人是問。因此張作霖對此案就更加重視了。其實張作霖在投降前對杜立山就認為是上眼皮子了，投降後更視為眼中釘，早已打定主意要消除他，但當時只是苦於難得下手，這次機會总算到了。在未動干戈前，他同沈金鑑計議，秘密布置自己的心腹，對杜立山的匪眾進行分化，同時以朋友交情勸他投降為由，派親信誘請杜立山來新民宴會，以便乘機捕殺。但這一計遭到了杜立山的拒絕。去人回來說：杜立山的態度仍然很驕傲，杜并說：張（作霖）為官，我為匪，我們已經是走兩條道路的人了，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朋友和交情，我們是有骨頭的，我們看他升官好了。張知道杜立山很聽他叔叔杜泮林的話，張就以義父子的關係，親自把杜泮林接到家里，優禮相待。張向杜泮林表示，他常想勸杜立山洗手歸正，并說：以立山的才干和力量，何愁不青雲直上呢，可是立山始終不肯回頭，前几天因徐總督帶兵到省，覺得他再這樣干下去太危險了，特設酒席請他來，再進最後忠告，可惜他反而誤會了，不

但拒而不来,并且說些閑話,这次請老人家来,就是为了此事,仍想請他觴叙共商进止。现在徐总督帶重兵来奉天,决心要消除地方匪患,不象从前自家朋友,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心照不宣了。立山不能再繼續干下去了,趁徐总督还没有动手的时候,我和沈知府力主招安,他投降是有把握的,老人家如果同意,拟請亲自出名邀他前来,以免再发生誤会。杜泮林听了这番話,认为张作霖很够朋友,是完全出于誠心善意,慨然应允,并亲笔写信給杜立山,要他馬上前来,杜立山見到叔父的手諭,也就毫不迟疑地来新民府赴約。他恃有实力,驕傲自滿,同时又有自己的叔父从中为力,根本没有考虑张作霖別有歹意,因而毫无戒备。但张作霖暗中早已布置好了,当杜立山到后,表面上表示特別欢迎,并对杜泮林尽量恭維,使杜立山无所疑慮,因此使杜墜入了他的天罗地网而插翅难逃了。一个暗号,里外同时动手,當場把杜立山捕捉起来,外边也把他带来的十几名底柱繳械捆綁了,隨即經派来的警务处人員監視就地將杜处决。到此时杜泮林如梦方醒,才知道是中张作霖的詭計了。杜指責张作霖卖友求荣,无信无义,要和他拚命,张作霖很鎮定地說:杜立山凶橫殘暴,恶貫滿盈,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这正是大仁大义,事前所以不同老人家說,因怕事机不密,就要大动干戈,这样一来所全者大,所伤者小,老人家为了姪儿,情固有所难堪,如从大义灭亲的道理看去,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次兵不血刃而为地方除一巨患,完全是老人家的力量,我张作霖决不能貪天之功为己功,一定要报請徐总督从优獎叙。杜泮林气稍平和,回答张作霖說:我沒料到你会这样欺騙我,我已老了,苟全性命,不求显达,所最痛心者,由于我誘騙了我的姪儿,姪儿虽不是亲手所害,却死于我手,言下老泪縱橫,泣不可仰。經张作霖极力安慰,并保証对老人家晚年生活負其

全責。杜泮林見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勉抑悲怀，对张說：算了吧，为奉天除害，你是作对了。死者不可复生，还有什么話可說呢！只希望你对他的身后加以照顧，对于他的部众有所安撫。你赶紧向总督报功去吧，前途远大，好自为之！张又安慰杜泮林一番，答应对杜立山的家屬一定要尽到朋友之情。杜立山的匪众因已作了分化工作，除少数抗拒的已予剿灭或逃散外，其大部分均降服，报准收編。张作霖因这次剿灭杜立山有功，被升任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統領。张景惠任他的幫統，张作相、湯玉麟都作了他的管帶。抄获杜立山的脏物，只白銀一項就有数百缸，均上繳省防軍营务处，枪械子弹、馬匹留营使用，免予上繳。徐世昌另外还賞张作霖銀一万两。从此，奉天省的大帮土匪都已消灭，张作霖的实力益強，后来就成为割据东三省的大軍閥了。